

大野列 27

宁静中突然轰雷，虽不一定能启聋振聩，至少会让人心跳快些，血流得通畅些，甚至精神也因此抖擞些，至于某些人因迅雷不及掩耳而受到惊吓，那可能是当事人做了什么亏心事，怨不得作者。

静中

温任平 著

听雷



大将出版品第 179 种

大将观点 27

静中听雷

作者：温任平
主编：徐婉君
编辑：刘艺娟
助编：苏淑萍
校对：洪秋璇、温任平

社长：傅承得
发行人：傅兴汉
创意顾问：游川
法律顾问：吴汉强律师、王瑞隆律师
出版：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发行：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4, Jalan Panggong, 50000 K.L., Malaysia.
Tel: 03-20266288 Fax: 03-20266266
E-mail: mentorpub@pd.jaring.my
website: www.mentor.com.my

印刷：佳印贸易公司
第1版第1期：2004年8月1日
定价：RM 28.00
版权所有·侵害必究

国际书号：ISBN 983-2385-82-2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Woon, Swee Tin, 1944-

[Jing zhong ting lei]

静中听雷 / 温任平著

(大将观点: 27)

ISBN 983-2385-82-2

1. Chinese--Malaysia. 2. Chinese--Social life and customs.

I. Title. II. Series: Da jiang guan dian; 27.

305.8951

本书如有缺页·破坏·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序

越界：心事与本事

◎ 傅承得

(大将出版社社长)

“温任平”三字，殊难解读，所以这篇序写了销毁，停了又续，竟使本书延迟一年多才出版。这段时日，我一直问自己为何笔重如山？我相当熟悉“文学温任平”，那是影响深远的马华文学现代派大家、曾呼风唤雨的天狼星诗社掌门人。他是诗、散文和文学评论的高手，诗作《流放是一种伤》经陈徽崇谱曲，更曾打动许多敏感的心灵。

1988年至今，温任平几乎停了文学彩笔。他仍写作，但换了另一种身份。张景云序《文化人的心事》这么说：“跨出文学界域的温任平，在这六十多篇短评里讨论的课题涵盖几个领域，如社会文化潮流、商业社会趋势与消费文化、微观文化、马华文学的内外条件，以及社会与生活观念，跨度大固然是整体特点，评论大多数越界问题时都能保存作为艺术家的自性与本色，和而不同，又不着头巾气，这是尤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文字饶富兴味，“越界”二字更可玩味。所越之界，当然是文学界域。易言之，温任平从文学人，变成“文学越界人”。其实，他在《文化人的心事》自序中也坦承：“我对自己的了解是：我有不务正业（如果文学是正业）的倾向”，也说：“吾非通才，却常有逾界的企图和野心”。温任平步入中年，“越界”更成了他生命的主题。除了文学创作，他所逾越的界域还包括：曾在政治和传销圈子潇洒来去、专研宝石，以及从教育界提早退休成为风水命理师。

就书写角色而言，“文学温任平”变身“文化评论温任平”，意义何在？我且尝试解读。

观察者与解读者

温任平早期诗作，偶有激情闪现；后期评论文章，写来冷静。与他同具作家与文化人角色的小曼（陈再藩），则不论创作或议论都用情太深，形成有趣对比。小曼以抒情与行动介入著称；温任平则相对理性与超然。两人都写文化或社会评论，小曼行文风狂雨骤，温任平山岚轻拂。如果小曼是抡刀动枪的革命先烈，温任平是居高临下的观察者与解读者。

观察与解读，正是温任平的本事。这种本事其来有自：文学温任平右手写诗、左手散文，还腾出第三只手从事评论；风水命理温任平更是精于勘舆与察言观色。这种本事，也至少具备两种特质：一是局外者清，因此外表冷静和置身事外。近廿年来温任平大隐国都，偶遇已是有幸。仿佛他同市高楼临风，睥睨冷眼观世；仿佛他如此自许自得：于无声处听惊雷。当然，也可能是他怕红尘迷路。二是不小心也扮演预言者角色。这类人通常也带神秘色彩，近年来温任平更深研未来学。

我认为温任平是合格且合乎严格要求的观察者与解读者，尤其在文化领域。廿年前，他是马来西亚第一（恐怕也是开山鼻祖），至今也是第一。幸好后来者如小曼，否则第一也没太大的意义。然而，身为观察者与解读者，温任平最可贵之处，在于不断精进。正如张景云所言：“他是一个对自己有企求的知识人”。我们不一定要同意温任平的看法，但必须敬佩他坚持理念，不断为社会而读书。当他的视线从书本移到现实世界，将所思所感化为文字，我们知道这个社会还有人淡泊读书、敏锐观察和潜心解读。

文学温任平曾经灿烂如星；文化评论温任平，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字工作者当中，因为这样的特殊书写位置，耀眼如日。

跨越界域，跨越界限

文章写到这里，理应结束。然而，同是“文学跨界人”，我不能不略谈“越界意义”，或越界书写的意义。

在多元社会和世代，越界等于开放，单元带来封闭和危险。因为越界，我们开阔视野和胸襟，也懂得尝试去了解、接受和尊重“界外”人事物。因为越界，我们除了想想自己，也会想想别人。像温任平，文学跨界，他就有机会脱出文学人孤芳自赏或顾影自怜的局限，以“局外人”身份从不同角度观察和解读文学。他也认识到这个世界，并非一厢情愿的“只有文学”或“文学独大”。

我因转行从商，侧身出版，对文学有了更多的思考，例如现代社会需不需要文学？为何需要文学？需要怎样的文学？但我不只想这些，我因越界也思考在这时空，出版和阅读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华人社会过去独沽一味，除马华文学再无其他书写或出版意义。结果，马华文学作家多于读者；马来西亚华文书写和出版内容，只有马华文学。文学绝不单调；但一个社会只有文学，既沉闷且闷。而文史哲是在阅读的最高层次，在一个没有阅读基础的社会，只强调文学书写与出版，终是本末倒置。

让我们学学温任平，除了文学，他有《文化人的心事》和《静中听雷》；或游川，有《广告：说真话的谎言》和《广告大小眼》；或何乃健，有《转基因·转乾坤》和《水稻与农业生态》；或杨艺雄，有《猎钓婆罗洲》。马来西亚华文书写，因越界而重启活力，而丰富缤纷；马来西亚华文阅读也可能因而建设基础，有朝一日视野上升，会有更多的眼睛，看得到马华文学。

莎翁Sonnet 18末四行，或能注解这样心事。

2004年3月21日，吉隆坡

自序

游泳冠军不懂游泳

《静中听雷》是笔者自1999年7月18日开始，在《星洲广场》双周刊出一次的专栏，一瞬近四年，累积文稿约九十篇，大將出版社主事人嘱咐我宜乎出版成书。我有耐心读书、写稿，但最怕做校订工作，再加上日常生活难免被琐事纠缠，一拖数月，最近好不容易才能整顿心情，把旧作仔细看过一遍，选出七十五篇，作了些增删，交给大將出版社处理。

专栏名称变奏自鲁迅诗句“于无声处听惊雷”，还记得三年前，把栏名在电话里通知《星洲日报》副刊主任符颂勳先生时语气中难掩的自得之意。我觉得我用四个字并没有减损了原作品的意思。宁静中突然轰雷，虽不一定能启聋振聩，至少会让人心跳快些，血流得通畅些，甚至精神也因此抖擞些，至于某些人因迅雷不及掩耳而受到惊吓，那可能是当事人做了什么亏心事，怨不得作者。

收录的文章，卑之无甚高论。我的许多看法，都是读书心得再加上就地情况的思考而写成的，视之为作者的读书笔记感想亦未尝不可。当初撰文，篇幅在一千二百字上下，不知怎地，近几个月来，文章越写越长，下笔不能自休，篇幅时而逼近三千字。人年纪愈大，愈是唠叨，在我身上似乎找到了现成的佐证。

近年来文化研究、后现代理论大行其道，从语意到衍异，从结构到解构，涉猎西方学说，难免目迷十色，有学海无涯的感慨。一些理论深刻精辟，具启发性；一些学说走向偏锋，貌似深邃，细审之则有哗众取宠之嫌，大有争论之余地。如果拙文“不幸”前言不对后语，或文末的陈述颠覆了前面的意见，那是因为我是一边写一

边在思索辩证，间接反映了我的学术焦虑与犹疑。

囿于个人的学力，我的文章写得不够扎实，那是很难避免的事。有时在咖啡店里重读刚刚写就的文章，觉得欠缺些什么，但又不晓得如何删饰补充，不禁废然长叹，连吃晚饭的胃口也没了。偶尔把某个意念表达出来，表达得比预期的好，我真的能够感觉到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于《The Pleasure of The Text》（“文本的快感”）里说的与文字角力偶然获胜的巨大欢愉。

由于自己缺乏正规的学院训练，观点穿贯无绳，如撒钱之委于地，因此很难建构什么思想体系。经年的摸索只是孤身上路，不仅寂寞，也常常失落。也想过辍笔不写，“真的离休”，1992年到1997年我即有过长近五载的隐遁，1997年年杪重新执笔证明了Sigmund Freud的远见：“被压抑的总是要回来的。”

我写文章，有一原则，即对好人好事，不吝赞美，无论是谁，只要在文化建设方面迥出流辈者，多予high-light赞扬。古人有云：“内举不避亲”，更何况他们只是我的朋友（或神交多年尚未认识的“朋友”），而非内亲外戚，实不必顾虑别人可能说自己在“抬轿”而拘泥、避嫌。至于一些丑陋甚或腐败的现象，我亦无意大事撻伐，或调侃之，或揶揄之，能令阅者发出会心微笑，知其荒谬之所在，则大功告成。偶尔也谈点政治时事，但要我像三国时代的陈孔章那样，投袁绍时撰文骂曹操为豺狼；置身曹营，起草檄文，又骂袁绍为蛇蝎，我是做不到的。

我是个不遵庆吊的人，吉隆坡的大小活动，我能不参与的就不参与，古人说：“以静为用，是以养年。”多挣得一些时间来读书、思考、写作，总比几个人轮流灌啤酒长吁短叹来得有建设性吧。有人视我为国内的文化观察家、时评家，像我这种惯于“茧居”（cocooning），一个月都难得去吉隆坡市区一趟的人，不免过誉，每次别人如此称誉我，我总禁不住想起卡夫卡（Franz Kafka）那句话：“游泳冠军不懂游泳。”可能吗？

除了《静中听雷》的七十五篇专栏文章外，书末还收录了笔者在2002年2月至3月间于《亚洲周刊》发表的三篇文章，每篇长一千八百字，从马来西亚商贾到中国的投资顾虑，到国内大学的华文教育状况均有着墨，这几篇短文有它们的新鲜度与针对性，或许亦具备惊雷乍响的若干效应，把它们安排在一起应该是适当的。其他两篇，一为〈记忆回收·行动解读〉，一为〈建构“文化新山”〉，均曾刊载于《南洋商报》，基于个人偏爱，也一并收入《静中听雷》。

写着这篇序，恰巧读到傅承得的〈从文化创意人到文化经理人〉，既惊且喜。迹来面对大小文章，或循规蹈矩缺乏创意，或威仪求求内容侏儒，或繁琐艰深难以卒读（英文有一字谓之 *indecipherable*，甚传神），或野嘴烂舌卖弄天真，难得碰上说理有条不紊、落笔跳脱生猛，动静皆宜的文章写手。特邀斯人为拙著写序，是红花配绿叶，也是绿叶衬红花；如果文本互涉能擦出星火，那就是咱俩的造化。

拙著能顺利出版，感谢胡兆龙的督促，林玉惜的协助，杨柳与刘艺婉的代为校对。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本书还不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付梓呢。

2003年5月杪

目录

3	序	越界：心事与本事	◎ 傅承得
6	自序	游泳冠军不懂游泳	
13		高希均与身份认同	
15		从文化现象学看廿四节令鼓	
17		文化的表演性	
19		口袋书与文化消费	
21		千禧欢庆的反思	
24		暗处一灯看《增广贤文》	
27		无形的绳索	
29		郑树森、詹明信与后现代主义	
32		“文化起义”的联想	
34	1	文学与股票	
36		所谓知识分子	
38		从《百年孤寂》到《百年思索》	
41	2	祝家华的邮筒	
43		拍掌文化与党员惯性	
45		佛洛依德顺口溜	
47	3	文学议题化	
49		多元文化与文化多元	
51		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中国电影	
53		不可小觑大众文化	
55		从私性社会谈到隐性社会	
57		听林福南演讲	
59		庖丁解牛·福南《解马》	

63	后现代抑是赶时髦？
66	起死回生的一骂
68	电视文化的省思
71	符号·拟象·真实
74	沉默的大多数
76	回应许德发的“文化语境”说
79	中间语文：再论文化语境
82	消失论述与加势策略
84	叶逢仪的烦恼——文化街的困难底冰山一角
87	人民可以“愚而神”——兼写徐复观先生
90	文化存活策略
92	“马来西亚内容”的破冰之旅
95	从北岛、高行健作品中的“可”字谈起
98	检视马华文学馆里的“马华文学”
101	知识在迁徙中衍变
105	“温任平作品国际文学研讨会”
108	从郑愁予谈到周蕾的文化研究
111	金庸可能角逐诺奖的文学考量
115	误读与假装误读——《当代马华文存》外一章
118	综览《当代马华文存》序文——在导论与评议之间寻找方圆规矩
125	中文的“性”困扰及其他
126	文学资源/写作题材/文体自觉
131	论文之间的对话
134	与张错谈“语言的共同体”
137	回归与放逐的诗学
140	“浪漫到贴地”
143	与王安忆谈情欲小说
146	《心经》偏“一切乱梦颠倒”——人间义初探
151	没有讲台的讲台
153	安贝托·艾柯的启示

156	虚构与悬置怀疑
159	重构马华文学史——从《马华文学大系》的出版谈起
162	风格与语言——覆林淑桦的一封信
165	谢颖式震撼
168	媒体与权力运作
171	王安忆“四个不要”的商榷
174	政治与文化的幻觉与逆幻觉
178	知识分子下海——兼谈平路著《何日君再来》
183	夏志清·李欧梵·刘再复——三种批评模式
186	一个他者看《悲情城市》
191	服装伦理与语言伦理
194	现代性液体化
198	谈两种“历史终结论”——致黄俊麟书
201	潘朵拉的盒子打开了——谈全球化
204	去国家化/治外法权/平庸影响——再谈全球化
208	花罗汉与博彩资本主义
212	2003年形势蠡测
216	纤柔书写的“阴性中国”
220	1970年代的文学行动主义——从《文学七环》谈起
224	1980年代的文学扎根工程——天狼星诗社的角色扮演
229	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研讨会侧记
233	幻想与想像——南洋书写内在的辩证性
237	混沌理论与文学联想

附录

243	马来西亚商贾与中国商机
246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久旱逢甘露
249	马来西亚华文高教沉痾待治
252	记忆回收·行动解读
256	建构“文化新山”

高希均与身份认同

受邀出席于大将书行变革厅举行的“高希均沙龙”，谈到母语教育的问题，这位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系教授感慨地透露，他的几名孩子完全不懂华文，只认识“高希均”三个字是父亲的名字。女儿嫁给美国人，他对自己下一代不懂母语感到遗憾，不过他又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也不能强求或改变什么。

后来他又提到田长霖在公共场合自称美国人，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李远哲的孩子，也像他的几个孩子一样不能把握母语，可以说是道地的美国人。我不知道高希均是否曾面对过身份认同的危机，高教授本身的华文造诣精湛，文笔不时流露机锋，是那种智慧型的人物。他是《天下》《远见》杂志的创办人（社长），以他的人文素养与睿智，不可能没考虑到子女的教育问题。香火的传承不仅是血缘的，也必须是文化的，如果孩子都在美国念英文，而不同时进修中文，孩子大了成了外黄内白的“香蕉人”那是必然的。孩子年幼不能作任何价值抉择，作为父亲的总可以作些较妥当的安排吧？

就我的理解，高希均教授大概可以归类为“美裔华人”（**American Chinese**），而他的子女应该是华裔美国人（**Chinese American**），重点在于第一个字是形容词，接下去的是主词（名调）。从这个例子，我们就不难领会到这几十年来马来西亚华人都自称／被称为 **Malaysian Chinese**（马来西亚华人：大马华人），最近却有人建议把这称谓改为 **Chinese Malaysian**（华裔马来西亚人），居心叵测。

根据一位居住在夏威夷以英文为写作媒介的诗人林永得（**Wing Tek Lum**）的口述，美国有一群华人把自己称为 **Chinese-**

Americans，中间多了一个连号。这些美裔华人（或华裔美国人）的认同是双重聚焦的，他们既是华人也是美国人，这种情形，用林氏的说法是“精神分裂”。而诗人林永得因为居住在夏威夷，有时被人称为 Hawaii Chinese（夏威夷华人），有时又被人叫作 Chinese Hawaiian（华裔夏威夷人），身份认同进入不同层次而复杂化。他说他宁愿被夏威夷人视为 local（本地人）更直截了当，正确的称呼可能是“住在夏威夷的华裔美国人”（a Chinese American living in Hawaii），但这样的称呼实在太冗长了。

许多人都没把身份认同当作一回事，仿佛一切都那么“天经地义”，那么“宿命”。今日花果飘零、散布各地的华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认同困扰/危机，却是个事实。

从“高希均沙龙”走出来，走在风刮得紧，行人寥落的文化街，已经是十一时半了。夜凉如水，我穿的衣服又单薄，特别可以感觉午夜沁人脾的寒意。

1999年7月18日

从文化现象学看廿四节令鼓

音乐家陈徽崇与诗人/漫画家小曼，他们把彼此脑里的意念归结起来，提倡廿四节令鼓，这一尝试十分成功。许多大规模的文化场合（像文化节）与文艺汇演，廿四节令鼓都派上用场，在徽崇兄的指挥下播出时疾时缓，众多变奏的鼓声，使听者心神为之夺，口碑甚佳。

廿四节令鼓的“发明”，见证了文化形式是可以通过艺术的再造而作出不同的表现，亦见证文化是一生命体，有它本身内在活力，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从文化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廿四节令鼓之所以感人撼人，不仅是音响节奏与律动的感染，它兼且敲醒了民族的文化记忆。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白露、霜降、小雪、大雪……这些节令名称既带有农业社会的色彩，更有强烈的中华属性。它勾起了民族的文化乡愁，那些节令的名称像唐诗宋词的意境，传递着一种独特遥远的美。

我认为廿四节令鼓会比耍大旗更具文化性，因为它不单纯是肢体动作的娴熟表演，亦具备了文化的内涵，虽然，这内涵有它一定的范限。文化的要件离不开语文与思想，廿四节令鼓作为一种表演艺术实无可能逾界表达只有语文思想才能表达的东西。廿四节令鼓的响起，挑动的是听众的本源文化意识而非形而上的学术思维。

照我看，廿四节令鼓能迅速成为华裔民族文化性大集会的重要“仪式”，力量来自它的雅俗共赏的优越性。如果国内文化场合，一上来就来个混声合诵《诗经》、《楚辞》，雅则雅矣，问题是普罗大众无法接受/欣赏这种仪典。

笔者无意夸大廿四节令鼓的成就，也劝请有关各造勿以发明，进而推广这种活动为满足。撰写本文，脑中想到的是日本的传统文化节日，衣饰、化装、动作样样仿古，予人的印象是日本人虽然十分西化，对传统文化却能保留。关于这点，已有学者指出，日本于传统文化的保存徒具其形而无神，采取的是神龛式的安排，根本谈不上文化的再生与再造。日本文化专家三好将夫承认“日本在经济上属于第一世界，文化方面却仍属第三世界”，所谓“第三世界”的意思是“贫穷”，这是发人深省的“自我评估”。

友侪和我谈起廿四节令鼓，有人建议鼓可分大小，鼓手又可分高矮长幼，鼓身可依四季髹上不同的颜色，这些当然是可以考虑加强的造型问题。依我的意见，鼓声作为一种敲击乐，它的实质音艺表现也许是更重要的美学考虑吧。让我们承认廿四节令鼓的文化贡献，也让我们体认廿四节令鼓的先天局限。我们谢谢陈徽崇供给我们近乎激越的感情渗透，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不同的文化人、知识人在各自的场域应该也能开发/发掘出不同的文化宝藏，丰富马来西亚华裔文化的内容。

1999年8月29日

文化的表演性

文化可以分不同的层次与范畴。精致文化与流行文化是一分类，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是一分类，士大夫文化与市井文化又是另一分类。根据金默（Simmel）的说法，还有所谓内在与外在之别，表演文化以致于由此衍生的各种形式的文化表演性，都是文化的外在展现。

“表演性”是英文（performativity）的译称，有人译为“宣成性”、“演现功能”等等，为了方便讨论，本文一概沿用“表演性”这个词。

我们今日看到节庆仪式，像过年燃鞭炮、中秋提灯笼、端午吃粽子、舞龙、舞狮、赛龙舟、耍大旗、风筝展、挥春都是我们熟知的表演文化。在三叉路口“打小人”的诡异祭礼，盂兰节点一千元一根大香的奢侈性消费，都是文化表演性的具现。

我们在其间见证了文化因素的此消彼长，像七巧节，牛郎织女相会于鹊桥，一个既温馨又浪漫的中国情人节，已逐渐被人们淡忘，女孩子拜七姐的喜悦聚会成了广陵散。回过头来看廿四节令鼓，那是把传统的击鼓活动予以深化，加进了中国历法的廿四节令符码的一项文化发明。推展了十年，浸假成为华人文化场合的一项强势庆典。我所观察到的是，廿四节令鼓有被过度包装的倾向，裹进了舞蹈、功夫表演及其他敲击乐的衬托，反而使击鼓的音艺表演居于妾位，一旦谬种流传，廿四节令鼓可能因商品化而趋于庸俗化，而失去了原乡的文化意义。

谈到表演文化的消长，我们不妨读一读下面这段文字：

“最先亮起的是系主任手上那根蜡烛，下来是讲师们，火苗传开去，回到同学手中，都成了待传的火种。传与接时，把传与接的

人的担忧都表露无遗。传火的人小小心心，接的人也殷殷勤勤。我们都把手掌弯成呵护的手势护着烛火。”（潘碧华〈传火人〉）

这是马大主办的“中文系之夜”的传火仪式，不仅中文系之夜，其他重要的文化场合像华人文化节、花踪文学奖，还有国内中学华文学会举办的活动，都盛行这种象征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仪式。不过这种薪传仪式近年来有逐渐趋弱的现象，原因不明。我猜想那可能是因为传火的过程相当困难（烛火熄了怎么办？是凶兆吗？），吊诡的说，就是因为传火过程艰辛，人们拿到烛火时才会呵护有加，不让它熄灭，它的难处也正是它的意义所在处。

黄锦树指出传火仪式目的在于强化情绪，用周蕾（Rey Chow）的说法那是“原始激情”（primitive passions）。周蕾认为在政治、社会文化面临危机的时刻，传统的表达方式已不足以反映现实的意义，对“始原”（originality）的想像于是萌生。这种想像以文化的初辟、自然纯洁的经验为起点，去召唤族群失落的根源。传火、传灯与廿四节令鼓都是在这样的心理运作下发明出来的。由于传火过程之麻烦／不便，它必须经过适当的“改良”（我想不到别的词语），才能真正普及化。

近来有人对文化的表演性颇有微词，某则以为文史哲的核心文化是一种内敛的、沉潜的文化运作，而表演文化作为一种外延文化则是一种外烁的、展现的文化运作，彼此固不必相同也。由于符码权力不可能自动再生，因此主体必须重复认同的过程，使这种符码权力延续下去。这么说或许有点咬文嚼字，我们不妨看看过年燃放鞭炮这事例。由于政府禁放鞭炮，符码失去了动态重复的机会，久之其表演性便隐匿不显，三代之后就激底被遗忘。明乎此，我们实不必苛刻责难文化的表演性，因为表演文化不表演，它就会失去了生命力，成为概念游戏而丧失了存活的条件。

1999年9月26日

口袋书与文化消费

千秋事业社出版了张健诗集《你的美不可分析》，刊布的消息特别注明那是一本“口袋书”。在这之前，千秋其实已出版了好几本口袋书，探测市场的回应，读者的受落程度。正式以口袋书之名登场仍以张健诗集为第一部，相信千秋事业社接下来会有更多的“精典”陆续面世。

国内口袋书的始作俑者，我不肯定是谁，就我所知，1960年代的冷蕻秋、林绿、年红、忧草、北蓝羚等人即曾以口袋书的方式出版个人结集与合集。曹莽兄于1960年代主持骆驼出版社也印行过不同类别的口袋书，包括适宜华小学生阅读的童话与寓言故事。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口袋书虽然都轻、薄、短、小，与传统的卅二开本有显著的不同，但版本不一。不仅不同的出版社或文学团体出的书版本互异，甚至由同一家出版社印行的书，也可割切成不同长宽度的各式版本，叠在一起的时候参差不齐，显得有些突兀。说来惭愧，天狼星出版社于1970年代编辑印行的书也有此弊。

口袋书这出版意念，可能源自英国的企鹅丛书、日本的岩波文库和颇盛行于1960、1970年代的香港文星丛刊。企鹅、岩波、文星都有固定的版本模式，并且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以文星丛刊来说吧，从周诚真的《李贺论》、李敖的《文化论战丹火录》、叶维廉的《现象·经验·表现》到余光中的《掌上雨》，林林总总，内容既丰富又多元。每册篇幅在十万字上下，书的体格虽小，内容的堂庑却大。

1970年代以降北马的棕榈出版社，便以文星为样板，出版宋子衡、菊凡、冰谷、萧艾、游牧诸人的著作。大体而言，内容称得上扎实，书价亦合理。我想口袋书除了名实相符可放进裤袋或大衣

口袋，携带方便之外，最重要还是取其价格廉宜，较易普及的消费优势。

在商言商，书籍的出版不能不顾及它的可能销售量。香港文星之后最成功的出版集团要算博益。过去文星出的书封面除了书名几乎没有任何设计，十分纯净，内容不外乎文学与文艺，博益却五色缤纷，内容以大众流行文化为依归。在博益以及其他集团的推波助澜下，书籍的观念受到很大的冲击。以前一部著作的出版，是作者有所创发写成文章，为出版社发现或作者自己联络进行出版，现在书籍成了商品，出版集团主动发掘市场或探测读者的口味，然后找到有关的生产者迅即投入生产。以前的书籍观念是书看了之后应该回到书架上，读者下一回阅读是在温故知新；现在的书籍观念是书本与一张戏票无异，可以一用即弃，不必保存。

风水有市场，宋韶光被征召；咸湿笑话流行，黄沾于是写他的《不文集》；广告这行业为港人艳羡，纪文凤受促写她的《点只广告咁简单》。等到《脐边笑话》、《小男人周记》以及电台名人/艺员录音也被整理凑合成流行册，我们见证了香港书籍因为商品化而沦为“非书化”的种种畸象。

我不以为千秋会像博益那样，原因有二：一是千秋由几位有理想有抱负的文化人所主导，与后者的100%商业化不可同日而语；二是千秋迄今为止已出版的印行的书并没有恶俗化、粗鄙化的现象。一个反证，博益是不可能会考虑出版张健的诗集，因为诗集缺乏规模市场。千秋目前打着口袋书的口号促销，是以价廉物美为卖点，只要书的内容健康、充实，仍不失为普及知识，推广文化的善策。由于消费者导向的力量无远弗届，千秋诸子日后将面对的“型变诱惑”相信会与日俱增。

1999年10月10日

千禧欢庆的反思

1999下半年，“□□□□迎千禧”的节目与戏码渐渐多起来了，来到目前这个倒数不足七十天的阶段，各种迎千禧的活动更见频频。世纪末的颓废、世纪末的悲情至少在马来西亚华社是不怎能感觉出来，有点异样的反而是大选将至渐渐出现的众声喧哗的现象。

文化建设不能仅凭赶墟集那样闹哄哄的文化活动，除了追逐锣声的动态文化，我们更需要扎根的静态文化底沉淀与累积。文化做秀也没什么不对，不过如果仅满足于做秀的层次，那就不太可能提升一个社会的文化教养。

参与文化做秀的人物包括来自国外的著名作家、学者，这群人当中以小说家白先勇声势最为浩荡，媒体在白氏莅临前的造势与在岛期间的演讲、接受访问的种种报道，可谓空前热烈，比余光中、刘墉、詹宏志来马犹有过之，但白先勇的言论只能算中规中矩，他分别接受陈再藩、冯久玲的访谈所作的文化批评，谈不上什么睿识与洞见，不见精采，反而是诗人焦桐的文学意见令人有“惊艳”之感。

天下杂志创办人、著名经济学家高希教授，他讲的“中华经济圈”也不是什么新调，王赓武教授早些时候已经提出劝告：这概念可能招来美日的围堵，可能未见其利先见其弊。这些“文化明星”莅马讲演，固然能造成三、五天的哄动，但人走了也就烟消云散，我颇怀疑这些文化人离马之后能在此时此地留下多少潜移默化的作用。文化建设不能依靠外来的和尚，即使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他们的节奏也不一定契合本土文化的频率。

我们不妨检视一下当前华社的文化景观：《星洲日报》花踪文

学奖于1991年开始颁发，并建构成为两年一度的文学盛会，于发掘文坛新锐、肯定作家成就方面作出重要的贡献；马华文学馆于一年前在南方学院成立，藏书虽不算丰富，却仍然有助于马华文学的研究工作；大蔺出版社宣布筹资一百万元，计划于两年内出版新书，目下已出书近五十种，成绩不俗，如果两年内能顺利出齐一百种书，在马来西亚华社这肯定是一个不易打破的记录。近年相继由不同单位主办的三场国际性马华文学研讨会，得学术论文及报告七十五篇。已出版成册的计为马来西亚作协与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联办的《扎根本土·面向世界》，和留台联总的《马华文学的新解读》。南方学院的廿一篇论文已抽印成讲义册子，相信不久会印刷成书。华总编辑出版的《愿景》已看到创刊号，华研的《人文》杂志，据执行编辑许德发相告，创刊号会在11月1日面世。

正在编纂仍未面世的还包括马来西亚作协编了三年多的《马华当代文学大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最近宣布出版一套《马华当代文存》，收录1980至1990年代二十年间有关华社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诸部门的重要论评文字。文化的定义/范畴远比文学、文化广泛，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的动态都可以说是广义的文化活动。

最近与舞蹈家马金泉会面，他感慨地告诉我，他身上那几袭舞衣，十年前穿到现在，不曾换过行头，言下不胜唏嘘。**看来文化没有经济的支援、物力的挹注，前路仍多坎坷。**与名画家黄乃群交谈，他希望华社能有自己的文化中心，内设美术馆，可以展览本地画家、书法家、雕塑家的作品。**争取文化的硬体建设，改善文化发展的条件，才是最重要的。**

岁近千禧，全世界迎接千禧的热潮将构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各国都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其节庆仪典必然多姿多彩，各擅胜场。说得难听一些，黑白两道都有各自的形式迎千禧，夜总会可能会用“千娇百媚迎千禧”作号召，按摩院也可能挂个“软玉温香

迎千禧”以广招徕。在一个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度里，出奇制胜的商业卖点，只要不干法纪实无可厚非。文化人投入迎千禧的欢腾中，也是很自然的事；如果眩目于眼前的绚烂，而忘了长远的文化建树，那就本末倒置了。

1999年10月24日

暗处一灯看《增广贤文》

记得张木欽、陆庭瑜两位先生都曾诠释、推介过《三字经》。三字经言简意赅，其文化意义已受到一般人的认可，董教总编《新三字经》以便流布，正适其时。

我觉得民俗文化里头可以反映吾族的文化价值者，应该不能忽略《朱子治家格言》与《增广贤文》。朱子格言不长，仅五百一十七字，内有不少警句，唯格言体制如“黎明即起，要打扫庭除，要内外清洁，既昏便息……童仆勿用俊男，妻妾切勿艳妆”，终不免带些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真理管辖区”（regime of truth）的意味，非本文能详述，暂且不论。

《增广贤文》篇幅为《朱子治家格言》之五倍有余，长逾三千八百字，里头有许多隽永的智慧语，以五言、七言居多，其间也穿插三、四言的短句。对仗排比颇工整，不仅内容可供读者玩味，语言的敷衍亦有许多精妙处，可供写惯一清如水的白话文作者借镜。

说起来《增广贤文》的一些陈述，已是我们日常惯用的表达方式。小时写作文常用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老师责备学生的“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对着友侪拍胸脯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经常在报章上看到标题“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均引自《增广贤文》，只是它们走进我们的文化潜意识里，习焉而不察。

一些语句带点教诲、警惕之意，是前人的生活经验过滤后的智慧点滴，像“来说是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远水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贫居闹市无人识，富在山中有远亲”，珠玉纷陈，真是不胜枚举。

古代中国人于读书晋仕，考虑较深刻，《增广贤文》在这方面着墨颇多，于是有“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家中无才子，官从何处来”的体会，和“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期许。

我猜想古人都极喜喝酒，士农工商莫不如是，但又知道喝酒有种种坏处，表现在《增广贤文》文本里头是一种又爱又怕的情状。这边厢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遇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的豁达恣纵，那边厢却扫兴地提醒自己“莫吃卯时酒，昏昏醉到酉”（卯与酉是中国的时辰），甚至告诫自己“若要断酒法，醒时看醉人”，与前面所述互相辩证起来。

《增广贤文》里头也有不少人生哲理可以作为民族的文化枕垫，像“贫穷自在，富贵多忧”、“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等，都能让遭遇挫折的人于其中得到心理熨平的作用，有减压的枕垫效用。还有被许冠杰唱红了的“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也让许多物质贫乏的人心安理得，不作过份的企求。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个人非常喜欢“闹里有钱，静处安身”、“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那种一字不能易的精髓。“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的童谣味，十分动人，或可谱写成曲。“因风吹火，用力不多”、“大厦千间，夜眠八尺”有点像现代诗，后者开阖自如，非大手笔不能为。“众星朗朗，不如孤月独明”文句文思富转折之美。对我而言，《增广贤文》里头掷地有声的金句是：“点塔七层，不如暗处一灯”。

如果你找不到《增广贤文》，翻一翻家里的《通胜》吧，它

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1999年11月14日

无形的绳索

承蒙欧阳文风先生不吝指数，点出我的“卧底论”的漏洞，十分感激。

“知识分子论政与参政”是一项座谈会，有所感思，即便发挥，终不免疏忽。如实地说，卧底的问题不仅在当事人当初“打进国阵，纠正国阵”有无诚意，还得看鱼跃龙门成为国阵议员后，有无实践纠正国阵的能力。套用一句有点过时的政治术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样说仍没把情况说清楚。我们都知道卧底的最大危机除了身份暴露外，另一危机是被周围的人物、环境同化了，或干脆被体制收编了。同化过程可以相当迅速，像物件掉进染缸一样马上变了颜色，也可以较为缓慢，这要看个别知识分子性格的“坚韧度”（degree of endurance）而定。谁飞快地看风驶舵，谁在潜移默化逐渐褪色（变色），又套用一句老话，“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自然会看得清楚。

大文所列的多位知识分子，如果从知识分子的定义去鉴别，恐怕及格的不多。如果凡是大学生即是知识分子，那么当前在朝诸政党议员恐怕有90%以上都是知识分子了。专精于一科一技的博士、教授，如果他们不敏于观察现象，不勇于发言批判，则他们只是“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专家或学者而非知识分子。金耀基说得好：

“一个科学家或学者不必是知识分子，除非他讨论到重要的问题（如战争、贫穷）；一个小说家或电影导演不必是知识分子，除非他写作、执导的东西不纯为感官娱乐而明示或暗示地触及到较广深的社会文化问题。”

知识分子一方面要有知识，一方面要有道德勇气。没有知识的训练，只有盲目的道德，判断通常失误；只有知识而没有道德意识，则易为他力所摆布，刻意颠倒是非。知识分子的责任乃“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勇敢地说出真相。由于权威体制喜听美言，实话实说有时便成了一种冒犯或僭越（transgression）。

欧阳先生厚道，没有指出在谈话中的另一谬误。那句“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我记错了是毛泽东讲的话，其实说这句话的人是汉高祖刘邦。刘邦虽出身草莽，倒也懂得儒生的重要性，这要比焚书坑儒实行愚民政策的秦始皇高明许多。敢于怀疑，勇于批判使知识分子容易处于主流体制的对立面，而经常发生龃龉，但当权者又不得不“礼贤下士”。连大独裁者之一的史达林（另一人为希特勒）也得承认：“没有一个统治集团可以没有知识分子而统治成功的。”

这也正是大小政党都要招揽人才的原因，因为知识分子可以成为党的“智库”（think tank）。陈亚才强调知识分子的自主性，因为当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必须遵循党的斗争路线走的时候，他就不再能自主了。从韦伯（Weber）到余英时到祝家华都主张知识分子宜乎“自由浮动”（free floating），因为只有自由浮动，才能独立自主，不为别人所操纵宰制。

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徐复观，在他的《学术与政治之间》一书中曾指出，古代中国“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些古代的仕，也就是读书人，即受禄于君，成了朝廷命官，在人情道义上当然很难支持道统而批判法统。

徐复观让我们了解到中国传统社会里虽然有那么多的读书人，却绝少有真正知识分子的根由。在朝知识分子鼻子前面都有一根无形的绳索，拖着他们走。说起来，人各有志，别人也不能非议什么。我们只希望当事人要意识到那根绳索的存在，最好能知道谁拉着绳子，自己又会被拉去什么地方。这点自觉不能没有，没有的话就连做人的起码尊严都报销了。

1999年12月12日

郑树森、詹明信与后现代主义

与郑树森教授相聚数日，并且主持了他的一场文学演讲，私下里彼此也讨论过港台文坛的情况与作家、学者（从西西到陈清侨）的动态，觉得他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有相当透澈深刻的认识。要到了花踪文学奖颁奖礼过后，我才从一位文友口中获悉，原来郑树森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大师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高足。

台湾诗坛的后现代主义，许多人都以为肇始自夏宇、陈克华、罗青、林耀德、丘缓、罗智成等人始于1980年代的诗实验。如实地说，夏宇在1970年代末已有后现代的倾向。而台湾后现代的鼻祖恐怕还不是夏宇或罗青，而是在1960年代备受警议的前卫诗人：碧果。碧果是创世纪诗社一员。在1960至1970年代他的作品《静物》曾不止一次被指斥为毫无价值的游戏之作。

相对于现代主义的“目的论”，游戏性是后现代主义的特色之一。我们当然不能说游戏是毫无意义的。

詹明信在他的论著《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指出后现代是承衍现代主义而出现于媒介资本主义、国际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模式。这种社会以跨国资讯、多边市场、电子媒介为主导，投资方式与生产模式的巨幅改变重组了社会的空间秩序。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化工业包括电影、录影、录音都走向大众化、商品化。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距离正在减少，甚至消失。文类混杂，不同的艺术表演掺混。我们可以从一首诗里读到庄严的祷词、夸张的广告文案、方言俚语、新闻术语、法庭供词……它们许多时候甚至不是“融合”（fusion）在一起，而是“拼贴”（collage）成篇，让它们参差对照，自显意蕴。这种混杂比张爱玲式的“葱绿配桃红”突兀了许多，也因为这样往往能营造出震愕的、悽

人的效果。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出现，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经济结构已进入一个科学工艺发达，资讯流通频仍的阶段；从文化方面去衡量，则现代主义正面临某种“发展的定向力障碍”。就诗创作而言，现代主义大师如余光中、洛夫、周梦蝶、郑愁予和其他重要诗人已留下连篇累牍的作品典范，他们或豪迈，或诡奇，或纤巧细致，或妙悟中带禅机，或恬美中又透点民谣的意味。各种风格都有人试验，亦有后继者发展过、衍变过，要翻新出奇，另创一格，愈来愈困难。

现代诗人于是另辟蹊径，挪用、模拟（parody），甚至故意误读（misread），写出像罗青的〈一首关于诀别的诀别书〉，这首诗是对林觉民〈与妻诀别书〉的谐仿；苦苓的〈情妇〉则是对郑愁予〈情妇〉的模拟挪用；欲团圆也写了另一首〈我是忙碌的〉，明显地挪用诗人杨唤早年名称相同的作品。这种解构原作的企图是在补充、变奏，因此也在创造，并赋予原作所无的意趣。

就中国诗坛的情况而论，1980年代初朦胧诗的出现，标示了现代主义的崛起。1980年代末《非非诗刊》与《非非评论》印行，提出了“非非宣言”，诗的变革成了新的浪潮。宣言中提倡“前文化语言”与“前文化思维”，质疑约定俗成、指涉性僵固，负载了多年积淀意义的语言底创造功能。詹明信在另一论著《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提到了语言的物化危机（reification），非非主义群诗人亦对习惯性、规范性的表述语言提出批判。

由于郑树森是詹明信的学生，他对吕育陶的网络诗自然情有独钟。在第一轮甄拔时，新加坡诗人蔡欣与我都没投票给吕育陶。我认为吕的“后设语言”（metalinguage）用得够大胆，但用得多了些；蔡欣则认为诗的第二节语言流于机械化。在郑树森力争下，吕育陶才挤入四强。

马华诗坛后现代风潮方兴未艾，来届参赛者，就我揣测，应该

有更多的新锐作这方面的尝试。为了对后现代派公平，花踪文学奖的评审委员宜乎有人熟谙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及技巧实践，庶几乎参与文学竞写的作者，都受到较均衡的对待。

2000年1月16日

“文化起义”的联想

“文化起义”大概是陈再藩先提起，林福南率先响应的。“起义”是一个很重的词，想想清末那一连串由革命党策划的起义，此起彼伏，也不知有多少热血青年抛头颅洒热血，为贯彻自己的理想作出牺牲。

今日的语文通常有语义加码的倾向，不用“文化改革”、“文化革新”等一般性的用语，而用“文化起义”，显然要引起众人的注意，成为一个议题。

文化人大多社会意识极强，对国内的政治、社会问题反应敏锐，由于人不在朝，除了写写文章抒发感受之外，能做的事（或者说能改变的现状）十分有限，在这样的情形下，文化便成了一种反抗甚至批判的方式。

茨厂街是颇为典型的唐人街，也不知有多少个政治人物提过要改善、提升这社区。扰攘多年，总是空雷不雨。紫藤大将的“热情组合”（passion group），却能以微薄的资金，有限的人力，打造了文化街。当然文化街之所以能成功盟就，媒体的大力造势，大将请君子的人脉运作，都发挥了作用。我相信文化街这个成功的例子，一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启发了陈再藩，使他觉得民间力量如能凝聚，表演艺术工作者一样也可用“一人一砖”的方式塑造自己的表演场所，建立自己的文化中心。

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文化动员通常都力强而不易长期维系。主办一场文娱演出可以在一两个月内倾注人力及其他资源，但建立文化中心却是打一场长期的消耗仗。“文化起义”不仅是持续保温，而且必须强化、深化，只有在愈来愈多人都参与是项运动，雪球越滚越大时，事情才有成功的希望。“文化起义”在大将

书行揭竿而起，必须辅之以后续行动，从短期目标到中期目标、最终目标，均能循序渐进，才能看到成绩，否则“文化起义”很可能是几点文化泡沫，在半年后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这篇短文无意泼冷水。恰恰相反，我写作的目的是重提起义事，唤醒大家的记忆。元宵节的文化起义与陈情表都十分戏剧化，接下来怎样演出连场的好戏，相信是大家关注的。不少人都拭目以待。如果当事人有能力把企盼的一群变成参与的一群，情势就有利了。

2000年3月5日

文学与股票

文学与股票，乃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子事，之所以会扯在一起，就笔者这些年的观察，发觉这两码子事，实有近似之处。

比如说，文学都有主题，即main theme是也，而且每个文学时期或阶段，主题之侧重点不尽相同。股票亦然，新千禧的马来西亚股票炒作主题系高科技，即目前访马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思比所说的high tech。近这几个月来，凡是与高科技有关的股票都飙升得比直升机还快。1998年9月的友尼森股价才三元五十分，今天市价逾三十五元矣！其他科技股的攀升情况，举一可以反三，无需辞费。

回想1997年那个小牛市，主题与科技无关，而是所谓“倒置收购”（reverse take-over）。任何公司有传出被倒置收购者，即刻像烘好的烧猪那样，热腾腾的，人人都渴望啖一口为快。倒置收购的主题显然与2000年的高科技，大相逖庭。

对了，还有1993年那个综指冲破一千三百点大牛市，那年的股票炒作主题是分红股配套附加股。凡公司只要传出即将分红股的消息者，即刻大幅冒起。风水转流转，今年的绿野集团（CHHB）出来的报告盈利大增，市面盛传公司会二送一甚至一送一红股，这本是好消息，奈何公元2000年的股票主题已改，CHHB在五角钱左右的水平浮动了三几天，又回到五元的原价上“休息”。这情形使我想起宋人的词：“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文学的主题也在变，在马大中文系任教的潘碧华，即曾撰文指出，1980年代校园文学的主题是民族的忧患，洋溢强烈的文化关怀；1990年代的大专生则写他们各自的孤寂感，带着几许无奈，充满强烈边缘意识。文学主题会变，随着局势而变，不过文学主题的变更，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归纳，让读者抓住其主轴。文学

主题的更替，亦有理路可循，不似股票主题的变，往往“不合理路，难以言诠”。

何以笔者会用“不合理路，难以言诠”去形容股票炒作主题的难以捉摸呢？被倒置收购的公司大多是些有问题的公司，有的财务一团糟，有的只剩空壳一个。就“常理”说，股友没理由去热捧这些烂公司，但“常理”在股市往往派不上用场，君不见盈利额比上一年增加400%的大众银行，其股价在年度报告出炉之后，从四元四十分往下跌穿四元，在二元八十分才找到止泻的“阻力线”吗？

文学作品无论主题如何，总与世道人心有关，是生活的描繪或是生命本质的体会。股票则纯粹是赚钱或亏钱的工具。

文学作品的主题鲜少愈作愈大，股票主题则从较合理的分红股吸引股友购进，到烂公司的股票反而更值钱，到今日的追逐那些其实在搞着低科技（low tech），而且还搞到负债累累的所谓从事高科技底股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追逐“比泡沫更虚拟”（virtual than bubble）的东西呢？如果泡沫被刺破，多少人会倾家荡产？

2000年3月19日

所谓知识分子

活了大半辈子，至少让我了解一件事，知识分子在批判他人、针砭时弊的同时，本身可能完全无法接受别人对他们的任何负面批评。

如果身为知识分子的你，收到按常理也应该是知识分子的作家底赠书，看到书的内页写上“××兄指正”或“××兄指教”这些字眼，请不要写信给有关作家，指出他书中的种种谬误，更千万不要写文章刊载出来，把作品的阙失公诸于世。作家赠书要你匡正，“你识do啦”，他要的是你的赞美与褒扬。

知识分子严以责人，宽以待己，这已经是够精的了，还有知识分子往往持双重标准，自己的圈内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因为有学术气息；不是自己圈内的人，即使立德、立功、立言，知识分子都可以视而不见，当他们透明。

一些知识分子是厉害的策略家，擅借力使力，攀爬腾升，从“人望高处”的角度来看，也无可厚非，只要实至名归，吾人似乎也不宜对彼等苛责。更厉害的知识分子是他人出力自己收成，把别人的功劳全部拨给自己名下，名利双收，不亦快哉。

知识分子早年被人剥削（比如说，被人邀去演讲，结果连车马费、住宿费也得自付），一朝登上龙门，有了点权势地位，变得比任何人都懂得剥削他人。难怪当年受尽欺侮的童养媳，熬到家翁、家姑、丈夫都过世了，大权独揽，虐待媳妇，手段之严酷狠毒比上一代青出于蓝。这也算是某种心理补偿吧。

老实说，当前许多知识分子写的文章我都不太读得懂，中文不像中文，英文不像英文，句子冗长，理念抽象，一个不很复杂的意思偏要绕个大圈，嵌进多个子句，“故作高深状”。以

前我读这些用英文思维系统写成的中文论述，吓得直打噎，正襟危坐，苦读细品一番，才发觉好些看来唬人的长句，语病一箩筐，概念的兜兜转转，只是小儿学舌，如实地反映出作者自己也不太肯定要表达些什么。打结的语言是打结的脑筋底产物。

一些所谓高档文章，乍看繁富复杂，深不可测，拆开来原来尽是西方理论的嚼余，东拿一点，西拈一点，用自己生涩的中文collage在一起。面对这些理论家型的知识分子，切记要懂得赞美他“博学”或“博览”，千万不可失言把“博览”说成了“博懵”。

卢梭是知识分子，他把五个亲生子女都送到托孤所，让他们一个个死去，他自己则写《忏悔录》（这使我想起最近流行起来的《忏悔录》）；他关心民瘼，主张社会改革，不仅是十八世纪的大思想家，更是欧洲早期知识分子的楷模。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拒绝接受是项大奖，特立独行，风骨嶙峋，为世人称道；同时研读萨特和卡缪的生平之后，才了解由于《瘟疫》《异乡人》的作者卡缪获得诺奖在先，萨特十分妒恨，因此干脆杯葛诺奖以泄心头之愤。一代大师心胸狭窄竟至于斯，知识分子可以休矣！

儒家的教训：“士不可不弘毅”，士是读书人，也就是今日的知识分子，“弘”是胸襟开阔，“毅”是意志坚定，以这标准衡量今日文化界诸君子，合格的似乎不多。写这篇短文，刚好读到杨照文章里的一句话：“知识分子的最大意义，就是不断去思考现状以外的可能性。”我们的知识分子有尽到这点起码的本份吗？

2002年3月31日

从《百年孤寂》到《百年思索》

《百年孤寂》是魔幻现实主义大加西雅·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经典小说。马奎斯是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他的名著《百年孤寂》却早在1967年便已完成。《百年思索》则是现任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于1999年出版的新著，正如她早年的《野火集》《龙应台论小说》一样，她的著作出版后广为人所瞩目，她的一些言论见解也成了文化圈的议题。

如果读者把这两本书先后读一遍，一定可以感受到那种文字的张力与两位作者强烈的历史感。当然两者有许多差异处，《百年孤寂》是部长篇小说，《百年思索》却是本言论集。不过在提出自己理智的疑惑及解放自己内心的热情这两点上，两书有许多共通处。两本有关百年的书都可使读者阅后，激动得不能自己。

《百年孤寂》小说中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南美洲的哥伦比亚，里头的人处处与大自然对峙，人与人之间缺乏同情了解。“马空度”这个作者杜撰出来的城镇，十足像旧约的失乐园。马空度曾历经五年的风灾与近十年的旱灾，最后全镇为飓风摧毁殆尽，只剩下蚂蚁无恙，这都带有神话的天谴意味。

维系这部长篇小说架构的是哥伦比亚的内战、西班牙殖民与美国财团引起的投资风暴，主线仍是家族传奇与书中主角宾迪亚上校的叛乱，和多次由他所领导的革命军与政府军的游击战。这场内战打了二十多年，上校自己出生入死，形同杀人机器，他完全失去爱的能力，只有李逵那种野兽似的蛮勇。

提到《水浒传》里的李逵，我们当记得宋江接受招安的下场。上校也像宋江那样向政府军缴械，投降的结果是他的亲信全遭清算杀害，他自己被软禁，与活死人无异。上校曾开枪自杀，

侥幸不死，便无意再试，宁愿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困境苟延残喘。

宾迪亚家族能历经六代，强撑百年之久，靠的不是上校的杀戮活动，而是母亲乌苏拉对生命的信念与她力图改变命运恶咒的努力。她神话似的活了一百廿岁，能干、坚忍而仁慈，是家族最重大的精神支柱。乌苏拉一死，宾迪亚家族不久即归于衰微寂灭。

相对于乌托邦似的马空度镇，龙应台笔下的中国、德国、日本，可谓无比鲜明真实，不带任何魔幻或神话色彩。康梁百日维新运动的失败，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奠定日本国力形成强烈的对照。1894年的露日战争，清廷战败赔款三亿六千万日元，是日本国家预算的六倍，后者使用这笔战争财发展工业，其中五分之四用来扩充军备，为日后的全面侵华铺路。中日战争前后八年，超过三千万的中国子民死亡，日本从不曾就此事正式道歉，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要求日本政府为战争侵略向中国人民致歉，台湾总统李登辉却认为这是江泽民的“个人恩怨”，旧事不必重提，并指责“江泽民比日本更有问题”。这种颠倒是非，黑白不辨的言论，出自台湾总统的口是十分骇人听闻的，怪不得南方朔要发出这样感慨：“台湾统治者替日本辩护，是灵魂的堕落。”

龙应台重读历史，从康有为、梁启超的求变言论，到这些言论如何影响年轻的胡适，胡适又如何影响到殷海光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有很深刻的体会。中国的百年历史可以说是争取自由、人权的一条颠蹶底路，为了追求思想的出路，也不知有多少人牺牲了。百年前梁启超“吾口已干，吾泪已竭”呼吁中国体制改革，百年之后的1998年，北京大学举行百年庆，中国学者李慎之如斯写：

“自由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中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漫长而曲折的路要走。”

作为一个读者，我想李慎之的心情，也正是作者龙应台的心情。从康梁到胡适之，从胡适之到殷海光，从殷海光到龙应台，中国百年来的文化菁英进入第四代了，百年来困惑着知识分子最深刻的问题像西化与现代化，民主、法治、人权、公民意识、传统文化价值，与这价值体系如何回应外来文化的挑战，仍有许多盲点与灰色地带。《百年思索》是作者自我质询也要求大家自我寻思的一部书。

马奎斯的《百年孤寂》是以神话的角度，观照了哥伦比亚一个世纪的沧桑；龙应台的《百年思索》是藉资料的爬梳，把中国人百年的困顿迟疑裸现于吾辈面前。

2000年5月28日

祝家华的邮筒

翻查资料偶然在旧书堆拾到一张泛黄的邮筒，美国寄出，邮筒后面写的却是台湾的通讯地址：台北市景美区万盛街门牌多少号。有些狐疑，掀开来看，才知道那是祝家华于1989年12月20日写给我的短札。信上说：

“两个多月前离开《星洲日报》到台湾去念书，或许您知道我的离开，但却不知道我来了美国，我这趟来美是参加一项国际青年交流计划……”

信中也谈及他个人的一些忧虑，经济拮据，离开理大一年再去念硕士，不懂能否念得好。家华在政大念的是政治，他在信中带点自嘲地说：“那可能是一门找不到饭吃的学系。”他的字迹潦草，不难想像他于奋笔疾书那一刻的情绪与感受。行色惶惶，生活不定，前景未明，还有许多放不下的东西，包括马华文坛，信中他还问我这届的马华文学奖花落谁家，但对自己日后能否继续写作却流露不自觉的犹疑。读着十年前的邮筒，最后一行：“……希望在台定下心来，也盼望在台和您保持联系。年终岁晚，1990年代瞬间即逝，祝老师诸事顺利安好。”时间的失落感令我喏然若有所失。

祝家华的读书奋斗史，可以视为马来西亚留台生的缩影。老友赖瑞和，1970年代赴台念外文系，也在报馆服务一段时日，赚取盘川。1970年代中叶，天狼星诗社旧部赴台深造者众，他们一方面继续搞活动，一方面得面对功课压力，有者念完大学四年，有者中途辍学，虽说各人造化不同，不过许多时候造化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理想与学分，是一个孰先孰后（priority）的问题。专心念书，拿到学位，扎好基础，日后脱茧而出，才大展身手；还是

甫入校园，即奔走号召，串连其他大专的青年才俊，轰轰烈烈地搞“生活文学化，文学生活化”的在地运动。大学的功课繁重，要把书读好，又要把校内、校外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是鱼与熊掌的两难。

家华在理大参与华文学会，主办第一届全国大专文学奖，活动频仍。他一方面得与大学行政当局周旋，一方面要吸纳校内的知识菁英，共同提高同学们的文化自觉。这些活动一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他的课业表现，所幸在功课与理想之间，他还拿捏得准，能顺利拿到学位。鱼与熊掌都能兼而得之，可谓大幸。至于如何与时间赛跑，心劳力竭的程度，则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离开理大，家华服务于《星洲日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80年代末新加坡某单位主办一项大型的文史哲研讨会，家华以特派记者身份专访余英时、杜维明等当代史学、儒学大师整理发表的那几篇访问稿。

那几篇访问稿，真正让我觉察到“知识互动”的意义。家华其实是一边在做访问，一边在学习。这些大师的言谈、见地，对家华影响之巨，恐怕是连他自己都想像不到的。强烈的历史意识与儒家的淑世情怀，使家华摆脱了《照撞在人间》的郁躁（我不用“浮躁”二字，因为不够妥贴），用心的读者，可在他的近著《炉火中的沉思》感觉出来。

一张十年前的短筒，挑起那么多的感想、话题，自己都觉意外。希望不是感情泛滥才好。

2000年6月11日

拍掌文化与党员惯性

电视报导新闻，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台上的人在演讲，说到精彩处，台下听众／观众突然间响起辟辟拍拍的掌声，如果这时候有三几个人率先起立鼓掌，这肢体语言就像传染病似的，不消半刻，全场听众都相继站立拍掌，气氛十分感人。我相信台上的演讲者看到这么热烈的反应，他应该是既高兴又骄傲的。

几句煽情但往往与智慧无关的话，能赢得众人的捧场，受者感到兴奋、骄傲毋宁是人性之常，这和“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的道理仿似。只要当事人不迷失在掌声中，大概是无可厚非的。拍掌鼓励，也是一种礼貌的表现，这是现阶段人类社会的重要发明之一。拍掌的意愿如果是真诚的，源自内心的需要，我甚至觉得拍掌为他人打气，是具建设性的。

问题是今日的社会文明，已晋入什么都可以虚拟的境界，包括响亮和可贵的掌声，一样可以作假。

曾经有过几次难忘的经验，被朋友死拉活扯，挟持去出席不同直销公司的演讲会，与会听众——我猜想大部分是直销人员——总不会忘记在主讲人嘶声喊话时，机械地给予掌声支持。当主讲人以声音配合肢体激情演出时，一小撮人就会在不同的战略位置起立擂掌（擂掌者，出力拍掌也），把感染的效应迅速传递全场。

我发觉政党开所谓代表大会，和直销公司开推介产品的讲座，相似的地方太多了：都在推销东西，都在讲述自己的成功史，都在卖花赞花香地说自己的政党／公司如何伟大，制度怎样好，服务素质怎样优异，更重要的是，两者都不忘安插一些自己人在适当的时机起立，大力拍掌，壮大声势。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份量上台演说的，话语本身便是一种

霸权的延伸，这点西方学者很早便指出来了。通过扩音器的声音有一种慑人的威力，使坐在台下的人不自觉地感到卑微。因为有斤两的人物，总会把握机会透过麦克风向众发言，让权力意志得以贯彻，争取在座者的支持。明乎此，我们会明白李三春时代的某届马华常年代表大会，当时担任马华总秘书的梁继泮关掉麦克风，让贵为署理总会长的李孝友在台上干嚎的根由。声音传不开去，说什么都没用，有什么委屈也没人会听见。

刚刚落幕的马华代表大会，序幕告终，首相与其他国阵成员党头头雨离开会场，尊贵的林良实部长有话要说了。他在麦克风前面并没有交代辞官的来龙去脉，只是用韩非子式的反诘法，问台下党员“辞官让位也算错吗？”听其言似乎比当年的李孝友还委屈。接下来他提到“……连林亚礼同志也对我不满……”这时候台下的同情情绪开始泛滥，等到总会长说他会坚持立场，不畏困难，继续为党国奋斗时，台下掌声雷动，纷纷起立致敬。

在幢幢白色制服的身影底笼罩下，在震耳欲聋的掌声铺天盖地而来的那一刻，组织人的惯性，在这儿是“党员惯性”发酵到了极致，于是众人都在“忘我”——忘了自我，也忘了敌我——的情况下中蛊似地随着大伙儿拍掌。马华公会又呈现一片大好、一片祥和，完全是大团结的嘉年华气氛。“拍掌果尔能成为一种文化，有替组织去疗伤之奇效。”忘了是《瞬息京华》的作者林语堂，还是《玻璃垫上》的专栏作家何凡，还是《圣诞政治食谱》的作者董桥说过的话，这句悖论，细思亦不无一些道理。

2000年7月9日

佛洛依德顺口溜

什么叫“党员惯性”？拙作〈拍掌文化与党员惯性〉刊出后，笔者接到几个电话议论一番后都希望我再作进一步申论。

“党员惯性”当然不止听到领袖演讲就拍掌那么简单。我也参加过政党，而且还担任过一州的文化局局长，除了在外面观察外，还有在里头体会的宝贵经验；经验虽然宝贵，但不一定愉快。

由于政党党员人数众多，个人要鹤立鸡群获得领袖的垂青实在不易，因此都有争出位的盘算。1950、1960年代专业人士少，医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这四强，不必如何争，也能出位。今日教育普及，一个区会里就可能出现几十名晋身四强的人物，不施展浑身解数，又如何能挤上高层？有理想的政治人物，默默耕耘，为民服务，久之也能建立起一定的声誉，为党高层注意；一些人平日毫无建树，就只能等，等到党内出现危机时，看风驶舵，靠拢某一边，急急表态以示忠诚，这种政治表演每隔一、两年总会上演一次，也可说是党员惯性的表现。

过去自己担任过某政党的文化局局长，有时和州联委会主席同乘一部车，在一些场合与副部长、国会议员、州行政议员站在一块儿谈话，曾引来既羡慕又妒的奇异眼光，也因此面对过明的与暗的排挤力量。多一个人接近老大或党的核心人物，不啻自己爬升的路上多了块绊脚石，必欲除之而后快。我对别人投诸于我那种灼人的眼神甚为厌恶，这大概是我决定于1989年淡出政党活动的根由。迁来首都，与一些朋友提起自己的经历，他们咸认为上述现象不是霹州所专有，别的州属情况亦然，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也。

我对朋友的乌鸦比喻，感到甚难下咽。党员之间的感情放在哪

里？参加政党不是为了履践自己的一些理想和抱负吗？如果是，大伙儿又何必计较有或者没有分享到那一圈站在领袖身旁的光环呢？

朋友于是告诉我卡夫卡（Franz Kafka）的一则乌鸦寓言，故事大意是说乌鸦要上天国注定要失败。理由是本来就没有天国乌鸦，乌鸦飞上枝头作凤凰，或许还有一丝希望会实现，但飞上天国，企图改变天国的秩序，那就难逃梦想破灭的命运。朋友的意思，我猜想，是在暗示我，党的体系仿似铁桶一个，党员惯性牢不可破，能或不能蜕变成凤凰的乌鸦下场都一样，它/它们只能“继续黑下去”。

老实说，我颇反对朋友这种“抹黑”言论，亦不愿自外于政党后即批评党的种种不是。基本上我是个乐观，对将来看好的人。我对林总那句常常挂在嘴边的“佛洛伊德顺口溜”（Freudian slips）：“家和万事兴”有信心。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告诉我们，不经意流露的言语，又常常不自觉流露的言语，最能反映当事人潜意识里的真正意愿。党的最高领袖既然有家和万事兴的卓见睿识，何愁党不能团结，“枪口一致向外”？

怕只怕这么一句意义深刻的顺口溜只是“顺口说说”而已。正如不久以前才说过“领袖可来可去”的人，一回过身子便抛出一句“我党领袖是不可能被取代的”一样不能当真，两者都是不折不扣的党员惯性底流露，那就令人对党的运作机制难免杞忧了。

2000年7月23日

文学议题化

文学园地提供的是三菜一汤的例餐，这三个菜是诗、散文、小说，不一定润喉润肺的汤是文学评论。当然这里头也可以出现散文诗，或近乎诗的散文，甚或散文与小说难辨的雄雄体，但三菜一汤的“体制”基本上不变。

这种五十年不变的格局，就我看始终是要变的。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年代，一些声音会选择文学的渠道表达出来。于是乎我们在文学园地读到了立百病毒、广东义山等事件的反映。换言之，时事进入文学的场域，社会现象通过文学处理得以反映，当然，**怎样化短暂煽情的新闻为永恒持久的人性主题是作者面对的最大挑战。**

是的，三菜一汤的“纯文学格局”是在蜕变中。文学园地开始讲究包装，这包装应该有别于过去那重质轻又薄的所谓美工设计：这儿替一首诗画细框，那儿贴一丛花花叶叶为报屁股补白的旧式编排已经不够in了。文学版面会出现插画，会以色调轻重突出作品，某些标题可以放得很大（广告部的人会说那是浪费版位的那种大），字粒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囿限于宋体楷书黑方，能加强视觉效果的其他字型都派上用场。

以上所述的变革，其实是外表形式的变，像食物的诉诸美感，所谓“色香味俱全”，美感即是烹饪学的“色”，**文学版不仅要编得悦目，更要编得醒目。**

不过，更重要的变革仍是内容/意涵的变，那就是文学的议题化倾向。前面所说的把时事带进文学，如果焦点集中，便可辐凑成一重要议题，断简零篇或蜻蜓点水式的呈现还不足以言议题化。

何谓议题（issue）？经济风暴是议题，全国大选是议题，摇

头丸是议题，霸害也是议题，这些议题虽然表面看来与文学无关，却可构成文学作品的血肉。当然，文学的定位，文学史的撰写，文学思潮的辩诘，文学生态的变化消长，从断奶到经典的讨论，都是重要议题，而且是关系到文学主体的议题。

1970年代在台湾文坛掀起的现代诗论争，乡土文学的激辩，是《中国时报》副刊主编高信疆舍三菜一汤的老格调，先后推出来的热腾腾的生锅与炙人舌苔的蒙古烤肉，他成功地把文学议题变成文化课题。高信疆被杜南发称为“纸上风云第一人”实非过誉。**理想的文学组稿，不仅能吸引到文学读者，也要能吸引文化研究者、社会学者的关注。**文学议题化是文学与社会互动、挂钩之道，当然做得过火了，就可能把文学变成propaganda，陷入泛政治化的窠臼。过犹不及，这是作者与编者都得留意的。

2000年8月6日

多元文化与文化多元

最近出席一项文化座谈会，发觉不少与会人士并不了解多元文化论与文化多元论的差异，而几乎把它们视为同义，这情形颇令我骇异。

文字是十分蛊惑的传递/沟通媒介，多元文化主义是multiculturalism，文化多元主义是culturalpluralism，还原为英文，意涵可能清晰些。我国服膺的乃前者，即以马来文化为主体，其他种族文化为附庸的多元文化主义。只有官方认为适宜国情或不违反国家原则的其他族群文化特征，才可被接纳/融入成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通常这些文化特征与文史哲这些高层文化无关，被滥用的是较低档的文化表现，像舞狮、舞龙、耍大旗一类的表演活动。

这类活动在庆典或庆典游行中出现，自有它们的橱窗意义与作用，即让世界各地的人从电视或现场看到，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开放国家。除了马来文化，其他弱势族群的民俗/民艺也被接纳，营造出一种文化包容的印象。这样做自然有它的政治正确性，笔者关心的是，**当多元文化主义在实践时是把弱势族群的文化浮象橱窗化，那么它的作用仅限于拿来展览，人造花也是用来展览的，你觉得人造花有生命、有活力吗？**

前面提到多元文化论有其政治正确性，如实地说，它本身便是一种政治策略：让弱势族群的权益得到有限的保护，让代表各弱势族群的诸政党可以存活下去。

多元文化论不会对各族群的平等权利有正面贡献，因为这种论述，一开始便二分为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用芝加哥跨文化研究中心的发现，所谓“保留其文化特色”这种修辞，**究其实是把弱势族群更弱势化。**弱势族群的所谓文化特色，已论为主流搜集文化差

异的象征性点滴。“当家不当权”一类的话语，是“看起来像代表族群利益实际上又并不能代表”的另一种说辞。

在面对族群的文化遗产底更具决定性因素，像教育机会、学额问题，主流政治机制的表现便不再那么宽容。因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往往是一个族群精英阶层建构的最重要条件。任何族群，如果成员只懂得找钱，根本不把民族利益放在心上，这样的族群与剥了皮的羔羊没两样：任由操刀者宰割。

而文化多元主义是真正的文化包容，所谓“文化多元，互为主体”。与多元文化主义的选择性容纳、个别性摒弃，差别很大。政治宣传经常以假乱真，人们许多时候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制于各种霸权论述而黑白莫辨。辨识之道，最直截了当的方式是观察有关国家的高等教育状况与各族语文所面对的待遇。当然只知道马大设有中文系是不够的，你得知道中文系（不是汉学系）的学生是以什么语文撰写他们的学士/硕士/博士论文，你才能对整个教育形势，和多元文化的本质作出较近事实的估衡。

2000年8月20日

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中国电影

近期《亚洲周刊》发表了潘洁的《东方主义的电影迷思与陷阱》，文章讨论的是王度卢原著、李安导演的影片《卧虎藏龙》。潘洁认为《卧》片正如周润发演的另一部电影《安娜与国王》，同属“东方主义”（orientalism）意念下的产品。

“东方主义”这个词首先于1769年在一篇评论荷马（Homer）的文章里被使用。晚近比较文化学者萨伊德（Edward Said）将“东方主义”的涵义扩大，据萨依德的论析，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是柔性的、弱勢的、沉默的、贫穷的，恰好反衬了“西方”的阳性、强势、雄辩与富有。换言之，“东方”是根据西方先入为主的观念与想像塑造出来的。西方文化霸权的优越感认定“东方”是落后的，是一个柔弱苍白的“她者”。

西方对东方感到兴趣，是因为“她者”是一个可供窥视的客体。不仅是李安，即使一流的中国导演如陈凯歌、张艺谋为了跻身国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了中国的历史叙事，而把“中国”商品化，仿制/包装成东方的文化习俗展览，供应西方的“她者消费”。

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以京剧为舞台背景是别具深意的。京剧的华丽、喧哗与变化多端的脸谱，符合了西方人的东方期待，生、旦之间的性别错位，满足了西方对人妖文化的好奇心与窥秘欲。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则把中国“古董化”，张氏巧妙地发明/杜撰了中国习俗：用脚槌捶腿，妻妾成群黄昏时于庭院伫立，点灯、熄灯、封灯、燃着长明灯，等着陈老爷“宠幸”，目的是把“中国”符号化，让中国作为东方的表征，充满了可以层层挖掘的观赏性。

张艺谋作为一位成功的导演，他的技巧手法是多变的，《秋菊打官司》的人权之争，本身即饶有趣味，也更能讨西方人的欢心。秋菊在城里走着，镜头摇摄的是蝗虫那样的人潮、自行车、路边售卖货物的个体户摊肆，摄影机拍摄了老人空洞的目光、呆滞的表情、人们无意义的动作与喃喃，这种“贫瘠的奇观”（spectacle of poverty），正是西方对东方的总体印象。主角巩俐衣着臃肿，步履蹒跚，面颊因天寒而泛起难看的红潮，以及她说的陕西土话，对西方而言，既陌生又奇异，进一步印证了东方的落后与可悯底妾位。

至于李安的《卧虎藏龙》，李慕白追求道家的精神修为，又放不下感情的包袱，他的心态基本上是犹疑的、阴性的。由杨紫琼饰演的俞秀莲眉宇经常微蹙，心事重重，她和慕白一样都为情而苦。小虎那种阳刚、狂野却与西方的牛仔无异，玉娇龙那段冗长的倒叙，红番劫车的呼啸场面对看惯西部片的观众实在太熟悉了。这个突兀的片段严重地破坏了整部电影的格调。

本文并非影评，无法在这环节上深入讨论。我要指出的是李慕白的死，俞秀莲的守节，再加上跃落山谷生死未卜的玉娇龙，整个结局是宿命的、低沉而感伤的，用潘洁的观察：“恰恰透露了当今世界对东方文化的否定”。中国的艺术家、电影大师，自甘“东方化”，或刻意“东方化”，希望票房胜利，荣获奖项，名利双收，这样的创作心态，对当前技术愈见娴熟、思想未见深刻的中国电影，恐怕不是有利的因素。

2000年9月3日

不可小觑大众文化

在知识人、文化人的聚会里，大众文化是一个鲜少碰及的课题。

电视、电影、VCD、流行歌曲、漫画（公仔书）、武侠小说、电子游戏、卡拉OK……有什么好谈的？这些都是低档的、粗劣的、庸俗的东西。

虽说如此，但大家都心里有数，大众文化既然是流行文化，它的渗透力极大，职业无分贵贱，年龄不管老少，都受到它的影响。知识人的自傲，文化的人头巾气，可能使他们自绝于大众文化。为什么我们不考量一下，有没有这可能把若干知识、概念，透过大众文化这渠道，带入民心，深入民间？

以漫画为例，台湾的蔡志忠不仅把《三国演义》、《水浒传》及其他历史故事图象化，也把儒释道的某些哲学理念，用漫画的方式处理，使枯燥的哲理活泼化、生动化，变成生活中的智慧。本地漫画家近年来的表现一直在进步中，好些政治漫画，一张图象便能凸出某个政治现象，里头又巧妙地蕴含了作者的批判意识，可以解颐，也可引人深思。

以武侠小说为例，金庸的作品不仅语言文字见工夫，交织于故事脉络里头的人文洞识更是非同小可。已故陈世骧教授对金庸推崇备至，誉之为“细至博弈医术，上而惻隐佛理，破孽化痴，俱纳入性情描写与故事结构中。”中国学者陈平原指出当代/现代小说已甚少写佛文化，他说：

“……在被称为通俗文学的武侠小说中，佛道文化仍在发挥作用，而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以致可以这么说，倘若有人想借助文学初步了解佛道，不妨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

学校的图书馆其实无需视武侠小说为洪水猛兽。中学生、大专生读还珠楼主、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不仅可以加强自己的语文基础，对文言多点认识，也可以释放自己的想像力，从这些阅读中略窥佛家、道家的哲学思想。

武侠小说当然有它的缺陷，像争夺武林霸主，为一部武学秘笈各门派拼个你死我活，甚至“无招胜有招，无剑胜有剑”的禅境都被公式化，大量地被套用。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批评大众文化俗套刻板，缺乏创造性，不无道理。高手如金庸也未能免于平庸之讥。《神雕侠侣》第十二回的连场武斗，争的正是武林盟主，但情节却另具创意。一灯大师的弟子朱子柳以笔为兵器，每招每式用的都是书法，他与西藏的霍都王子比武，朱子柳以创自“房玄龄碑”的招法对付霍都，那知霍都亦晓这套书法，彼此打个不分胜负。以书法入武已见创意，但是金庸奇笔独远，竟然蔓衍出下面这样的情节：

朱子柳见他识得这路书法，喝一声采，叫道：“小心！草书来了。”突然除下头顶帽子，往地上一掷，长袖飞舞，狂奔疾走，出招全然不依章法。但见他如疯如癫、如酒醉、如中邪，笔意淋漓，笔走龙游。

后现代大师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认为大众文化亦不尽如法兰克福学派所言刻板俗套，因为大众文化往往隐含着折射群众渴求的某种“乌托邦冲动”（Utopian impulse）。乌托邦是无有之邦，正如陶渊明的桃花源乃无有之乡，它们都是虚构出来的，是想像力高度发挥的结果。要提升大众的文化品味，要鼓励大众的文化参与，漫画与武侠小说的力量实不可小觑。

2000年9月17日

从私性社会谈到隐性社会

读潘永强先生的大作〈华团纠纷突显“私性社会”性格〉（《星洲日报》言论版，2000年7月28日），内心有许多感触。马来西亚华社是一个移民社会，它有移民社会的种种特征，常听到的是身份、文化认同的问题，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分裂使移民成为边缘人，面对认同危机，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议题。对华社以至于华团的“私性”过于彰显，对公共利益不是隔膜便是缺乏认知，甚且把公共事务以私人方式处理，这现象则较少人论及。

从华社的“私性”，我联想到的是马来西亚社会内里另一个“隐性社会”的存在。主流政体着重的是现有的“模式维系”（pattern-maintenance），主流以外的少数（或大多数）面对权威政体，能/敢抗争的谔谔之士毕竟不多。这些人或阳奉阴违，或保持缄默，当中包括学有所专的知识分子，也包括贩夫走卒的市井人物。我们不要小觑市井之徒底政治智慧，他们虽没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学术训练，能把当前政局的种种症结条分缕析出来，他们在咖啡店议论当前政治情势，褒贬政治人物，如果当朝权贵肯放下身段去聆听，也会从中听到许多一针见血的评议。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士，自成一个隐性社群，或冷眼旁观、或热烈批评政治现状与趋向。

这些人的隐性，在大选期间最常显现。他们可以出席执政党举办的讲座与活动，甚至可以与大伙儿一齐高呼国阵万岁，但到投票日，他们却悄无声息地把选票投给反对党。至于乘坐国阵提供的交通工具去投票站，却不把选票投给国阵，这现象就连国阵的助选人员都感觉得到。

当然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着显性社会与隐性社会

这事实。在朝与野就有显与隐之别。一个正常的社会，隐性社会与显性社会不一定是“敌对性”的（antagonistic）。隐性社群虽在一些问题上与显性社群有分歧，但它们之间有某种相涵性，因此可以“共生”（symbiotic）。在一个较特殊的国度里，两者分歧十分尖锐，社会结构乃出现断裂（disjunctive）。显性社群踌躇满志，趾高气扬；隐性社会则充满了无力感与疏离感。这样的发展当然并非国家之福祉。

过去的隐性社会缺乏互动能力，是一种较静态的存有。今日的隐性社群却通过互联网而互相挂钩联系，衍长扩大，其成员声气相通，互传讯息，对主流政体、权威组织作出分析批判。这种力量一直在增长中，而许多在受监视（或间接管控）的公共媒体上看不到、读不到的消息，都可在网络上找到。尼采与马克维里（Machivelli）的统治术与权力意志在网络世界里不断被稀释、颠覆。

对国家而言，理想的隐性社会应该能与政治主体相辅相成，甚至相生相克，正如反对党于执政党那样，发挥良性的监督力量。任何霸权都是危险的，它需要适当的“制约与平衡”（check and balance），如果隐性社会与显性社会能构成“互以为力的双元体”（reinforcing dualism），它便可以发挥正面的作用。我国领袖正在谈着“整合”（integration）这课题，打破隐性与显性的两极趋向，寻求运作性的、功能性的综合，应该是当前迫切的政治考量。

2000年10月15日

听林福南演讲

我当过廿九年教师，从我的专业训练和这些年的讲课经验来衡量，林福南的演讲算不上特别好。最近他在一个场合上谈文化创意，把八千字的讲义撇在一边，原因是“没有可能在三十分钟内念完，既然念不完，有头没尾，干脆自由发挥好了。”

当他把这理由告诉我时，老实说，我并不认同。我觉得即使念不完讲义，也应该在重要的论点上下工夫，主题要阐明，要点不能遗漏。后来想想，原来这正是自己的演讲风格，我又怎能以自己的格调为标准，要求别人演讲也跟我一样呢？

我的演讲或可称为“痛苦的陈述”。一个看法，一个意见，总想多方面说明，反复印证：一个问题衍生另一个问题，一个现象蔓延出另一个现象，瓜瓜藤藤，我在台上讲得十分吃力，深恐听众不明白我的意思。听众也出力用眼睛盯住我，担心偶一眨眼即被我解读成“不用心听书”，被我嘲讽一番。而我是有骂人的坏习惯的。

这些年来我多拒绝参与公开演讲这样的苦刑。至于学术场合，幸亏自己没有什么份量受邀参加，否则一、两万字的论文用十五分钟浓缩成“精华”（extract），真会要了我的老命。我的一贯处理方式是把一、两万字的内容，高度概括化，专有名词一大堆（原因是专有名词概括性强），至于这些抽象名词如何打通关节，则十五分钟的演说也是办不到的。结果是我一定讲得极不惬意，而我的听众也一定气得半死。

真的服了林福南那天讲文化创意，全程三十分钟，他用二十分钟讲出海钓鱼的经验，用剩余的十分钟回到正题谈文化创意如何守值、增值、汇值、创值。碰到听众提问有关知识经济、文化与商品

化的问题时，他的答案竟是：

“假设你是在沙漠上，大家都干渴到半死，你手里却恰好有一罐矿泉水，沙漠上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陈再藩，一个是陈友信。如果你重视文化，把矿泉水递给陈再藩，救活他再说；如果你认为商业考量更重要，把矿泉水高价卖给英迪学院的院长陈友信，赚他一笔。”

真系搞笑。福南可以把一个大问题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处理，看官请注意，林福南讲这话时，两位陈先生就坐在他身边。他是顺手捡起他们来现场示范，大家当然笑作一团啦。

研讨会过后回到酒店里，我不断思量，演讲一定要制造笑弹才算成功吗？演讲是不是讲者轻松、听众同样要求轻松的游戏？

我于演讲是紧张大师，不是希治阁那种悬疑震栗的紧张，是深怕见解不够周延，表达时或过之或不及的那种心理恐惧。我注重观点的内在性，出力发功把各观点的内在性贯通，一股脑儿塞给听众，完全是降龙十八掌的势头，走的是少林派刚猛的路子，甚至不惜用一灯大师的一阳指“挑战”听众。林福南的武功则近乎张三丰的太极拳，有武当派的阴柔灵动，借力使力，智取巧攻，兼而有之。

撇开这些武侠比喻不用，我的演讲，奥美一点大概可以称为学院派，或至少沾点学院风，这是教书多年养成的习气，好坏不是自己能评鹭的。林福南重视他与听众的互动性，用的是营销策略（marketing strategy），目的是把产品推售出去（概念也是一种产品）。他不讲高档理论，他的语言企图触发听众的自然回应与由之萌生底联想。如果做得过火，有油嘴滑舌之弊。

我向往的是诗人余光中教授的博学多识，风趣隽永，与香港中大副校长金耀基教授那种亦庄亦谐，如吐珠玉的表达方式。唯这事关乎学问与性情，可能是自己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境界。写这篇文章，愿与福南共勉。

2000年10月29日

庖丁解牛·福南《解马》

林福南的《解马》，肯定不是一本好书，我的意思是说，从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角度来看，它甚至不是一本入流的书，从马悦然教授的角度来看，《解马》绝对是本差劲的书，因为它没有高行健《灵山》里头的灵气；《解马》里头的“马”也非“马悦然”。

（一）

谈《解马》可能还得先了解林福南这个人。傅承得在序文中罗列了十个林某给一般朋友的印象，方法是用对了。个人对林福南的第十一个印象是相貌清奇带古意，这种“现代古人”很少，但还不等于没有，前联邦总督学王品棠博士与演员午马在不同程度上庶几近之。今人古相往往会有特殊的机遇与成就。

我应该在这儿赶快补充的是，林福南比王品棠、午马似乎更幸运些，因为他的古典气质没有骨董感。吾友王品棠五官棱线分明，头角峥嵘；午马面目在憨厚与狰狞之间，林福南的长相却像个新科状元，脸上永远挂着上了榜的喜气。我前面用的比喻都是认真的。这不仅是外在形象，各位看官谈《解马》，不翻查谁是作者，生于什么年代，你可能以为手里拿着的是写成于两、三百年的明清笔记或读书笈记，我想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切入讨论《解马》吧。

（二）

我这些年观察“紫藤一大将”谱系的傅兴汉、傅承得、林福南三人，发觉“热情组合”的三位成员文体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古意。他们大概都不是胡适的信徒，不相信“我手写我口”这回事，对

“的呢吗”的表达方式总觉得欠缺了些什么，而终于集体领悟出语文要淬炼、提升，文言实不可偏废的道理。三人当中以林福南的文言倾向最为显著：

某日赋闲，与镇中友人到热带雨林涉溪探奇。

在山林中，吉普车颠簸行进，良久，寻得一段河溪，其上断木横亘，其傍古木参天，藤蔓糾结，象踪犹存。

友人觅点垂钓，已则歇于断木之上，俯视山溪不息奔流，闻其声喧而不哗；仰望古木落叶纷纷，见其频密却意态悠然，忽解一首禅诗意境：

竹影拂阶坐不动，月轮穿沼水无痕

水流任急境常静，花落虽频意自闲

此境，至今未忘。知大自然运作，动静原来一体，乃庸人如我，自因迷境尔。

这篇短文从起首到中腰，都仿似陶潜的《桃花源记》，俟至禅诗浮面，读者才惊觉林福南无意于落英缤纷或落叶纷纷的抒写，他要点出的是个人一刹那的“顿悟”（epiphany）。

不过，广泛阅览禅宗公案、吐语如偈的林福南，由于心悬江湖，姿态入世，往往无法维持“欲语还休”的话请策略，像《流动是江河唯一的出路》前面一节：

江河成形，常始自泉眼一口。

初则泉涌溢出，寻地势低处漫流，渐集而成溪涧，匿于山林中流淌，遇地形险折处，或化身为飞瀑、冲激成泓潭，或遁迹入土，潜为地底河，尔后再冒现地表，寻势奔流。

流向遇阻则调节流向，于可汇合处则汇合成川，累月经年，蜿蜒大地，终成滔滔江河。

此口泉眼，如喻示人生，可以象征一种理念，一种价值，以至一种信仰的启蒙。

第四段明说泉眼喻示什么，象征什么，过于明说就少了些“想

像的留白”了。或谓作者藉泉源起始之说发挥个人对人生、文化的某些见地，亦未可厚非；至于假借《犹太的智慧》把里头的一个故事情节里头的道具烟囱，改写成污桶，读者智商在九十以上者肯定能领会个中深意，实无须于文末注明影射某政党云云，可见福南吐词简约虽近乎偈，有时心太烘热，无法保持适当的美学距离，解马时就露出了马脚。

（三）

福南擅讲故事，更巧于故事新编。一些故事牵涉到牛鬼蛇神与十二生肖里的其他走兽，读来更像寓言。这些寓言恐怕儿童不宜，因里头往往微言大义，针砭时弊，批评社会现象，抨击政治人物，力量颇重，幽默是伪装，棒喝是目的。

承得说福南佛学懂得不多，愚以为根由是贪嗔痴三毒当中，他起碼动了嗔怒。读《谏马》、《荒谬告解》、《生肖物语》、《狗字辈》、《正常非常说》诸篇，我看到一个笑口常开的人的怒气竟可喷薄至斯！我的一个朋友说看了上述篇章他忍不住要笑，但笑过之后舌底苦涩，竟然有点像喝了泡得过浓的冻顶乌龙的滋味。《汉都汗》可能最好笑，但对我来说苦中带辣，品茗后晚上可就睡不着觉了。

《解马》后半部的读书感想、人生小悟、卖茶心得／哲学和他对文化创意的一些意见，语调平和又不失风趣。就文体来看，福南擅于长话短说，胜在精简，不少篇章像格言、座右铭与对人对己都有警策作用的勉言隽语。他似乎不怎么擅长铺陈蔓衍，以辞采取胜。他的“静态陈述”（static discourse）太多，读多了像听福南用文言训话，难免有累的感觉。

以严格的标准衡量福南的文言，也有斟酌提升之余地，前引《触景小品》最末那段：“此境，至今未忘。”或可改写成“此情此境，至今未忘”或“当时情境，至今未忘”四字句型在这儿

读来似较顺耳。中文多的是复语与互文构成的同义并列、近义并列或反义并列词，孤立语素像“此”与“境”凑合起来仍不免有突兀感。

我较喜欢福南的动态抒写：“如此想来，这些年来的政治也是一场飞行游戏。政客是技巧娴熟的飞行员，选民则是伫立岸上的一群企鹅，惯性仰翻一地，朝天唏嘘。”（《企鹅·鲸鱼》），觉得他如果要进一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妨在文体、语调，也就是 style 和 tone 方面多些锤炼，多来点《企鹅·鲸鱼》的奇语野趣。公安竟陵，袁氏兄弟的性灵小品，可谈心，可谈禅，可闲适自在，可斗然不羁或可供借镜。不过我以文学角度赏析《解马》，再以文体苛求林福南，这哪里像评介，倒更像“鸡蛋里挑骨头”，以《春秋》责以贤者了。

2000年11月26日

后现代抑是赶时髦？

我一直不忍批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几个月前发表的《在现代与后现代的回廊上沉思》一文，颇能反映我内心的矛盾。张锦忠博士好几次提起马华文坛的现代主义算不上 high modernism，我有同感。换言之，现代主义的路还没走完，马华文学还处于现代主义发展过程的某个阶段里。我们有必要跟着中国台湾追时髦地后现代起来吗？

刘再复曾告诉李泽厚发生在他身上的难忘经验。刘去芝加哥大学听解构主义大师德希达（J. Derrida）演讲，两个小时只讨论“gift”（礼物）一词。德希达解构的结果是礼物不再是礼物，因为送礼物是希望别人有所回报，即换取另一种东西，故此礼物不具礼物的意义。

经德希达反复论证、解构的结果，文学也不是文学，艺术也不可能是艺术。李泽厚指出德希达的理论够时髦，够极端，因此有了广告宣传的效应，这样的理论便销得出去，有许多人追随。

李泽厚指出把语言无限上纲的结果是，不仅文学被稀释，甚至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也被颠覆了。后期的维根斯坦（L. Wittgenstein）认为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在语言，而语言没有因果，只有语法，语言的表达方式，习惯用法，因此，哲学归根究底只是语言的一种表述。维根斯坦把语言游戏，视为哲学本质与生活形式，其危险与误导性不言而喻。

受过严格历史训练的学者如李欧梵，对中国是否要跟着西方的尾巴走后现代主义的路，不止一次提出过质询。李写过一篇题为《现代性及其异议》的文章提出：“……我们是否必须置身于‘后现代条件中’，或我们应该继续考虑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工程’？”

李欧梵戏称自己是个“半吊子的后现代派、后现代式的人物”，反映了他对后现代的保留，他对当前大陆年轻一代的追逐时尚、盲目拥抱后现代感到忧虑。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李欧梵显然看透了“后现代”历史感的薄弱。詹明信（F. Jameson）很早便指出后现代的平面感与深度的消失，这种深度包括空间深度与符号深度。现实不是真相的存在，只是个别的文本（text），供不同人解读与解构。广告的泛滥使语言与事实异化，最终是语言的“物化”（reified）。当刘再复询问年纪比他大九岁的李泽厚：

“后现代主义，最后就剩下广告。我看不到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影响下产生的大作家和大文学艺术作品，不知您看到了吗？”

李的答复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产生了一些优秀作品，他们在反抗传统形式中也建立了自己的形式，写出一些有新意的作品，但后现代主义就看不到了。只有建筑例外。”

李泽厚的批评十分锐利，他进一步指出：“……所谓后现代，就是极端现代，就是现代主义的商品化、市场化。后代表面上反现代主义，实际是现代主义的商业化。现代主义还有个性，还有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后现代丢弃了个性，丢弃了批判精神和反抗精神，把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变成装饰。”

刘再复担忧的是：“后现代主义假如真的把握作家，作家非但失去反抗功能，而且还会连什么是文学艺术也搞不清楚。……我已发现一些诗人被后现代搞得晕头转向，不知道怎么写诗了。”李泽厚比较乐观，他说：“我相信德希达等人的解构主义已走到尽头，下一个世纪（廿一世纪），这一套很难再愚弄人了。”

在马华文坛，尤其是诗坛掀起后现代风已逾十载的今天，批评这股风潮可能会使人觉得自己落伍了。当我对照、摘录上述三位理论家的意见，凸显后现代主义的问题时，也许马华文坛的保守派（包括今日近乎销声匿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人）会觉得很悻

意，但他们肯定是表错情了，我完全无意与彼等沈溺一气回到前现代里，这是个层次与视域的问题。

我对后现代作品，不管是诗、散文还是小说，只要写得好，我会衷心赞誉。最近有缘读了一大叠年轻人的诗稿，其中包括参加某团体举办诗创作比赛的作品，发觉谜语似的、叠床架屋的后现代诗泛滥，情况之严重使我联想到以晦涩难懂著称的台湾1960年代现代诗。语言词汇虽不一样，雕琢堆砌的毛病却相同。有时我难免这样想，如果像我这个从1958年便开始读诗、写诗、写诗评论的人都看不懂（也 feel 不到）当前的一些所谓后现代诗作，马华的三尺诗坛究竟还有多少人看得懂？

如果这篇短文像盆冷水，能使当前的诗人清醒些，纵使有人埋怨我大煞风景，说些椎心逆耳的话，还是值得的。

2000年12月10日

起死回生的一骂

熊十力脾气大，既自我又自负，经常骂人。冯友兰访熊十力曾有过一次重要的哲学对话，冯认为“良知”只是假定，熊毫不客气地反驳：

“你说良知是个假定。这怎么可以说是假定。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个呈现，这须要直下自觉，直下肯定。”

冯友兰听后木然，无以回应。冯熊二人是平辈，熊十力批评时语态算是温和的了。熊老在北京大学讲课，直率地说：“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他都是馊扯。”这么巧听他说这番话的学生，里头就有一个牟宗三。熊十力的这位得意门生后来成了新儒家的一代大师。

徐复观在《我的读书生活》一书谈到自己读书的渊源，原来他曾被熊老痛斥过：

“我决心叩学问之门的勇气，是启发自熊十力先生。对中国文化，从二十年的厌弃心理中转变过来，因而多有一点认识，也是得自熊先生的启示。……他老先生……怒声斥骂‘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光看出他的好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这一骂，骂得我这个陆军少将目瞪口呆。这对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恐怕对于一切聪明自负，但没有走进学问之门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回生的一骂！”

徐复观聪颖过人，何等自信，熊老对他的怒斥，使他顿悟自己

过去做学问的路子走岔了。徐老后来在东海大学授课，有乃师风，严厉决断。杨牧修过徐复观开的老庄和韩柳文两门课，听徐老分析〈平淮西碑〉、〈柳州罗池庙碑〉的技巧、结构、用字，终能把把握韩愈文体的精神肌理，徐老于1982年逝世，杨牧于悼文里特别提到那段如沐春风的日子，他说：

“我们若是想把白话文写好，模仿白话文大师的文体是不够的，必须从古文中深入体会；而我最初窥见古文的艺术堂奥，还是他当年讲授韩愈两篇文章的启发。”

徐老亦如熊老，骂人很凶，他甚至写过〈给我的一个学生的信〉责备杨牧并抨击现代文学。徐复观论李商隐锦瑟诗，杨牧写了篇读后感，因为搔不到痒处也惹怒了徐老。杨牧说过一句近乎剖白的话：**“二十年来我处在一种战战兢兢的精神状态里读书写作，有一半是希望能减少徐先生的责骂，多得到他的赞扬。”**

徐复观对痛斥过他的熊十力特别推崇，肯定《十力语要》、《新唯识论》是不可多得之作，而熊十力的逝世对徐复观而言是“中国文化长城的崩坏”。徐老去世，杨牧的心情是“茫茫然沉入寂寞彷徨中……我不但体会那文化长城的崩坏，而且还失去了我应有的继绝的精神。”贤徒对严师的感情如此深厚，一般俗谚如“饮水思源”是道不尽内中底蕴的。

从熊十力、徐复观、杨牧的事例，我领悟到老师严厉，有些时候固然会吓走一些学生，但另一些学生却可能从中受惠，在课业上奋进突破，有所超越。走笔至此，我反而十分羡慕当年的徐老遭遇刺令他起死回生的一骂了。

2000年12月24日

电视文化的省思

电视作为一种新产品，首次在1939年于纽约世界博览会公开展出，吸引了无数好奇的目光。才六十年光景，电视已渗入社会的每一个族群层、年龄层、职业层，影响之深远可谓无远弗届。

走进任何一家人的客厅，我们都看到客厅一角供奉着的正是电视，它通常摆置于客厅的某个显眼位置上，方便众人目光凝视。电视荧光幕的情节，牢牢控制着每个受众的情绪，这情形不难从受众的表情察觉出来。电视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大家未必自觉，媒体学者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说得好：“水的存在是鱼不知道的。”

从前一家人下班或放工回到家中，饭后谈谈家常，其间不乏争执、欢笑，十分“人间”。今日的家庭伦理却被电视的出现扭曲了，家人之间不仅无暇亦无心于闲聊，傍晚6时到8时之间，黄金节目推出的时段，一家数口甚至连吃饭也不能专注。X-File的一个紧张场景可以使大伙屏息、停筷，在这扣人心弦的一刻，谁开腔说话，那是自讨没趣，搞不好还挨人叱喝呢！

是的，收看电视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些人可以每晚下班用过饭后便坐在电视机前面，一晃数个小时，什么节目都看，到午夜才算尽兴愿意上床就寝。电视的节目其实都换汤不换药，在相同或类近的题材上变奏、改装，由不同演员演出，是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复制与再生产。由于电视文化是属于老少咸宜的大众文化，因此主宰节目制作的人，可以通过电视的力量长期性、累积性地进行文化麻醉，甚至可以解除具体社会行动的武装。

当然电视文化有传递知识、资讯的作用，但“传递”

（transmission）模式，重点在于跨越时空的资讯输送与支援，这种资讯传输与其他物件的运输，道理相同，都是在克服地理的间隔。另一位媒体专家鲁宾（A. Rubin）于1986年撰文指出，收看电视的动机不外乎两种，即工具性（instrumental）与仪式性（ritualistic），“前者的观众以电视作为了解世界的工具，收视目的在于获得有用的资讯，而后者的观众则以休闲娱乐，打发时间为目的，是一种习惯性、仪式性的行为。”

有一点必须郑重阐明的是，无论是哪种观众，他们从电视画面看到的社会状况，很多时候是片面的真实，而不是事实的全部。通过人工的刻意剪接，电视甚至可以传播假讯息（以假乱真），或当局要收视群众接受的所谓主流讯息。

艾柯（Umberto Eco）在《创造性与重复性：在现代与后现代美学之间》一书，指出电视文化是低阶的美学，因为“过量的欢愉、自我重复、老套烂调，感觉上像广告伎俩，而不是一种新世界观的煽动性提议（provocative proposal）。大众媒体的产品与其他工业产品一样，是连续生产的，而连续的制造不能视为艺术创作。”布希亚（J. Baudrillard）也曾发表过相似的见解，他说明电视文化所提供的是“最低普同文化”（lowest common culture）。

最近Astro的邱富源先生与NTV 7的陈文贵先生，先后来电邀约我在电视上谈一些有关春节的课题，我因个人原因婉拒了他们的好意。大家聊起来，知道他们两人都有各自的计划，打算改革、加强资讯传播的内涵。我一方面为他们的理想感到高兴，一方面却也难免杞忧。

十五分钟或三十分钟的电视新闻报道，已成为一种颇为刻板的程式，新闻都简短扼要，不够深入，激不起受众底思考。报道的策略在现象上下工夫，却往往不提或忽略了现象背后的本质因素。

布希亚曾单刀直入地指出要改变大众媒体的内容，必须改变其形式。十五分钟/三十分钟的电视新闻框框太陈旧、太呆板，而它

目前的使用方式已被合理化/逻辑化。除非有人以其过人的魄力、新颖的创意，锐意作出兴革，又能得到电视台主事人的支援，当前新闻追踪的框式才可望突破。希望有心人如邱、陈两位先生，能大胆试验、实践他们的构想。

2001年1月7日

符号·拟像·真实

电影文化与电视文化仿似孪生兄弟，大小银幕之分不是我要讨论的问题，我关注的是媒体的符号与意义，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的关系与衍变。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不断讨论符号（文字、线条、色彩、声音……）如何“再现”（re-present）真实。花圃上的玫瑰，与恋人送来的带有爱慕暗示的玫瑰，意义截然不同。艾柯（Umberto Eco）指出自然界的符号，可以转化为文化符号。如果我是导演，我只要拍摄天空一角密聚的黑云，受众便会联想到那是暴风雨即将降临的符号。

符号的意义有它约定俗成过程，这牵涉到社会习惯与社会认同。十字架代表基督教，开香槟代表庆祝，手指竖起V形代表胜利，都是约定俗成、社会化的结果。有趣的是，如果在竖起的V形之间，用另一指穿过，那就变成猥亵的手势，**手势本身是中性的，在符号化之后才能产生正面的或负面的意义。**

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把符号的阶位分成四个层次，即：一、符号是真实的反映；二、符号扭曲或掩饰了部分的真实；三、符号完全遮掩了真实的缺席；四、符号与基本真实毫无关系。第一层次是真实的“良好拷贝”（good copy），第二层次是邪恶的拷贝（evil copy），第三层次则是恶意的耍弄（nasty play），第四层次是“拟仿”（simulation）。

大家所熟知的“超级麦斯”（Max Headroom），是电脑技巧拟仿出来的第一个电视文化英雄。至于藉摄影技巧拟仿出来的电影英雄，从成龙到史泰龙，多到难以计数。第二、三层次的符号编码，使受众在电视画面得到讯息，如战争的正确性、示威群众的破

坏性、警察执行任务的公正性，摄影机不会说谎，但编导剪接人员会，而且轻易便能做到。

过去媒体是群众的外在联系，前者是讯息发出者，后者是讯息接收者，在后现代的时空里，电脑的广泛使用，使人们可以在家里接收外界的讯息，外在资讯侵入私人生活，公众空间愈来愈“私有化”。媒体透过电视、电影所塑造的“拟象”（*simulacrum*），和各种商业意念推出的市场行销形象，似天罗地网把群众笼罩于其间，甚至渗入群众的生活内部，成为社会身体的一部分，幻象与真实愈来愈混淆不清。

古惑仔系列电影流行，街头巷尾忽然间多了许多服装、发型、举止、言谈都像古惑仔那般“酷”的年轻小伙子在晃荡。报载万梓良拍《流氓大亨》，曾有一段长时间自我认同为该剧男主角。郑少秋的“丁蟹效应”，在香港是令人闻之丧胆的股市下坠讯号。拟象与真实竟然可以那么打成一片！

根据研究资料，当了总统的里根曾大量引用他以前在好莱坞拍过的二、三流影片中用过的语汇，里根甚至在姿态、语态方面有明显模仿电影中的角色底倾向。现任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左看右看，还是酒徒、赌徒、好色又偏偏兼具若干“正义感”的不羁侠客（*vagabond*）。当了总统后，埃斯特拉达除了衣着整齐外，他还是禁不住自我模仿，不过他现在看来侠盗的成份，恐怕比侠客的成份多些吧。

媒体空间侵占大众的心理空间，符号与真实之所以如此混乱，那是因为拟仿生产“过份的真实”（*hyper real*），使人们沉迷于真假难辨底情境里。拟象大量地流通，受众通过电影、电视节目堕身各种荒诞不经的幻象里，陷入晕眩（*vertigo*）、麻痹（*stupefaction*）、狂喜（*ecstasy*）的各种感官刺激中。令人担心的是，受众长期处于这种海市蜃楼（*mirage*），感觉最终必然“钝化”（*inertia*），丧失了价值观念、意义自觉与选择权利，这样的受

众只好任人摆布宰制了。

2001年1月21日

沉默的大多数

1999年大选竞选后期，政党领导人终于出来说话了：“……沉默的大多数支持的是我们。”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一厢情愿的臆测，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大多数”（majority）的重要性，“大多数”是我们周遭熙攘的人群，它甚且包括你和我在内的“我们”。

狄雪图（Michel de Certeau）曾经这样说明“沉默的大多数”底特征：

“在历史的洪流中，沉默的无名英雄——在街道上踏步往来的每一个普通人——扮演着古老又神圣的社会文化角色。……（它）是无限的、无名的、连绵不绝而支离破碎的。它是没有策略的，因此它虽然声势浩大（它不‘代表’大多数，它‘是’大多数），但缺乏可予辨识的腔调，缺乏可以言说的身份。”

由于大多数的“沉默”，它可以任意被有心人挪用，把它放在不同的立场上，当然是对自己有利的立场，然后塞一个扬声器给它，由躲在它身后的人代它“发声”，宣示它的意愿与动向。

沉默的大多数底成员当然是人民。今日的领袖都了解假上帝之名办事，远不及假人民之名办事效果佳。假上帝之名有宗教的顾虑，假人民之名反而容易成为民族或国家英雄。今日为民请命的人愈来愈多，就是看好了“人民”（people）好用，人民的沉默性格如巧为解读，最能营造对自己有利的形势。

Pierre Bourdieu在他的著作《人民的用处》曾开宗明义地问：谁被授权谈“人民”（speak about the people），谁又被授权代表“人民”说话（speak for the people），当每个政客都异口同声、信誓旦旦地说他是“为人民服务”，而人民的处境仍是无语问苍天

时，那情况便很滑稽了。

为了巩固权力，一些国家领导人甚至要制造人民的对立者，即“人民的敌人”，以便凝聚朋党的向心力，在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在异质多元的社会里，塑造“人民一体”（people-as-one）其实是虚矫想像，把异议分子都化约为“邪恶的他者”（the evil other）是要弄权术者常用的政治伎俩。毛泽东有一句名言：“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必须团结起来，与百分之五的敌人斗争。”他便是用这理由和策略整肃了大批的政治对手。在世界上最大的人民共和国里，“人民的敌人”其意义与内容一直在变，从知识分子的陈独秀，但亲苏维埃的王明，到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都可被归类为“邪恶的他者”被整掉。

民主的基本理念是必须承认社会是异质与多元的、浮动与开放的，它不容许被任何单一（unitary）的政治路线所垄断。意见不同亦不代表分裂与敌对，否则，我们会把小布什与戈尔势力不相伯仲的总统之争，错误解读为美国已分裂为两个：一为共和党美国，一为民主党美国。至于把提出反对意见的人，都视为破坏国家团结的极端分子，则不仅不了解民主，即使是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都没有给予起码的尊重。

人民是政治人物手上的筹码和权力基础，这个铁铸般的事实对执政党与反对党皆然。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人民正是那浩瀚的、能量巨大的海洋。在一般情况下，海洋的起伏波动都为外在形势所规范/制约，只有在大自然出现巨变时，它才会出现“逆反”（reversion）现象。有意于2003/2004年出来竞选国州议席的先生女士们，对这种天变人变底发展不宜掉以轻心。

2001年2月4日

回应许德发的“文化语境”说

在“期待马华文艺复兴”座谈会上（见《星洲广场》，2001年1月21日），《人文杂志》的执行编辑许德发提及文化语境的变，其实这种变迁大家都在不同层次有所感知，只是正式提出来讨论，仍甚罕见。

许德发说十年前，大概没有什么人会用“文化霸权”、“他者”这些名词，情形确是如此。十年前，何国忠在一篇文章里用到“边陲”一词，受到赞誉，被认为新颖。就许德发举的这个例子，我倒是有意见。

现任香港中大副校长金耀基教授，在1970年11月发表论文，题为〈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从“中心”与“边陲”之概念以了解中国百年之变〉，使用上“边陲”这个词，当时的金耀基博士才卅五岁，任中大新亚书院社会学系讲师。

在1970、1980年代，“边陲与中心”这个政治/文化观念，在港台两地曾多次被讨论过，一个在1970年或更早就出现了的词汇，在1990年代的马来西亚知识界被认为新颖，这就反映出本土于观念把握的明显落差。金耀基那篇文章后来收入《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一书，于1971年出版印行，国内的文化人如果错过了这部重要的社会文化论著，也间接地反映了另一个现象，那就是资讯流通的壅滞不畅。

今日的文化词汇的流入，最主要的管道当然是报章、杂志等媒体，中港台三地出版发行到国内的书籍，同样扮演重要的角色。

文化词汇的改变和增加，使文字描绘与论述各种文化情境能更准确精要。就以文化语境的“语境”一词为例，在1970年代一般人会用“文义框式”（context），但语境可以是不同前提下的语境：

政治语境、殖民语境、后现代语境……如果仍然沿用过去的“文义框式”这个词；政治的文义框式、后殖民的文义框式……等等，那就累赘不堪了。

许德发提到“他者”一词，如果不熟悉文化批评的读者，看到戴锦华写的〈遭遇“他者”——新中国电影与第三世界批评〉，或廖炳惠的〈阅读他者之阅读〉，他会感到诧异，这不是读者没有见识，起胡适之傅斯年罗家伦台静农诸硕学鸿儒于地下，他们在面对这些新词汇时同样会瞠目结舌，不知所云。时代在变，新的学说有自己新的一套表达语汇与方式，这些学说衍生出来的专门术语或夹杠（jargons），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们已侵入学术思想与论述的领域，不容忽视。

有了“他者”（other），就派生出“他性”（otherness）。既然承认“他者”的存在，“他者”便有自己的疆界，讨论拉美文化、非洲文化、香港文化，便可用“他性修辞”作为话语策略。

而“他者”的疆界，根据德勒兹（G. Deleuze）与葛达理（F. Guattari）的说法，可以在“去疆界化”（deterritorialized）之后“再疆界化”（reterritorialized），找到自己的声音与位置。而“他者”的论述，可以累积成为“他者工业”。拉拉扯扯谈了那么多，目的不外是强调：一个文化词汇的诞生，可以衍生出许多相关的、连锁的并且可能是愈来愈重要的概念。

像许德发提及的“文化霸权”，不仅与文化和历史的诠释权有直接关系，也牵涉到帝国殖民主义对属地所进行的知识编码与制造，以及东方主义（orientalism）那种强势文化生产关于另一个文化的知识，并通过这种知识生产来实行文化霸权。还有文化霸权也可能涉及中心与边陲的争议，不过，今日的论述，反而喜欢沿用“边缘”这个词。

如果允许我进一步引申，边缘他者固然可以被中心再现，也可以在文化混沌中另觅新秩序。相对于中心霸权，他者的“无

权力性”(powerlessness)，也可以是另一种形态的权力体现。文化霸权的掠夺性，与弱势族群的幸存策略(Homi Bhaba)，都是饶有兴味的政治、社会、文化大课题。文化语境的变，其实是随着大环境思维系统的变而同时出现，很难分孰先孰后。我们只能说文化语境变迁得愈快，社会、文化体制也变更得愈迅速，这种“后现代现象”(postmodern phenomenon)是祸是福，就不是我敢揣测的了。

2001年2月18日

中间语文：再论文化语境

写成〈回应许德发的“文化语境”说〉，把稿传真给报馆，又不放心，打了通电话给《星洲广场》的主编潘永强先生，就文化语境作了些修饰。潘永强对我说目前的文化词汇面对相当严重的翻译问题，他的疑虑不是没有理由的。

就以“后现代”一词而论，香港的一些学者称为“破现代”，取postmodernism前面post的谐音，并且辩说“破现代”比“后现代”更贴切，因为“破而后立”云云。这么一搞，阿巴斯(Ackbar Abbas)的论著《Cultural Studies in a Post-Culture》(1996)，中译就变成《破文化中的文化研究》了，连文化也“笃傲”，香港人真会搞笑。

不过我这么说绝无蔑视香港文化学者之意，他们做学问认真，立论谨严，与中台两地的学界颀颀，绝不逊色。另一个令我拍案叫绝的词是grand narrative，一般人多用“大叙述”、“大论述”，最多再加一字：“大叙述体”，但香港学者竟然称之为“大话”。“大话”有它的歧义，“大话连篇”意思是信口雌黄。香港学术界真有幽默感。仔细揣思，许多官方的大叙述虽然堂而皇之，却的确有大话西游的现象。

潘永强告诉我“文义框式”(context)这词汇，曾一度被简化为“语式”，那么，从“语式”蜕变成今日广为采用的“语境”应该是一种进步吧。

有一个时期，我为signifier与signified的中译烦恼不堪，几乎每位文化学者都有自己的一组中译：“能表”与“所指”；“意符”与“符旨”……我被它们累死了。经过多番折腾，最后我选重signifier的中译为“能指”，signified是“所指”，至少在我

撰写文章时会坚持自己选择的中译式样。

就以上篇提到的“他者”(other)为例,也有学者把它译为“对体”,但“对体”这中译禁不住约定俗成的考验已渐被淘汰。另一方面,“他者”一词却派生出“他者疆界”、“他性修辞”、“他者工业”等词汇,漫漫乎形成一丛词语谱系。最近我注意“他地”(other-land——相对于母地 mother-land)的出现,它指的是一个人经验疏离的所在或被放逐的地方。在我撰写这篇短文时,我刚拜读现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的朱耀伟博士的论著,他以“他性机器”这个相当唬人的名词,来形容生产他性(或他性特征甚为强烈)的香港。

也许是我个人的杞忧,我觉得这样下去,同一基因的词语谱系将派生出愈来愈多的新词汇,充斥于各类文化论述。过度泛滥的结果是,中文不像中文,一篇文章里每个字词读者都懂,就是不易把握到它的意涵,只有行家或有关的学术人员才知道这些论述要表达的内容是什么。

由于大多数的文化词汇,源自西方各家各派的学说,这些词汇大量涌入各类论述,经过一段时间,几乎必然会生产出一种不伦不类的“中间语文”(interlanguage),即陌生化的中文。这种“中间语文”虽有中文的躯壳,却流着英文的血液,有些像英译中文,但感觉不太一样。中译是语文的西化,今日的文化论述却在思想与文字表达方面西化或“中西渗杂”。

国内的报章显然还不习惯这种变,笔者去年在一篇文章里用到“凝视”一词,后面加上gaze字。拙文刊登时gaze字不见了,连“凝视”两旁的括号也删掉了。这种情形如果出现在一般新闻报导,那不出奇;出现在言论版,那就令人不得不担心。对女性主义批评有些涉猎的人,大概都了解“凝视”、“反凝视”是专门术语,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笔下的“凝视”也有其特殊意义。不仅作者需在知识方面 up-date 自己(update 不等于趋新赶时髦),媒体编

辑亦需日新又新,在知识资讯上与时俱进。否则编辑老爷将来要面对的是愈来愈陌生的中文论述,对自己不熟悉的词汇或表达方式动辄施以斧钺,对读者与作者都是一种伤害。

2001年3月4日

消失论述与加势策略

那边厢“马来人不会在世界上消失”的喜剧才上演，报章一角便读到黄进发写的〈潮州人不会在世界上消失〉的parody宏文，不觉莞尔。

既然大家都是马来西亚的子民，还强调“马来性”或凸出“潮州性”，制造可能会消失的假危机，真是匪夷所思。周蕾在《写在家国之外》（“Writing Diaspora”）一书里指出，成熟的社会应该“建基于文化工作和社会责任上，而不是一味依靠血脉、种族、土地这些强权政治的压迫。”

以血脉、种族为主的中心意识（centered consciousness），最大的问题不是它的本位化，而是这种意识，把已经边缘化的种族、文化都想像为对自己构成挑战的敌人。这种中心意识无限扩张的结果是他者将“无地容身”。施碧娃（Gayatri Spivak）有一句令人心悸的警句：“弱勢者不能发言”（the subaltern cannot speak）。不能说话的具体情况可以是逆来顺受，乖乖不说话；二是通过新闻管制，有话无从说；三是如施碧娃所说的：the subaltern cannot speak，不等于the subaltern cannot talk，“发言”与“说话”有重大区别。在咖啡店喝了几瓶黑狗啤下去，底层百姓说话可以口沫横飞、声震屋瓦，但他们并非在真正发言。

消失论述究其实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加势策略”（empowerment strategy），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很早即指出区别种族（racialing），是为了方便建构国族主义。假设自己的种族可能消失，或预设自己的种族可能面对严峻的挑战，拆穿来看，都是为了攀升绝对的权力优位而定的议题。华社总体或华基政党面对这样的政治形势，最不智的做法是承认自己的臣属

弱势（一度甚嚣尘上的少数民族只能争取少数权益论），任何党团以政治附庸的身份面对政策制定与对决时，即使明知自己立场正确，要求合理，亦无法理直气壮。

以中国的情况来比较，就笔者所知，中国大陆有五十六个民族，90%（也即是占绝大多数）是汉人。其他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国反而给予优惠地位，以进入大学受高等教育的情况而论，汉族学生要拿到三百分以上才可念大学，少数民族拿到两百分便被录取。以美国的情况而论，美裔华人仅占美国人口的1%，数目微不足道，以这人口比率，骆家辉仍能被选出任华盛顿州州长，赵小兰甚至受委担任内阁要职的劳工部长。美国当然也有种族歧视的现象（李文和教授的遭遇是世所共知的近例），但在选贤与能这个准则上，仍有一定的规矩可循。

马来西亚独立三十三载于兹，政治理应趋向成熟。凝聚某族群的向心力可逞一时之利，长远来看，却不一定是国家的福祉。如果国家内部出现不同阶位的公民，因而有其属性与非属性，对外撑住“大一统”（united presence）的表现，却难以掩饰内部日益尖锐的集团与集团底背离。团结运动的大小动作后面，显然有更多议程不为一般人所知。电视新闻每日播放的是带有警诫意味的钦定论述，与制造没有杂音的和谐，但是每个智商九十以上的受众都了解这是自欺机制在运作。

马来西亚是我们的国家，生于斯，长于斯，作为子民的我们希望看到它日益成熟、壮大，对于国家领导阶层的批评，笔者所看到的文章，大抵仍能在批判中表现出礼敬与理性。只有绝少部分的政客在照镜子时看不见自己，只看到别人硕大的身影与旁边用金银珠宝砌成的华美道具。

2001年3月18日

叶逢仪的烦恼

——文化街的困难底冰山一角

踏进叶逢仪兄在文化街开的“喜新恋旧”店，里头的书画、雕塑、古董、陶器，琳琅满目，所有能用的空间都用上了，难得的是，繁而不琐，乱中有序。背景是逢仪兄的千金叶健一绘的老虎画，健一笔下的老虎亲和可爱，反而更像温驯的家猫。靠近店门口，有一个树根虬结的鱼缸，几尾金鱼在游弋，上面悬着各式各样的木雕和陶塑，真是别有洞天胜人间。

逢仪兄把自己家里的珍藏，摆在“喜新恋旧”店，友人戏称它为“叶公馆收藏天地”。我与朋友走进这个收藏天地，凉沁沁的，那感觉很受用，至少可以让我摔掉一路走过来时头上肩上心上密布的车声和风尘。我和逢仪兄就在一幅框好的玫瑰油画前站着闲聊，不知怎地，我觉得出来他脸上有掩不住的疲惫与抑郁之色。我天性好奇兼且八卦，一连串疑问忍不住冲口而出，逢仪终也忍不住向我倾吐他内心的隐衷。

逢仪兄告诉我他能管理的只是“喜新恋旧”的内部装潢与布置，店前的情况能否配合，许多时候非他能力所及。他举例说，店前的马路最近多了一档印度拉茶，这当然与售卖书画工艺品的“喜新恋旧”出现格调上的杆格。林福南与拉茶的印度小贩谈商，这印度人也爽快，一口答应，条件是要“遣散费”三百零吉，说好拿了钱就走，结果钱付了，拉茶的印度人非但不走，反而有了资本进一步扩大营业范围，煮炒面现在都干，goreng mee 的油烟直薰“喜新恋旧”，呛喉呛鼻，情调都被破坏了。

我听了后第一个自然反应是建议逢仪兄找市政局投诉去。逢仪苦笑说这还不是最坏的。他问我有没有注意到店门右侧走廊的情

形。我说我只看到店前一左一右有两台“鸡公车”，“颇为复古、怀旧”。逢仪说其实“鸡公车”的布置并非怀旧，而是十分无奈的安排，右侧鸡公车旁边就躺卧着一个头束长发的老妇，这老妇以前是旧宅的住户，紫藤租了楼下店面后，她却不肯搬走。楼上的观音基金会安排她另觅住处未果，最后通过基督教会，请来了一位牧师劝说老妇，这名老妇接受牧师的意见同意迁往老人院。手续费也缴付了，谁知福利部的车子来到，老妇却坚拒上车，大家都无法可施。福利部的执行人员也不敢造次，因为欺凌老弱妇孺，这罪名谁也担当不起。

逢仪兄说目前他能做的是，让老妇在店前走廊睡觉，休息。老妇人不洗澡、不换衣服，大小便就在店旁小巷解决。他能做的是用鸡公车衬以花草盆栽作掩饰，因为实在有碍观瞻，还辟出一条小径让老妇能自由进出，不致跌倒。行人经过，看她可怜，会随手丢个五毛一块，一天也有十多二十元的收入。老人院虽说有人照顾，但就是没有在外闲荡那么海阔天空。看来老妇人是不肯走的了，逢仪苦涩的说，有些路人甚至还把他当作是一个刻薄的画坊老板，言语间暗责他没有同情心，连一个老人家也不肯照顾。

从“喜新恋旧”走出来，我在玛咖啡座坐下来，拿出纸笔来决定写这篇短文。唉，打造文化街，何其不易。这条街是个大杂烩，那边是古色古香的陈氏书院，五十步之遥却是ATC，那是间传授法律知识的现代学府；这边厢是大将书行，书行前面不远的停车场经常出现瘫倒在路边的酒徒、道友和三五两两的乞丐，那边厢是紫藤艺术中心，路的转角处却烤着汉堡包，牛肉的骚味与凉顶、普洱的薰香“沉湎一气”。文化街是吉隆坡不均衡发展的缩影：多层次的“混杂”（hybridity）、强烈的“边缘性”（marginality）与令人难以置信的“错置”（displacement）。

文化街没有文法，它里面充满了异质的符号。“紫藤一大樽”三友加上企划人柯丽凝、画家叶逢仪，以“旧”为体，以

“新”为用，企图承续香火建构文化。就笔者管窥所得，文化街新“崛起的文化”(emergent culture)，在面对“剩余文化”(residual culture)的对抗、抵制，内耗甚大，能量流失亦巨。也许是我的反应过敏吧，每趟嘉年华会式的欢聚，我都可以感觉到里头有掩不住的苦闷与焦虑。

2001年4月1日

人民可以“愚而神”

——兼写徐复观先生

有一趟笔者因事赴新山，来机场接机的是黄文斌。从士姑来前赴新山市，途中大家聊起彼此读书的一些经验，我冲口而出，问文斌博士论文会以谁为研究对象，他告诉我正读着钱穆的著作，论文可能写钱先生。我的反应是：“为什么不选徐复观？”驾着车的黄文斌有点诧异地侧头看我。唐君毅、牟宗三、钱宾四(钱穆)、徐复观是新儒学最具代表性的四君子，何以我竟独厚佛观先生？

这种学术偏爱，很难说明原委。牟宗三文字何其玄奥，他的“良知坎陷”说，我读得头晕脑胀，唯祝家华却甘之若饴。去岁的一项国际性文化研讨会上，家华提的论文〈牟宗三的民主开出论〉，谈的正是牟先生的良知自我坎陷说。我从不曾见过徐先生，只看过他的几帧照片，和听说过一些他的轶闻。他和胡金铨一样，都是大冷天也可满头滴汗的人。金铨先生导演电影，冬寒底下仍满身汗水；佛观先生讲学手舞足蹈，只见他围巾、大衣、领带一件件脱下，仍是汗流披面。如此元气淋漓，只有全力介入、无私参与的人，始能有这等不寻常底肢体反应。

徐复观好辩，他与虞君质为现代艺术展开的那场论争，轰动了1970年代台湾的文化界。说来1970年代他在《明报月刊》发表的每篇有关文化、思想、艺术、书画的评论我都追看，虽然二十多岁的我能吸收多少实在是个疑问。徐先生一如乃师熊十力，性情中人，脾气大得很，他的率直确曾开罪不少士林同侪，与当红的政客权贵。他对专制政治的严厉批评，使他处境尴尬，国共两边都不讨好。

佛观先生研究历史、哲学、思想，认定“知识与良心之和，事

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和，这才是我说的思想。”提出“只有读组织严密的思想性著作，才能养成思考能力，逻辑教科书是没多大用处的。”他颇同意胡适谈治学所说的“勤”与“缓”底重要性。“勤”是每个人都知道的，“缓”指的是材料未齐备、观念欠成熟，决不轻易动笔。徐复观主张为学要谦虚，“先让材料自己讲话，在材料之前，牺牲自己任何成见。”

前面提及钱穆与徐复观，两位前辈对中国历史有无专制此点，彼此看法差距颇大。宾四先生认为用封建社会、专制政治这些名词是“空洞”的，他在《国史大纲》称秦建立之政体为“第一次统一政府的出现”，而由于刘邦出身市井，因而推论“自此汉高祖以来，一个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素朴的农民政府，现在转变为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有教育有知识的士人政府”，钱先生认为是一大进步，并无专制。佛观先生则认为吾辈不能认为由平民取得政权，建立的政府便是平民政府。流氓上台后一样可以搞个人专制，叔孙通制的朝仪初用，“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皇帝与平民的**相位相差二十三级**。刘邦杀功臣如屠宰犬马，无人可以制衡，连贵为相国的萧何也不放过，这是专制政治肆虐的极致。毛泽东图书管理员出身，表面吹捧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掌握天下人生死的唯毛氏一人。平民夺得政权，一样可以实行残酷的专制政治。

宣帝以降，儒生在朝廷份量强化，情况比高祖、武帝时代的际遇好些，但仍不能称士人政府，因宣帝、元帝都喜用宦官，萧望之、刘向、周堪这些经世济国的大儒都先后为宦官谗害，连性命都保不住。追溯回去，武帝以大司马秉政，破坏了士人政府的根基底宰相制度。汉之衰亡乃外戚宦官所造成，用徐先生的判断“外戚宦官乃是专制下的必然产物。”

我读徐复观，经常终宵辗转不能成眠。他自言在东海大学教书做的学术研究，“好似一个夜行人，总希望能在黑暗中标出一条可以回到自己家里的路，尽管现实上我并没有家。在漫长而艰苦底研

究历程中，又写了这些杂文，乃说明我和我所处的时代的不幸。”佛观先生强调良知的作用，指出“良知是中国文化的根源，是每个人所以成其为人的立足点。”

广大人民的智慧不可轻侮，不要把平民百姓都看成是傻瓜。徐复观说：“先秦已有人指出，人民是‘愚而神’的。人民所以在**愚蠢中能发出不可测度的神智，以判断政治社会上大是大非大利大害，就是因为人民在自己生命之中能发出他随生命以俱来的良知的作用。**”置身于今日诡谲多诈的政治处境，佛观先生的话更耐吾人咀嚼。我想我对徐先生之偏爱、仰慕之情亦基于此吧。

2001年4月15日

文化存活的策略

我常常在想：文化究竟是怎样积淀的，过程怎样？如何衍变？大规模的文化演出，有文化保温之效，因为投入这些活动的各领域人士都自然会磨砺以须，及锋而试，这使文化处于一种紧绷状态，参与者（包括歌手、舞蹈家、相声说话人、演讲者、话剧演员等等），都希望以最佳状况呈现自己的技艺，而每项汇演都有听众/观众，彼此有交流，能互动，文化便具备动能。

但文化的意涵实在不如前面所说的那么狭窄。文化许多时候就在那儿，像历史文物、古迹遗址那样，存在但静态。拉岗（Jacques Lacan）所提到的“欲望”与“凝视”（the gaze）可以应用在表演文化，而不一定适用在静态的文化实体上面。

文化讨论之所以困难，因为大家往往把文化视为高不可攀的理念，而忽略了街坊文化、市井文化。这些草根文化不仅是文化重要的一环，而且可与历史、政治、文学、社会学、伦理学这些高档文化互为挹注，交相辩证。没有草根性文化，高尚优雅的文化犹似立足于浮沙，难以扎根落实。

许多时候，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混淆在一起，这种杂糅的文化现象出现于社会的各个层面。金庸、张曼娟的小说就处于通俗与优雅的灰色地带，张小嫻、卫慧是高尚抑是通俗？同样出现争论性。

《铁达尼号》是一套俗气得再也不能俗气，老套得再也不能老套的典型好莱坞电影，但是通过艺术的包装、气氛的营造，它感动了世界上的许多观众（好些人不是说他们重看了三、四次吗？）。Kracauer曾指出，正因为大众文化产品的浮浅，“这种浅薄的表达形式却能直达事物根本。”《铁达尼号》的影响力甚至比华格纳的歌剧更大，更具震撼力。这么说对严肃的艺术工作

者似乎有点不敬，真相往往不中听，不过研究文化现象，我们许多时候面对的是不快的事实。

文化街的紫藤茶坊与大将书行，经常举办各种活动，邀请各行各业，不同兴趣/嗜好的族群前来参与紫藤/大将的各类演讲、对话、座谈。讲题包罗万象：有外国著名文化人的演讲，也有本土漫画家的即席创作。文化街因为各种多元的街头演出而渐渐奠立声誉，像日前举办的晒书活动都是有效的、民间的、草根性的传递文化讯息与智慧的方式。

允许我进一步申论，“说故事”与“听故事”都有助于文化扩散。嘻笑怒骂、插科打诨、戏谑拟仿、指桑骂槐、声东击西、剖牛解马，除了自娱娱人，还有裹在粽子里的隐约讯息，它可以颠覆主流论述，稀释钦定行为准则，当然，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一类的讨论，其文化意义或更彰显。

文化存活不能只靠天后宫、三春礼堂、中华大会堂等三几个堡垒或据点。晚饭过后祖父在庭院里扇凉，和稚童讲的三国与水浒、着女佣叙述的南来体验与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经验，都有历史涵义与文化启蒙的作用。

巴岩（Homi K. Bhabha）在《文化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一书曾引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见解：“我们应该在现代情境的历史里去孤立某一事件，使之具有符号的价值。”巴岩认为我们可在小事件、小叙事体里寻索到文化符号的景观。文化要存活，不能只顾大块的“面”，而忽略了聚沙可以成塔的“点”与“线”底构成与衍变。

2001年4月29日

“马来西亚内容”的破冰之旅

读傅承得写的工作论文〈寻找华文出版世界的第四块版图〉，副题标明〈一位“马来西亚内容”华文出版人的思考〉，觉得文章重点有二：一是为沿习经年的中港台三地所组成的出版地图，寻找第四个市场（或潜在市场），傅氏似有重绘版图（remapping）的筹谋；二是申明大将以出版“马来西亚内容”的各类作品为宗旨，“马来西亚内容”的独特性（uniqueness）是一种自我认知，争取被阅读的可能性底文化生产策略。

确乎言之，两岸三地对马华文坛（暂且不说马来西亚这个大项目）的了解，可谓十分贫乏。中港台以外的华文创作，一概被剃平头列入“海外华侨文学”的范畴，边陲与中心之别昭然若揭。近十多年来这种文化中原主义有渐呈松动的迹象，一方面这是由于资讯流通方便，网上消息按钮即知，任何刻意歪曲／夸大马来西亚实况之报导，无论其动机为何，均易为识者戳破；另一方面，留台马来西亚学生的文学表现，也用实力证明自己的存在。作为边陲文学的马华文学，近年来有渐渐踏入主流论述的趋势。

即使中港台构成的中华文化圈（如实地说，香港已是中国的属地），三者之间仍存有相当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由不同体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人文环境所造成，我们只要稍加阅览两岸三地的书籍杂志，即不难窥见同质中出现异质的现象。

中港台三地组成的“文字共和国”（借用 Michael Warner 的概念），一贯地视新马为中华文化低度开发国家，是两岸三地文化生产的消费者。新马本身也许有若干文化生产能力，像出版书刊，唯从中港台的视角来看，它们大抵是些“次货”。早年马来西亚留台生，像星座诗社的成员，都是自费出版个人的诗集、散文集，陈

慧桦（陈鹏翔）的《多角城》、王润华的《患病的太阳》、淡莹的《单人道》、林绿的《手中的夜》，都是自掏腰包印行的书。我有理由怀疑，1977年台北半官方机构的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作者的散文集《黄皮肤的月亮》，审稿者与出版人可能看重的是——对台湾读者而言——作品内里洋溢着的“异国情调”（exotic atmosphere）混和了文化乡愁所造成的“新奇感”（novelty）。1978年台北长河出版的诗论集《精致的鼎》，则可能由于我的论文大多以台湾诗人为研讨对象，“红花需要绿叶扶持”，边陲肯定中心，主张论述自然乐于接受来自边陲的确认。

两岸三地所构成的颇为牢固（虽然彼此也有相斥的成份）的中华文化圈，之所以面对变化，一是全球化趋势的形成与加速扩展，果尔世界正如 Marshall McLuhan 所言是一地球村，那么中华圈与周边的国度充其量只能算是这个地球村里的一个文化社区。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曾指出跨国企业，当然包括跨国文化出版企业，将带来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只要马来西亚的华文作者表现不俗，要踏入这个社区并非难事，肯定不会像1960年代、70年代那么障碍重重。

当前中台文学评论家有一学术倾向，即把杜维明所说的“第二象征世界”生产的文学作品方便地归类为漂泊话语（diaspora），王德威教授论黎紫书可为近例（见〈文艺春秋〉，2001年4月29日）。中台学者除了在马华作品寻找“散居意识”（diasporic consciousness）外，甚至努力发掘这些作品的“中国性”（Chineseness）以证明海外华人的“返祖衝动”（atavism）。这样做不管把马华文学定位于边缘，是一种“从属论述”（subjugated discourse），与大多数马华作家以及马华书籍出版人的意愿显然是互相牴牾的。

窃以为大将出版社社长傅承得，于2001年3月下旬出席中文世界出版精英会聚的“台北出版节”，并参与两场有关出版景观与构

想的论坛，目的是争取文化生产场域的“就位”(position taking)。借用法国文化学者Pierre Bourdieu的看法，傅氏必须让在场来自其他地区的华文出版人了解：马来西亚社会的文化资本是什么，因为“文化资本的合法性是兵家必争之地”。所谓文化资本包括在地的具有自身色彩的社会内涵、风俗习尚、品味趋势，这种以马来西亚内容为基础的文化自主性(cultural autonomy)除了可供输出被中港台及其他地区阅读外，还可丰富中华文字共和国的文化储备，使它更呈多元化，更多姿多彩。让我在此强调，“我们性”(we-ness)一定要被人识别，区域特色一定要能真实地呈现(而不是扭曲地被呈现，这是神州诗社早年刊行的作品为人诟病的根由)，“马来西亚内容”才有被尊重的可能，否则马华各类书写便容易沦为两岸三地的劣质拷贝与模仿了。

允许我进一步申论，马来西亚内容的书写，必然会弔诡的具备双重性：它一方面是“向心”的，马来西亚仍需向中港台的顶尖作家借镜；另一方面它又是“离心的”(ex-centric)，仅仅停留在借镜、学习仍嫌不足，我国作家需自力更生，建构自己底风格。只有这样，马来西亚的华文书写话语才能不亢不卑，与中港台的华文论述发挥互动互补的良性作用。傅承得此趟北行，才能成为“马来西亚内容”号的破冰之旅。

2001年5月13日

从北岛、高行健作品中的“可”字谈起

一切都已经结束

■你为什么还戴着那块红头巾

——北岛《枫叶和七颗星星》

■他记得这楼房的后门，石台阶下便是一片湖水，端午节那天，他父亲和银行里的同事都挤在石阶上看龙船比赛……■他没有去湖对岸，即使再绕到湖那边反过来观望，远远的怕也辨识不出这如梦一般的记忆。

——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页2

他母亲在他身边低声斥责他，■他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

——《一个人的圣经》，页4

抄录这三节文字，是为了凸出“可”字的使用。近十多年来不少中国作家舍弃“可是”，把这个连词简化为“可”字，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是颇堪玩味的现象。连多届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诗人北岛，与本届诺奖得主的高行健先生都这么使用，它底正确性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了。我特别注明页数，因为《一个人的圣经》这部长篇小说，要上“可是”的地方一律缩写为“可”，小说厚454页，“可”字的出场率实在多得不胜枚举。

我不知道中国作家在读、念中文时，是不是具备另一种内在的调节机能，使他们觉得“可”比“可是”顺口。前两天我和一位

穿梭于港台两地，并在两地都曾出版个人著述的作家会面，谈起这种新近的语言发展，这位作家朋友说，他还是觉得“可是”念起来较自然，单单一个“可”读起来拗口。他鼓励我写篇文章谈谈。原来也有人不认同“可”字这种用法，得到朋友的“精神支持”，我才有勇气甘冒大不韪，讨论这个——对中国作家而言——不成问题的问题。

“可是”作为连词，近乎英文的 *but*、*however*，其意涵得在上下文构成的文义框式内确定，因为 *but* 的意思可以是“但是”，*however* 可以是“无论如何”，“可是”在许多情况下似乎兼具 *but* 和 *however* 的语义。中文词汇的建构，是从本来的单音语素，走向把两个单字结合在一起的同义并列的复语（例如美丽、喜欢、顺畅），或反义并列的偶语（例如贫富、贵贱、正邪），把现有的双音节合成词拆细，还原为单字，不是中文形构的惯例。

翻阅鲁迅的小说《故乡》，里头有这样的一句对白：

“可会写字？可愿出门？”

这儿的“可”不等同于“可是”，而是一个带有疑问语气的选择性连词。既然谈到鲁迅，我们不妨从这条线索追索下去，鲁迅在另一篇作品《铸剑》里有另一句对白：

“看他可是装死，还是真死。”

这儿的“可是”仍是带有疑问口吻的连词，里头没有 *but* 或 *however* 的涵义，我们不能把它化约为“看他可装死，还是真死”（句子不通）。奇怪的是，如果把这句话写成“看他是装死，还是真死”，少了“可”字，句子的内容并无变质或减损。

同义并列的合成词，有时会出现其中一个语素功能弱化/退化的现象，比如说“学习”一词，“学”与“习”指的都是同一意思，我们可以说“她在学芭蕾舞”，也可以说“她在学芭蕾舞”，就是不能说“她在习芭蕾舞”，“习”字功能弱化，不能单独成词。“学而时习之”这样的句子，是把“学习”二字拆

开分布在同一句子里，情况自然不同。

反义并列的偶语，有时会走向“偏义”，如“睡觉”一词便是。“觉”是睡醒，恰好是“睡”的反义。但这合成词重点在睡，形成偏义，从睡熟到睡醒是一递进的过程。比较之下，“睡眠”一词是复语，“睡”与“眠”都指向同一意思，没有偏义的问题。

“可是”被缩写成“可”才是问题。上述“学习”、“睡觉”、“睡眠”这些词汇的构成原理与效应，都难以解释“可是”何以等同于“可”。“可”与“是”这两个语素，近乎同义，都带有正面的暗示（*positive tone*），唯“可是”无法与“可”等量齐观，那是肯定的。也许这是约定俗成底力量在发挥作用，中国的特殊语境可能是个决定性的因素，这方面我懂得的太少，深盼方家不吝指教。

目前已有两三位马华作家在小说里舍“可是”就“可”，我的意见是不必在这方面跟着中国作家的后面，亦步亦趋。“马来西亚内容”的建构，其中一项要件便是保持、发掘、并进一步发展在地的语言特色。

2001年5月27日

检视马华文学馆里的 “马华文学”

日前接受NTV7徐嘉得小姐的专题访谈，议题是附设于南方学院的马华文学馆。打气的话我当然不得不说，但是马华文学馆在目下阶段，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这点我也不能不提。马来西亚华社的文学人口太少，从事文学评论的只有那三、五个，至于有志于撰史的作家/学者，大概只有在大学任教的陈鹏翔、黄锦树、潘碧华等寥寥数人。李锦宗颇勤于整理马华文坛每年出版的书籍目录，马卷编过马华作家剪影一类的书，在原始材料的保存、留档方面，各有贡献。

撰史的工作非同小可，必须才、学、识兼备，缺一不可。翻一翻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或者王德威的《小说中国》，即不难了解史料的爬梳不仅千头万绪，个别作家的地位与份量的估衡，把他们放在怎样的历史位置始妥当，才真个伤透脑筋。而且文学史的撰写方式也在变易中，比较一下杨荫深的《中国文学发达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与夏志清、王德威的撰史体例，当可辨别出从切入角度到整体呈现都风格迥异。

对“马华文学”一词存疑

我对“马华文学”一词的正名，心里是有疑问的。“马华文学”究竟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学”还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简称，这点必须开宗明义说个清楚。马来西亚华人可用巫文、英文、华文或其他个别作家所熟谙的语文创作，它们都是名乎其实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学。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语言载体一定是华文，这点殆无异议。有关这方面的正名问题，黄锦树在一篇论文里交代

得相当清楚，这儿就不赘述了。

我更关心的是，自1920年以迄2000年这期间出版的所谓“马华文学”，有多少巴仙真的具备文学的份量，无愧于戴上文学这顶桂冠？马华文学的出版情况，多年来都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一些作者得依靠社团出版基金的援助，才能出书，无法获得任何赞助而被迫（或心甘情愿）自费出版的作者人数可观，过去八十年来的马华文学作品，我估计超过半数作者自费印行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好些文学作品，其实只是“用华文写成的印刷品”或干脆直称它们是“华文印刷品”好了。最近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翻了一些战前、战后、还有马来亚独立前后的册子，发觉一般上马华作者的华文造诣介乎初中三到高中三之间，只能勉强说文字还通顺（不通顺、有语病的也不少），唯文字平庸，创意缺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必须一方面参与社会议题，具备人文内涵，另一方面又要有能力作出美学的超越。翻着手上近两百册（大多不上一百页）的马华文学作品，我心里想，怎么这些书多数看来竟像是中学生习作？怎么可能是这样？

我在中学里教了廿八年华文，改了多少篇学生的作文已经无法去计数了，但是修改中三到中五学生作文有一个好处是，我会很快分辨出哪些学生只能写些考试过得了关的文章，哪些学生的文字敏感，语言的驾驭能力强，而且晓得变通创造、推陈出新。我有理由怀疑，好些马华文学作品，不少是作者在中学阶段写的习作，敝帚自珍，毕业后出版成书，于是乎马华作家又多了一名生力军，李锦宗或两循梅两位先生的〈××年马华文坛纪事〉的报导里又多了一部“文学著作”的书名了。

恕我直言，我甚至对某些社团出版的书籍，是否就是文学佳作也有疑虑。一些出版基金的评审委员或评审顾问，挂名者居多，申请的书能不能过关，有时就由一两个当权者或决策人敲定。这里头不排除朋友主义、裙带风的存在，只要看看某些团体一筹到赞助

金，团体本身的大小理事个个“当仁不让”，争先恐后先把自己的书印出来再说，即可思过半矣。

不假思索的统摄法是否有问题

当然我可不能一枝竹篙打翻一船人，一些出版基金的评审委员的确曾花时间审阅申请者的来稿，问题是被邀担任评审老爷的大人先生们，大多是“文坛中人”而非“文学中人”。他们有些已握笔多年，有些还在写，文笔与三四十年前同一个款；至于文学鉴赏能力，已与当前文学思潮、趋向严重脱节，仍停留在五六十年代那个层次。这些评审老爷，从语言造诣到文学素养，二三十年来一直在原地踏步，你能期望这些人会是慧眼识良驹的再世伯乐吗？因此用作品曾经获得某某出版基金赞助应该是文学佳作这个前提，恐怕是站不住脚的。

我把这些感慨都说了出来，徐嘉得忙说这些谈话不便“出街”，我说我能了解她与电视台的处境。我也同时告诉她，我会把这番感触写出来拿去发表。上一篇文章我用“粗糙”一词形容一些华文印刷品，梁靖芬小姐的反应是“触目惊心”，不知这篇短文会不会再唬了她一跳？马华文学馆的许通元先生，有没有考虑过成立一个小组，审核一下马华写书人的作品底素质？那些文学成品是属于“前马华文学史”时期的稚嫩之作？近三十年来的马华作品可以完全不考虑美学与艺术的因素一概列入马华文学之林吗？这种不假思索的统摄法是否有问题？

2001年8月5日

知识在迁徙中衍变

拜读魏月萍的大文〈台湾是文化知识传播站？〉（《星洲日报》〈情在人间〉，2001年7月20日），已经好几个星期了，由于赶着替张惠思的诗集《站在遗忘的对岸》写序，不能分心，只好按捺着自己，等到序文杀青，才敢动笔写这篇短文。

月前台湾的两位著名学者陈光兴与夏铸九前来马来西亚讲学。他们参观了首都的书局，发觉这儿的书局跟台湾书局没两样，后来又知道台湾书籍在马来西亚流通甚广，陈光兴教授不禁感叹：“这儿已成为台湾的殖民地了！”这段文字见诸〈台湾是文化知识传播站？〉第二段，字眼有些许改动，内容存真。

我猜想陈、夏二人参观的大概是大将书行、大众书局，因为这两家书店卖的确是台湾出版的各类书籍（加上一些本地印行的书），如果有人把陈、夏两位教授带去商务、学林、上海几家书店参观，他们得到的印象可能会是：“马来西亚的华人读书人口被中国大陆化了！”我的看法是两位学者虽说精研后殖民理论，但由于逗留马来西亚日子太短，没时间作较广泛的田园调查或观察，他们得到的并非是整全的印象。

如实地说，马来西亚自1980年代以降，其知识资源已非单方面来自台湾。由于中国的渐趋开放，我们也从中国这条知识管道得到许多宝贵的人文营养。

以我个人为例，1970年代我绝少买中国大陆的书，毛式话语、革命语汇，意识形态先行的诗、散文、小说（浩然的《金光大道》是个样板），令人无法卒睹。1980年代初，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还有朦胧诗的出现，使人耳目一新。文史哲各类论著都渐渐摆脱政治的干扰与框限，活泼生动，充满朝气。这方

面只要读者比较一下金观涛与李泽厚的人文论述，孰者仍被意识形态制肘，孰者反映出学术的洞识与卓见，一览即知。说起来除了中港台两地，香港也是不可忽视的知识输出国。

陈光兴对魏月萍说：“文化移植须考虑土壤问题，所有养分须内在化于历史文化脉络，与‘在地化’历史结合，才能提炼出自己的文化系统，甚至于发展出一套解释文化的分析架构。”这见解大体上是正确的。我想指出的是，文化知识的流入，目前已晋入中港台在马来西亚“交叉繁衍”（interbreeding）的阶段，还没有人就这种现象对马来西亚华社的文化系统底 hybrid 影响，作出任何学术性的考察。

另一点必须在这儿提出的是，知识迁移至另一个文化空间，与当地“政经文教”（这四个字很笼统，但它可以给读者感觉其多层面与广泛性）的因素碰撞而擦出火花，并且必然会作出有机的调适、转化与衍变。

以文学为例，潘雨桐留学台湾，他一定读过与他年龄相若的白先勇、王文兴、施叔青、黄春明、王桢和等人的小说，但潘雨桐的小说并没有这些台湾小说名家的影子。年轻一代的小说家黎紫书，熟读王安忆，对苏童、余华、莫言、阿城一定不会感到陌生。1999年年杪，我坐她的车子赶着去主持郑树森教授的演讲，偶然回首，发觉车子的后座赫然放着李锐的小说。紫书当然也读朱天文、朱天心、平路、苏伟贞、张大春等人的小说，香港作家李昂、西西、何福仁、蓬草也可能是她的观摩对象，但是黎紫书的小说绝非上述中港台小说家的“综艺演出”。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别人的文学技巧、形式表现，潘黎二人（当然不止他们两个）已消化成了自己的文学养分，并成功建立自己的风格面貌。花了那么多笔墨，旨在指陈一个事实，输入的文化知识（包括文学知识），可以因为在地的物质条件、政治因素、历史背景再加上个别作者的内心诉求，而酝酿开展出不同的想像空间。

1991年作协出版吴岸的《马华文学的再出发》，收入了他于1990年5月26日的“全国写作人交流会”上的讲话。作者于讲稿中指出马华文学的特性正在逐渐丧失，吴岸分析其根由，认为其中一项是：“……一些年轻作者，在外来思想的影响下，媚外的殖民思想日益浓厚，他们的文章，越来越远离马华文学的传统和社会现实。”（页5）吴氏感叹地说：“……‘马华文学’的特征却显然地悄悄被另一种‘殖民文学’所取代。”（页7）这见解我无法苟同，吴氏的看法是完全否定了知识（这当然包括文学知识）与在地条件融洽结合，所可能产生的基因变化。如果他把“留台生文学”都一律视为“殖民文学”，那么1950、1960甚至1970年代上半叶，在文学方面效法/模仿中国大陆政治样板的所谓现实主义马华文学，是否可以称为更早的“殖民主义无产阶级文学”呢？

边陲可以影响中心

目前的情况是，散居在中港台这个中华文化圈以外的他域作家，像张贵兴、陈大为、钟怡雯、黄锦树、辛金顺和前面提到的潘黎两人，由于作品的深度艺术感染，回过头来对两岸三地的文学发挥某种影响，在文化交流频繁方便的今天，是完全可能的。边陲可以影响中心，这不叫“殖民”，也不是什么“反殖民”。

魏月萍对台湾进口的翻译书籍，感到疑虑，因为“我们乃是通过‘台湾’这个系统的筛选与过滤，作为知识的文化养分来吸收。”这话说得有道理。所幸文学和其他学术翻译，目前也有来自中国这个重要渠道的，马来西亚知识界无形中多了许多比较与选择的机会。客观来看，由于中国出现过文革十一年的文化断层，西方著述翻译方面，素质仍以台湾占优。

知识本没有疆域的问题，翻译只有语文造诣的高低，马来西亚知识阶面对各类译述，可以汲取也可以扬弃。

马来西亚知识菁英不会因为读了法国的文化大师如傅柯、罗兰·巴特、阿图塞、笛雪透、李欧塔、德希达、布迪厄、拉岗和德勒兹，而像卡夫卡的小说人物一样，一朝醒来整个变了型，都成了黄皮肤的法国知识分子。我忧虑的反而是，两岸三地加上新马，正面对大量翻译所带来的语文负面作用。愈来愈多的中文论述，读起来像是拙劣的译文（余光中说的“西而不化”？），一些学术评论（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查阅近两三年国内举办的国际马华文学研讨会上提呈的部分论文），中文极拗口之能事，主词与受词之间远得可以害相思，令人读来牙为之碎，比鲁迅当年的硬译尤有过之。

不仅马来西亚有这现象，中港台的学术界也流行这种“艰涩热”（cult of obscurity），有些文章连行家看了也摇头。不怕大家见笑，很多时候我读台大外文系出版的《中外文学》的大块文章，虽然全神贯注，内容也只能略窥二、三。许多学术文章，倒像是粗通中文的二毛子写的：中西混杂，冗赘别扭，没完没了的夹杠（jargons）把读者（包括笔者）夹得叫苦连天。噢，是了，这些高头讲章都是博士教授级人物的大作，我有理由抱怨吗？

2001年8月19日

“温任平作品国际文学研讨会”

夜读《马华文学史纲要》，被一些唬人的标签如“工农兵现实主义”、“批判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搞得头昏脑涨，眼帘禁不住垂下。歇了好一会儿，精神才抖擞过来。

醒来的那一刻，脑瓜子灵光一闪，张爱玲早年不是说过“出名要趁早”吗？自己这一把年纪，也应该到了要为自己作些安排的时候了。事不宜迟，好歹都得搞个“温任平文学研讨会”。顾虑当然有的，张爱玲语文何其精练，艺术何其高妙，她在生前也没听说她自己或别人替她搞过什么“张爱玲文学研讨会”的。2000年杪，香港岭南大学主办“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是张氏逝世五年后的事。会议上两位当代顶尖的文学评论家，夏志清与刘再复还为鲁迅、张爱玲孰者成就较高而辩。鲁迅逝世六十五年矣，今年是他的一百二十岁冥诞，鲁张二人盖棺尚且难以论定，未盖棺就请大伙推崇自己，为自己定位，说不过去吧。

是了，说到推崇，在这节骨眼上可不得打马虎眼。如果只邀马来西亚文坛友好，毕竟小家子气，要弄个中港台欧美都有代表出席提呈论文，那才有看头。哪怕欧美来的只有代表一名，“欧美”一词仍旧管用。只有中港台欧美精英齐集，那才“够爽、够酷”，最重要的是那才能凸显这是一项国际性的、世界级的文学研讨会。

搞活动，包括主办文学研讨会，不能没有经费。所幸这问题不难解决。1960年代到1980年代中叶，自己从扶掖绿洲社到成立天狼星诗社，社员星罗密布、盘根错节，有些社员今日已是工厂厂长、公司经理、大企业董事，要他们拿点钱出来“共襄盛举”，肯定不是什么难事。不过自己是主角，绝对不宜抛头露面，一定要找个亲信出面统筹统办，才能天衣无缝。当今之世，知我者又与我有长期合

作经验者，舍庄疏凌谁属？疏凌乃一干才，能写能编，人脉又广，即使筹钱也能义正辞严，令人不得不赧颜而赶紧掏腰包。好，这事就情商庄老弟去办，大家共同进退逾十载，请他办个研讨会再把研讨会论文印刷成册，这些小事是难不倒他的。

对了，一不做二不休，最近网络那么热，自己上网亦是时候矣！良机不可错失，天狼星诗社昔日卧虎藏龙，有一弟子曾远赴英伦念电脑获硕士学位，并在北方学院（Kolej Utara）担任过电脑系主任，此人是当年台大外文系主任英千里教授的远亲英乘风是也。由他负责把我出版过的大小著作和有关评论全部上网，对英乘风而言可谓轻而易举。技术上只要没问题，经费方面与他合作过的友庄疏凌自可协调配合。

菩萨心肠 赞誉有加

至于要邀请的学者、教授，中国那方面不难，1980年代末以降，中国的大小教授都以能出席他国主办的研讨会活动为荣，自从潘亚曦、王振科两位菩萨心肠的教授对马华作家赞誉有加之后，其他继起的学者都对马华文学爱护得不得了。即使是从厕所捡到的有关便秘的打油诗，中国这批教授也有本领诠释出诗中的“人文内涵”与“宇宙奥义”来。只要机票、膳宿费用有着落，其他事都容易搞掂。日本方面如果能找到一、二人前来锦上添花最好，日本与欧美学者一样，对马华文学所知极为有限。他们要社会性，我就给他们社会性；他们要乡土，我有乡土；要生态关怀，我有生态关怀；要反殖反帝，那还不简单，我平时讲的每句话都在反殖反帝；要智慧哲理，我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还缺这个吗？什么货色我都有，客人要多少克，我就拈给他们，各取所需，重要的是不吝赞誉。

主办单位嘛，当然要找那个金字招牌的社团，如马来西亚华人联盟、马来西亚笔会、大汉山写书人协会，由它们领衔，可以加强

“公信力”。

事情可能要做得周密些，为免他人看出破绽，仍得邀来两三位搞评论的人物，来个“有赞有弹”，不可贪功好胜：“一面倒，大家都说温任平最好。”褒贬的分寸至为重要，那就是“小批判，大帮忙”。人选要严密筛选：饶芭为乐的黄锦树、断奶频频的林建国、会写长序多弹少赞的温瑞庭……这些克星一律不在考虑之列。找谁好呢，找谁好呢……？碰瓷一响，整个人从椅子摔到地上去，我在又急又痛的情况下惊醒，发觉自己坐在柚木地板上，那部文学史刚好掉在书桌旁的字纸篓里。

真是失心疯！多年来我一直淡泊自奉，怎么自我炒作这样的馊主意竟会在梦中出现，而且布局之奇，谋略之妙，非熟读《孙子兵法》断难臻至。看来我得服些宁神丸、六味地黄丸来调理一下身心。名缰利锁于我如浮云，大家都知道我是现代陶渊明一个。梦中出现那样的妄念，别人虽不知，我却没法原谅自己啊！

2001年9月2日

从郑愁予谈到周蕾的文化研究

王丹在狱中写了一叠诗，2000年8月由台湾九歌出版，书名题为《我在寒冷中独行》，没想到替王丹诗集写序的竟是郑愁予，更没想到感情丰沛的愁予，写起理论文章也有板有眼，毫不含糊。愁予提到当年台湾戒严时期，国人不能自由出国旅行那种无形的禁锢，正是他写《边界酒店》背后的驱动力：

多想跨出去，一步即成乡愁

那美丽的乡愁，伸手可触及

从诗题点出的“边界”，到诗中内容的一步跨出去就成乡愁的强烈边缘感，我读郑愁予这篇题为《牢狱诗与生命的坦然》的长序，第一个联想到的人是从事文化研究多年的周蕾（Ray Chow）。

周蕾是香港人，在美国加州大学教比较文学。作为一位少壮的文化研究学者，周蕾勤于笔耕，1980年代以降，几乎每隔两、三年就有一部新著面世，每部学术论著都笔触犀利，思想深刻。她的德里达式的语言辨析能力，使她的文字充满魅力与不断挑战、刺激读者的思维。她的名作《Writing Diaspora》（“写在家国之外”），开宗明义便说明了她的边缘身份，并且从这边缘位置发声：“And here I write as a kind of diasporic person in diaspora, a Hong Kong person in North America.”译成中文大概是：“在这儿，我是以‘漂泊散居’者在漂泊散居的情况下，一个在北美生活的香港人的身份来从事书写的。”

在《Between Colonizers》（“在殖民者之间”）一书里，周蕾指出香港在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夹缝性”（in-betweenness）。周蕾说：“我以香港作为讨论后殖民城市的目的，在于说明在殖民者与主导性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第三空间。”（页193）这个空

间允许香港人自我创造与发挥，但周蕾亦不讳言香港的‘孤儿’与‘杂种’的身份与体质，因而她认为散居的后殖民空间并非本土知识分子对抗外来帝国主义侵略的场域，而应在书写策略采取“双重性”，既离心而又向心地介入香港文化的论述。

在文化研究的领域，周蕾初出道便引人注目，她的第一部论著《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以新的视角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如果说夏志清、李欧梵、刘绍铭等人是从文化主流的位置，为中国严肃文学寻找经典（姜贵与张爱玲的文学地位，都是因为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为他们定位而获得广泛的肯定），他们是以李维斯（F. R. Leavis）建构英国文学大传统的方式，结合人文主义的思想训练，大抵上以新批评、心理分析、神话原型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品作出评价。周蕾则从边缘切入，以跨学科的方法进行文本研究，她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结合后殖民的考量，重新检视这些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与文化功能，提出不少非主流性的、甚至出人意表的观察成果。

萨依德（Edward Said）对“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批判，使我们了解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封建、神秘、贫困、愚昧而又充满了性别歧视与性压抑……），是他们从欧美文化霸权，进行编码塑造出来的东方，与真实和现实的东方相去甚远。周蕾则更警惕地指出受西方文化薰陶与训练的亚裔学者，用西方文化理论来研究香港、中国及其他非西方国家，那种在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偏颇性。萨依德是正面对抗、批判西方的论述暴力与“生产”东方的方式，周蕾则更敏锐地觉察到萨依德的理论在实践的层次上底不易与不足。我觉得周蕾这种警觉，灵感可能得自另一位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史碧娃（Gayatri Spivak）。史碧娃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亚洲有知识分子，但却没有亚洲知识分子。”

周蕾的另一部不可错过的专著是《Primitive Passions: Visuality, Sexuality, Ethn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简译为“原始情欲”),讨论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如陈凯歌、张艺谋等人的作品,在现代性的视觉向度方面提出许多卓见。她从鲁迅在记录片看到中国人被日军砍头的事件作为肇端,论及这个视象如何影响鲁迅,使他决定弃医就文。周蕾是个理论高手,她循着这个开端,谈及其他中国的重要作家像巴金、萧红、茅盾等人作品里头丰富的视象,并由此臻至一个甚具争议性的结论,那就是“原始”是一种文化动力,是文化趋向现代化的活水源头,甚至现代的中国性也奠基于这种原始性上面。第五代电影里头的意象如土地、风沙、荒野、女性、情欲这些都是原始性的发挥。

周蕾厉害的地方在于她有“周蕾 vs 周蕾”的学术勇气。她在论述过程自我颠覆地指出“原始性”也可以是一种商品伪装,一种为了符合西方视角和心理需求而塑造出来的图象/映象。她直率地指出张艺谋在《菊豆》这部电影里刻意安排的染坊场景,是“用斑斓的色彩营造出第三世界的差异感,建构出一种对‘中国’的跨文化商品物恋”(页58-59),她欣赏陈凯歌的《黄土地》将中国转变成一个主意象:沈默的大地,里头的“没有说出来”(nonsaid)的高度象征底深刻意涵。这篇短文实在没有可能将说不完的周蕾说得周详,只能吉光片羽点出某些精采处。对我而言,读周蕾的论述,可以感觉到一脚跨出去那种边缘的哀伤与继之而来的乡愁,而那恰好是愁予诗〈边界酒店〉的题旨。

2001年9月16日

金庸可能角逐诺奖的文学考量

报载(《星洲日报》综合版,2001年8月4日)金庸先生可能会在2002年角逐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可能包括前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金庸本人尚未对此事表态。最近,金庸的其中一部武侠小说《射鵰英雄传》其中一回〈郭靖的烦恼〉,被中国教育部列为中学教材,金庸作品显然已跨入经典化的初阶。

金庸的武侠小说写得有趣,情节丰富、文字精练,这是不争的事实。已故夏济安、陈世骧这些名教授都喜欢读他的小说。目下在香港任教的刘绍铭教授是另一个金庸迷,刘多年来在各报章杂志谈文说艺,每喜挪用金庸小说人物或情节片断,为自己的文章着色。

1970年代开始,金庸重新修订自己的作品,以古色葱烂的封面设计,书前选刊多幅地图古画,加大版本再度面世。

金庸不仅在修订过程勘正了初版的谬误,还刻意增添情节,像《射鵰英雄传》第十六回,武痴周伯通与郭靖讲有关《九阴真经》的故事,便多了哲理的指涉。允许我大胆揣测,1970年代的金庸,逐渐感觉出来,他于1959年开始在《明报》连载的通俗小说,能跻入文学殿堂的潜能颇大,原作者于修订过程蓄意加强作品的文学内涵,让它们脱胎换骨毋宁是人之常情。

台湾于1980年代中叶政治解禁,许多当年不能进口的出版物此际都能陆续流入,金庸遂以大侠的姿态登临宝岛,港台互动,掀起两地的金庸旋风。金的武侠小说一部又一部被改编、拍摄成连续剧与电影,也助长了金庸的声势、人气。研究金庸小说者人数不少,已出版的“金学研究”系列,我手上就有十余部之多。“金学”这一称谓与红楼梦研究的“红学”遥相呼应,唯《红楼梦》是部“超经典”(hyper canon),即“经典中的经典”,以“红学”称之故

宜；金庸作品还在通俗与严肃的光谱色带上移动，看来向通俗那一端倾斜还多些，率尔以“金学”称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像是顶相称的高冠。

金庸小说里头有儒释道的好些哲理，这方面的成就，自然是因为作者学问渊博使然。浸濡于中国传统文化既久，即使写的是通俗作品，作者自身兼具的文化知识自然会于笔端流露出来。

犹忆香港《明报》创办伊始，销路未能打开，香港文化/新闻界都知道一件事，即当年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全港各报都以头版报导这则大事，唯1960年代初的《明报》因电讯出了问题又缺乏支援系统，竟漏了刊载这则重大新闻。那个年代的许多香港读者所以买《明报》，目的在追看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为了维持与改善报章的销量，也就顺理成章地一部武侠连载完了又另外连载另一部。《明报》成了一份知识分子喜读、有份量有内涵的报章是后来的事。

每日连载的小说是急就章，其间难免粗率疵误（这也是1970年代金氏决定费了十年功夫，重新修订他手上十五部武侠作品的原因），但修订并非改写，金庸小说的人物、情节、结构已不可能拆开重建，他的小说出现大量的程式（formulae）现象已成定局。像表面忠厚的侠客其实是卑劣小人，武林各派高手争来争去的往往是部武林秘笈。秘笈名称不同，里头记载着的都是绝世武学则一。其他程式的复制如：无意做天下第一高手、最无意学武的人，却偏偏阴差阳错学得最精湛的武功，无意于权位者却误打误撞坐上盟主、教主之位。金庸笔下的年轻侠客都受尽苦头，身中各种奇毒，内伤沉重，但都奇迹地生还而且还碰上高手的指点又服食灵丹妙药，学成旷世武功。《笑傲江湖》的“吸星大法”是《天龙八部》里头“北冥神功”的翻版，都是吸去他人功力，为己所用。

华族整体的补偿性愿望

金庸擅长制造冲突，一是正邪之争，一是感情纠葛。从日月神教、神龙教到明教，都是江湖上的所谓魔教，教主都以极厉害的药物控制教众。正派武林中人都企图歼灭之，但魔教成员也有好人，各门大派亦多居心险恶的败类，这些程式金庸用了又用，乐此不疲。至于金庸小说的感情困境，往往是主角钟爱多名女子，唯因缘际会，这些感情发生得既自然又合乎情理，因此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即使“红颜知己”无数，都无损他们的道德完整。难怪有人说，阅读金庸小说，不能一部接一部追着看，否则必然觉得烦厌不堪。何以有这种烦厌的嫌恶感？那是金庸小说大量程式化所造成的“阅读抗拒”。

至于金庸作品的佛道知识，我想应该有助于一般读者增加他们在这方面的初步了解，但对要求高的知识菁英，金氏的“庄禅境界”如“无招胜有招、无剑胜有剑”，中国的陈平原教授即指出“初看甚觉玄妙，细思则未必高明”，“思想说不上深刻”（见氏著《千古文人侠客梦》）。梁守中在〈武功与招式的“雅化”〉一文进一步指出高档文化，透过武侠小说这个文类中介正走向庸俗化，无招胜有招、无剑胜有剑云云，已成为今日武侠小说的陈腔汇调（古龙的小说即大量袭用了这一程式）。

金庸作品的艺术考量，见仁见智，许多学者教授都是金的读者，并不能作为金庸小说的品质保证。今日的流行、通俗作品，对高层文化进行模仿，这情形仿似张大千、傅心畲的赝品一样，工艺精巧，维妙维肖，逼真的程度可以造成“符号的不确定性”（semiotic ambiguity）与美学错觉。目下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任教的陈丽芬博士曾经直率指出：“不论从侠义、爱情、历史、政治、美学的诸多不同角度去分析，学者总是竭尽所能多方演绎金庸小说浪漫人文的面向及传统中国文化精神，至于金庸小说作为现代社会的流行文化商品及其高度企业化过程……都不常在学界的考虑

中。当我们把金庸小说理解或定位为中华精致文明的表征时，我们只能对金庸继续不断雅化。”

著名文化研究学者周蕾，曾撰文指出武侠小说对中国古代武术的神化，是另一种恋物（fetishism）想像，以恋物来挽回中华帝国被女性化、被阉割的尊严，卖弄男性的阳刚武术以壮国人士气（李小龙的电影亦然），是一种“剩余的反抗”。专研武侠小说的叶洪生亦持同样的看法。

就笔者的解读，金庸是利用通俗文学导入现代主义的发明、创造性，把人文思想、价值观念涵摄其间，甚至于1960、1970年代的中国政局也作了某些谱仿（论者即有人指出，倒行逆施的日月神教教主我行，影射的是毛泽东）。金庸作品作为武侠小说的经典，其“江湖地位”是稳固的。

至于把金庸推上台面，竞逐诺奖，是华族整体的补偿性愿望，也是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中国”最终被世界确认的想像与愿望。这种热切的渴望在相当程度上混淆了他们的判断力，那就是金庸武侠仍处于文学与非文学的灰色地带。

说句题外话，2000年荣获诺奖的高行健，作品的中国性实在太单薄了。文革与逃亡、流亡的伤痛经验不可能从“以局部代表全体”用来诠释中国文明或反文明。《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加上高氏的戏剧，能反映渊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底纵深度吗？大家心里都有数。大伙儿转而寄望作品充满中国图腾与历史想像的金庸能提名角逐诺奖，这样的集体企望是合乎情理的。

2001年9月30日

误读与假装误读

——《当代马华文存》外一章

《当代马华文存》十厚卷终于面世，举办研讨会的星期天是中秋前夕，我人在怡保，未能参与其盛，也还没向文化协会秘书处索取赠书。与傅承得通了个电话，对照目录，获悉文存收入自己发表于1980、1990年代的论文共十篇，《社会卷》收入拙文〈马来西亚华人的的人生观与价值系统〉，尤其令我感到快慰。

从事理论探讨与整理的三十年过程中，有几篇文章撰写得甚为辛苦，文学部分不谈，文化论述以〈华人的宗教信仰〉（1979）与前面提到的〈马来西亚华人的的人生观与价值系统〉写得最是吃力。这些文章都是研讨会主办当局指定的题目，只能按图索骥，整日价坐在敦拉萨图书馆里，翻阅书籍、爬梳材料，把诸家学说加上自己平日的观察判断所得综合成篇。感谢周福泰兄的催促，否则，这些文章在“正常的状态”下我是写不出来的。

马来西亚华人协会于1981年正月3日、4日假首都联邦大酒店主办“华人社会问题研讨会”。拙稿〈马来西亚华人的的人生观与价值系统〉，在会上宣读提呈，隔天英文《星报》（1981年1月5日）以全版的篇幅报导是项盛会，而以半版的篇幅凸出我的论文内容，斗大的标题是CONFUCIUS BLAMED FOR “UGLY” SIDE，令我“受宠若惊”。兹录部分报导于后，并译成中文，方便读者参照：

“The Chinese are uninnovative, excessively self-centred, greedy, cowardly and insensitive to other people's sufferings..... these ugl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were partl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fucian code of ethics.”（“华人缺乏新能力，过份自我、贪婪，对别人的苦难表现得既懦弱而又麻木……这些丑陋的华人特

征，在相当程度上是孔子的伦理准则的影响所造成的。”)

而我给儒家的定义是：“He defined the Confucian code of ethics as a closed system that pays excessive emphasis on filial piety, chastity, material achievement, loyalty to family, indiscriminate deference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elders, retention of traditions and moderation to the point of insensitivity.” (“儒家伦理准则是个封闭系统，强调孝道、贞节、物质成就，对家庭忠诚，对长辈权威是非不辨的尊重，传统而又中庸到近乎迟钝。”)

“The system also accords respect to scholarship and knowledge only as far as it fetches money and position..... the Chinese are hypocritical people who give priority to the pursuit of wealth..... Brought up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free expression is stifled and total submission to elders is demanded, the typical Chinese is tame, reserved and passive.” (“这个系统也尊重学问与知识，只要学识能换来金钱与地位……华人是一伪善的族群，首要追求的是财富……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只懂得绝对服从长辈，个人自由表达受到阻遏。典型的华人是温顺的、保守和被动的。”)

我的论文长八千字，就儒家教训与孔门德目对华人思想的长期性薰陶与影响，分多个层面讨论，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至于有关记者误读、或假装误读文本，断章取义，仅摘出若干我对儒家的负面批评，而刻意扭曲、渲染，后面的政治企图为何，事隔二十年，我也无从查究了。

有趣的是，该则新闻报导刊载后，当时文协的执行主任周福泰，即接获《社会月刊》主编的电话，请他译成马来文，这份刊物对这篇近乎自我酷评的文章显然很有兴趣，译文后来刊载于《社会月刊》(Jilid XLX Bil.4)，刊行的日期是1981年4月15日。

福泰兄是马来文系科班出身，中文修养亦佳，一般的文告、文章自然难不倒他，但我那篇论文从孔仁孟义，谈到居处恭、执事

敬、与人忠的古训，旁及“彬彬有礼”的人文境界，引录大儒程颐的话语，又涉及四时之祭、慎终追远，大量的中国哲学与文化词汇，转译成另外一种语文甚难恰如其份，因此“三纲”译成马来文就成了 Tiga Lunas，“五伦”也顺理成章地成了 Lima Akhlak。面对 Pandangan Hidup dan Sistem Nilai Orang Cina di Malaysia 这篇译文的马来读者，误读（这趟倒不是假装误读）的可能性很高，但翻译总不免遇上两种语言先天的文化区隔，甚难完整地把握原文的意义，即使文义大体不变，风格内蕴始终有异。

《当代马华文存》收入我的这篇“问题文章”，一方面让文本恢复其本来面目，一方面又能与同时期（1980年代）的其他篇章置放在一起，文本互涉，不仅可以互补有无，更可以让读者多了解那个阶段华社的状况。

根据报章所载，文存共收入八百四十篇文章，体制巨大，篇幅浩繁。不过像拙文那样“幸福”，面对误读和假装误读底礼待的篇章，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吧。误读之产生或由于记者中文理解能力不足，或心智水平不高；假装误读则是撰写人别有用心，另有其他隐议程，近乎罗织栽赃，不过这已是《当代马华文存》外一章的情节了。岁月悠忽，许多历史事件都被时间埋没，如果不是因为文存的出版，我想我也不会执笔详述这篇文章底“传奇性遭遇”的。

2001年10月7日

综览《当代马华文存》序文

——在导论与评议之间寻找方圆规矩

写序有没有方法学 (methodology) 这回事? 好像没有。或许有, 只是自己没机会拜读到。今天在电话里, 与魏月萍讨论写序有无规矩可循的问题——即使是较有伸缩性的规矩——知道她也在为这问题烦恼。一位作家要出书, 邀她和潘永强写序, 月萍迟迟不能动笔, 困扰的正是“怎样写”和“写什么”。

我因而联想到《当代马华文存》的几篇序: 总编辑戴小华的总序, 还有张景云 (政治卷)、蔡维衍 (经济卷)、邓日才 (教育卷)、罗正文 (文化卷)、陈亚才 (社会卷) 等位先生的序文。以上诸人都是写文章的断轮老手, 识见高明, 我和月萍说, 或许我们可从他们的序文底撰写方式获得方法学的一些启示。

戴小华的总序从文存的出版缘起、文存体例、选文原则, 谈到编辑的过程, 收入各部的篇章数量。戴显然有许多话要说, 但限于各部都有主编写序, 不便越俎代庖, 就 1980、1990 年代的华社情况, 只能点到为止。戴小华以“风狂雨骤”形容 1980 年代, 以世纪风暴比喻亚洲经济危机、立百病毒肆虐的 1990 年代末底马来西亚情况, 用恶劣的大自然意象作为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写照, 笔触凝重。戴小华的文章题目〈倾听马来西亚〉, “《当代马华文存》总序”反而是副题。1985 年我编《马华当代文学选》, 以“总序”为题, 当时的文协总会长拿督黄昆福只用“弁言”二字, 〈倾听马来西亚〉显然较感性, 也较亲切。

蔡维衍、邓日才导论的异同

细读五位主编的序文, 可以窥见彼此书写策略甚至切入点的迥

异。就篇幅来看, 蔡维衍博士的序最长, 共十八页, 邓日才校长的序最短, 只有四页。文章长短与素质优劣不一定成正比, 梁实秋替何怀硕写序, 不足一千字, 唯字字珠玑, 掷地作金石声。蔡邓两人有一共同点, 既客观而又理性, 以宏观角度切入, 提纲挈领, 凸出近二十年来发生在马来西亚华社有关经济、教育的重大事件。

蔡维衍擅用众多片语组成的长句, 每个段落的起首往往是个“主句” (topical sentence), 然后像音乐结构那样, 从这个主主题 (motif) 式的主句, 演绎衍生出其他的观察与判断; 邓日才喜用短句, 四字联姻的句型尤多, 文笔简洁。两位先生下笔都极其冷静。蔡维衍的长文只有在论及居者有其屋的课题时, 才用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蔡氏严守经济大厦之门户, 文章长近一万五千字, 这是他“越界”跨入文学广场的唯一句子, 弥足珍贵; 邓日才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雪泥鸿爪”的文学暗喻, 带点惋惜感叹的意味, 也是点到即止。

蔡邓两人的长短序文, 通篇不曾提及任何作者或他们的论述作为发挥观点底凭藉。前者列出十七个面向, 包括新经济政策的冲击、固打制、合作社倒闭、私营化、马币贬值、华巫联营、中小型企业……蔡论八九十年代的马来西亚经济态势, 层次井然, **就华人的经济困境与企业创新, 蔡维衍甚且有逾越文存 1980 年代底线的学术衝动, 潜行至 1970 年代去寻找根源。**作者有很强的归纳、综览全局的能力, 读他的鸿文钜著, 即使不懂经济学, 仍可把握到近二十年来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演变的梗概。

我在电话中对魏月萍说: 读了蔡先生的序, 你不读《经济卷》的文章亦无不可, 因为轮廓清晰可见, 读邓日才的序则不然, 他的文章从 3M 事件谈到大专法令的修订, 但他只给读者一个单薄的阅读骨架, 缺乏敷陈议论的肌理血肉, 要了解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就得静下心来读《教育卷》的一百六十五篇文章。我对月萍说邓日才的书写策略“十分吊诡”, 相较之下, 蔡提供充份的背景知识, 勾划二十

年来马来西亚经济的脉络，近乎“循循善诱”。两人都以事象为主轴，完全不提作者篇章，是一种保持美学比例的“距离书写”（detached writing）。

罗正文、张景云评议的衍异

相对于蔡邓两人的客观阐释，罗正文与张景云的写作风格显然感性了许多。前者负责《文化卷》，后者主编《政治卷》，两位资深报人不约而同地都以选录的作者与文章，作为分析讨论的主轴。

《文化卷》收入约一百位作者的一百四十六篇文章，罗正文在序文中提到廿六位作者的名字，其间周福泰、骆静山、陈再藩、祝家华被提及两次。罗正文是以不同作者的文章主题与内容作为贯穿序文发展的主线，他避免写出个人对作者与作品的主观感受与价值判断。文章前面部分点名提及四位作者的论述“广受注目”之后，接下来虽陆续提到其他二十多位作者与他们的文章，但罗正文已谨慎地不作任何褒扬，让文献本身“说明自己”。

把罗正文与张景云的序放在一起对照，读者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巧合，那就是张景云在《政治卷》序文中这么巧也提到了总共廿六位作者。不同的是，只有陈松生被提两次。张先生的序特殊之处是喜以一、两个段落来亮照某位作者，如果说罗正文是以作品为重，张景云则较凸显作者，他甚至告诉我们那位作者是律师，谁是专业人士，谁是基督徒。罗正文的序完全没有引述作者的文章片断，张景云则有两处引述，第一次引了陈松生的“马来选区的数量愈大，非马来裔的政治代表权就愈弱。这个事实显示，一人一票制的民主原则已经受到严峻的侵蚀。”末节引祝家华的另一段话：“在公共权力的运用上，我们最好相信制度的健全制衡，而不是强人的英明领导。然而，种族威权民主政体的威权倾向已使权力太过于集中，因此，我们迫切关注马来西亚民主政治发展的问题，积极促使

其政体朝向民主化发展。”张的引述或可解读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如此行文，有烘云托月之效。

张先生的序坦率地道出了他对文章的主观感受与判断，像他称许某人文章水平之高可向“法律专业集会宣读”，某作者文章“篇篇都析理缜密”，那位作者“令人瞩目”，那些作者可“列于榜首”，那些作者“高度聚焦”，与罗正文的不作褒贬，无意月旦，书写风格显然大异。张的“笔锋常带感情”，使人想起梁任公的文体，但是像“以《解读种族政治》一书名噪一时的祝家华”这样的句子会不会过于热心呢？家华是否因出书而“名噪一时”（书名应该是《解构政治神话》），不得而知。惟即使确有这样的效应，一篇涵盖二十年马来西亚政治文献的序里如此破格推崇，我不敢说“技术犯规”（我们还在寻找规矩），但终究令人感到有些突兀。

罗正文的序可能最具文学色彩，他在文章起首引述余秋雨、高大鹏，序文进入第二段摘录了高行健《文学的理由》里有关创作自由、作家的艰难处境、冷的文学底释义；再算接到五四运动，近期台湾强调的文学主体性，然后申论到海外华人于不同地域在传承和创新的表演，似乎对近期的“断奶论”作出了间接的回应。序文结束前作者以阿根廷小说家萨巴多对精神价值的肯定，作为抗拒文明危机的勉语，用心可谓良苦。如果是套文存也出版《文学卷》，罗正文这篇序也可能合身。正文是中文系科班出身，仅看第四辑《艺术的繁簇与围限》这个题目，即不难窥见罗正文的文艺倾向，文学修养稍逊的读者可能觉得罗正文有点咬文嚼字呢。

陈亚才的“意义之网”

把《社会卷》的陈亚才留到最后才讨论，并不是他的序写得不出色，而是他的序风格规范介乎蔡、邓的导论与张、罗的评议之间。他既不似前者的 detached，亦不似后者的“黏近”（attached）。他的文章长约万言（共十二页），仅提到朱自存、林昌平、李雄之

三人，为文章穿针引线。

马来西亚华社的现象可谓千汇万状，历史系出身的陈亚才在笔下把它们化约为“对位主题”（contrapuntal theme），而他的任务是把这些可能不相关而内里又互相牵连的问题/事象织成一面“意义之网”（web of sense）。

从文存的几篇序文，我们能抽释出某种方法与规格吗？我曾写过二十余篇序，导论与评议的方式都试过，我甚且放弃自己熟悉的评论书写，改变作风，写过〈与傅承得聊天〉（书信体），也曾夹议夹叙，颇为感性地为祝家华写过〈怀念一个江湖的流离与温馨〉。还有别的方式可循，或其他形式突破吗？

2001年10月14日

中文的“性”困扰及其他

有一趟与〈文艺春秋〉主编黄俊麟先生通电话，谈国内外的诗创作情况，谈中文的问题。他对诗的意见，我有理由保密，避免诗作者或投其所好，或未便攫其锋芒，遂而影响诗稿来源风格之多元。语文为民族表达思想、感情的公器，反而没有什么不能公诸于世的。

俊麟说许多作品，在数量词的斟酌都欠深思。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喜加上“一种”、“一个”、“一张”……生怕读者看不懂，于是这样的句子便出现了：“看了那部电影，我心里有一种感觉……”、“窗外的一个天空”、“我坐在一张书桌前写信”。俊麟笑着说，既然“……心里有一种感觉”，就可能有两种、三种感觉了。“窗外的天空”交代得够清楚，不必注明“一个”。当然一个人是不可能同时坐在三、四张书桌前写信的。

虽然俊麟有点伤风感冒，声音带点沙哑，但谈起语文，他倒忘了自己身体的不适，兴致勃勃。他发现“对于”一词，也大有问题，他如是举例：“纽约世贸中心受到袭击，对于布什总统是一大挑战”，“对于”可以删掉“于”，俊麟笑着说：“这句子‘于’得没道理，画蛇添足。”读者诸君如果有留意，拙文第一段用的句子是“他对诗的意见……”，我没把它写成“他对于诗的意见……”。

我对俊麟说，中文出现许多没道理而又习以为常的片语与句型，像“假如”、“如果”这类交代事情底前因后果的介词，许多时候都可撻去不用。“假如你走了，孩子和我怎么办？”写成“你走了，孩子和我怎办？”，脱口而出，生猛简洁，俊麟在电话的另一端大笑说，妻子离家出走，做丈夫的还在那边假如、假如，

太太早就夺门而出走掉了。

钱钟书的太太杨绛写得一手出色的散文，每次用到“假如”、“如果”这两个词，她都非常小心。董桥曾说他连“如”字也不敢随使用，“怕弱了文气”。名家遣词用字如此谨慎，可为吾辈之楷模。

“性”的泛滥

我也对当前中文的“性”泛滥，引以为忧。俊麟还以为我指的是色情文学或情色文学，我说非也。1960年代初，“可读性”开始滥觞，初用时作者都加上readability，说明这个词源自英文，后来大家使用多了，英文都免去。记得余光中曾撰文批评，大概是说“这本书可读性很高”是语文西化的产物，地道的中文是“这本书内容有趣”或较为口语化的“这本书很好看”（大意如此）。仔细考量，“性”之为物，有时可能指涉较抽象的质地，张景云先生最近出版的《云无心，水长东》，里头有篇文章题为〈蒙德里安的前树后树与无树〉，便有这么一段：

“……严格的说，一篇刊登在报纸上的文章里有稍多的术语，毕竟影响到它的可读性（readability）；我个人或许受到西方文论风气所影响，也很重视可读性，即使是硬性读物也如此。西方文论重视可读性，以致认为可读性是一部书或一篇文章的成败所系（make or break）。虽然如此，文章在可读性方面稍为逊色，也不能构成什么罪状。”

看来，“可读性”已经不是“有趣”、“好看”那么简单，还涵括了文章的结构、文采与可以被读者理解的程度。意涵较广的新词“可读性”，经过一段时间的约定俗成（也就是语文的社会化过程），大家也就接受了这个西化的词语，正如“现代性”（modernity）一类词语，不加引号、不必注上英文，大家都能了解、接受。

除非“性”无欢，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语文现象。俊麟说中国大陆这方面的问题较严重，确然，笔者最近读大陆作家燎原的〈批评的冒险与失态〉，作者首段提到《文学自由谈》这本刊物使用上“锋锐性”，这引起我的注意，追读下去，文章后半部出现大量的“性”字衍义词之多，令人目不暇给。

“诚如张颢武所言……一方以沉重疼痛的大地性背景为依据，恪守文学的现实性和灵魂性，以深切的现实关注的血肉性作为文学的基本底色；另一方面则以都市的准中产阶层为凭借，耽迷于文学的游戏性和消遣性……对抽象的纯理论和新方法的敏感，远远大于对文学的生命性与心灵性的体认。”

在两百余字的段落里，用上“大地性”、“现实性”、“灵魂性”、“血肉性”、“游戏性”、“消遣性”、“生命性”、“心灵性”，集诸性之大全，暴露了作者在语文方面西化——应该说是西而不化或恶性西化——的负面影响。

俊麟听了我的一番议论，建议我们也不妨搞个小型的“语文颠覆”，让大家留意这现象，他想到的句子是：“这条路刚刚修好，它的可行性不高。”他的话一出，我们都笑得喘不过气来。

9月22日读到一篇发表于国内报章介绍台北市的专题文章，作者文笔不俗，内容丰富，可惜进入末节仍躲不开“性”的语言污染：

“而台北的国际化程度也有待改善，英文路名标示不清，市民外语能力仍嫌不足，对国际事务的关心也有限，外国人在台北生活的便利性其实不高。”

最末那句片语是典型恶性西化的例子。其实何必写得那么拗口，直接说：“外国人在台北生活，经常面对各种不便。”不是更直截了当吗？

2001年10月28日

文学资源／写作题材／文体自觉

写成〈当前马华文学的另类书写——兼及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分众趋向〉，脑袋里空荡荡的，虚脱了好几天。精神回复正常后，才想到好些面向都不及在上述论文里提及。

比如说中国文学传统对马华文学的影响，或者把时间差距拉近一些，中台两地对马华文学的参照作用，我都没在文章里论及。台湾对马华文学的影响，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末，国内六十岁前后（尤其是留台生），都读过林海音、张秀亚、彭歌、王蓝、纪弦、覃子豪、余光中、夏菁、郑愁予等人早期的作品。

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一直延宕到政治较开放的1980年代，大陆的文学作品才有看头，马华作家才开始找到台湾以外的另一个资源。就我个人的经验，1980年代我读了不少伤痕文学，描绘的是文革的炼狱经历，当中虽说也有不少优秀作品，但“热题热写”，血泪交迸，艺术的处理反而流于粗糙。我第一个留意到的文笔较细腻的小说家是王蒙，散文方面则私淑汪曾祺。

马华文学当前可以借镜的对象来自两岸三地，这当然要比1970年，只能从台湾取经的状况好得多。这里头没有拷贝的问题，虽然国内有少数作者学北岛、舒婷、杨泽、罗智成，但马来西亚的多元政经生态与中台迥异，在地的因素／条件使我们的作品有异于模仿的范本。马来西亚华裔面对的移民经验与边缘化现实也与中港台不同，想像的空间不一样，所以在模仿、学习的过程能渐渐发展出另一种写作风格来。

至于五四、1930年代的文学传统对作家而言，重要吗？李泽厚先生认为“传统不是身外之物，而是我们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李欧梵教授的看法有些不同，他说“没有传统这一回事，一切都是

解释。”就马华作家而言，这两种说法都用得上，一方面传统确是族群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血浓于水的关系，而要从静态的传统里寻得文化的动力、创作的资源，则要靠作家自己从不同角度，契入经典名著去诠释传统。

被忽略的题材：举例

马来西亚华社有一现象，可以附笔一提。不少华人家长本身受的是华文教育，却把子女送去英美、澳纽留学，年轻的一代只要能用华语对话，有能力阅读华文报章，这些家长就感到心满意足。我们可以说这是马来西亚华族面对政经现实的调整与附从。我无意对这现象作道德的判断（“为孩子的将来打算，有错吗？”），在这儿提出来是因为马华小说家对这现象着墨得实在太少，也太浮浅。

华社有一群菁英分子，他们全力以赴，维护华文教育，为“文化存活”（cultural survival）而奋斗，因为他们了解教育是文化的根本。另一群知识精英，也在保卫华人的历史古迹方面不断抗争，让“存活下来的文化”（surviving culture）不致被消灭、摧毁。马华作家在处理教育这大题材上花了不少笔墨，唯流于“固定反应”（stock response）；就“存活下来的文化”，马华作家这方面的反思又十分不足。

成果较丰硕的反而是文化被“错置”（dislocation）的忧思与乡愁。我指的成果是艺术成果，从温瑞安、方娥真以迄林幸谦、陈大为的中国性书写，读者都可以聆听到血液的声音。黄锦树曾撰文指出我是1970年代“中国性现代主义”的始作俑者，我无意为自己辩护。今日的我，站在世纪之交的十字路口，脑子里想的反而是华族南移的种种历史记忆，书写不是为了纪念，而是为了“再现”（re-presented）。历史会因时势的嬗递而瓦解、被遗忘，事件（像诉求运动）可以为了某个理由被解体归零，但整个过程的发展衍异，充满了声音与愤怒，马华作家没有理由放弃这些

题材。迂回发声或把“剧情”荒谬化，可以避免政治的干预。

我不晓得马华作家有多少人留意到另外一个现象，华族的英语教育群，心理的不平衡。当中有不少人不仅刻意回避与中国有关的事物（包括华文报章、书法、水墨画、华乐、图章，只保留他们对中式烹饪的喜好），而且对这些中国事物有偏见与敌意，他们觉得读洋文比读中文地位要高，有很强的优越感。如果我们把他们视为“数典忘祖”，那么马华小说家在作品中上演的大概是棒打二毛子或假洋鬼子的样板戏。有没有人考虑到华人的压抑经验，和萌生自文化易位的种族自我憎恨的深刻心理因素，以及这种扭曲心理的复杂性？我还看不到任何一部马华作品用心地去处理这个存在于华社的肿瘤一样的大问题。如实地说，马来西亚华社的三个文化圈：受华文教育者，受英文教育者，与受国文教育者之间，由于沟通不易，龃龉不少，大家都把问题扫到地毯底下去。地毯底下不太能见光的事象，不是作家的好题材吗？

语文造诣与文体：举例

还有马华作家的语文根底，也令人难免杞忧。国内大学的中文系（不是汉学系），硕士与博士毕业论文一概不准用中文书写，必须选择用国文（马来文）或英文表述。中文系研究生，除了绝少的例子，大多无法在母语的掌握能力方面更上层楼，反而面对不进则退的窘境。

如果允许我申论下去，我甚且要说当前创作中的马华作家，亦甚少具有文体（style）的意识。中国作家在1985年以后，便很注重磨练自己的文体，以超越毛语言与官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惯用的词汇与比喻。台湾的白先勇在1960年代便成功地糅和了《红楼梦》与其他章回小说的语言路数，融入他的白话文试验中。中国的阿城，正在实验他那种娓娓道来，如话家常，写景抒情，悠哉游哉的文体；香港的董桥文白交融，擅用俚语方言，自成一体，潇洒跳

脱，灵动多变。

诗人杨牧在悼念乃师余复观时曾经这么说：“中年以后我对古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越能把握其精髓，有时还想以白话语体的基础声调来学习古文的质理，通过现代的语气来复兴古文的澎湃、精辟和朗畅。”黄子平副教授对文体的重要性体会最深，他强调：“文体……为人格的一部分，成为掌握和表达世界的艺术方式，既不得意忘言，也不得言忘意。……作家的文体意识同时也是作家的生命意识和实践意识。是呕心沥血，是苦心经营。”

马华作家真正留意自己的文体者，寥寥可数。赖瑞和很早就对文体有自觉（1970年代初笔者曾与他在书信上讨论过），小曼（陈再藩）擅玩弄文字花巧，他的文章即使换了另一个笔名，读者仍然认得出斯人，由于求新太切，小曼行文偶尔会过火或失控。傅承得深谙“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道。诗人方昂刻下在师范学院教语文语法，了解文白配置，适度西化，再衬之俗字俚语的巧妙效应。人在美国的骆耀庭，有方昂的语文自觉，但寄回来发表的作品太少，等着他的文章，真要“望穿秋水”。黎紫书在铺陈意象语时，十分留意语调与文字节奏，这构成她的文体特色。张贵兴的文体至顾而不索，诡奇、艳异兼而有之。现就职于马华文学馆的许通元努力从事他的文体试验，瑕瑜互见，如何从囁嚅踌躇中脱茧而出，要看他的造化。

就文学而言，记者那种新闻报导式的文体，无论对创作或论述，往往是个负面因素。新闻报导倾向于重点陈述，三、五句即成一段，鸡零狗碎，内容偏枯，不利于细节的铺陈蔓延，而散文，小说都需要让情节开花，让事态结果，评论则更需要其他论点、资料来佐证前面的观察/判断无误。

我对新闻从业员并无成见，国内华文报的记者从事于文学笔耕者占了一个不少的百分比。曹聚仁、萧乾、刘雁宾等前辈，并没让记者的新闻实录思维模式，影响到他们抒怀言志的能力，但我的确

看到一些新闻工作者，僵固在消息报导的平面叙述里，挣不出来。要挣脱职业惯性，必需换一个思维模式，要塑造自己的身姿，就必须具有文体的自觉，不同的题材甚且需要不同的文体来承载，这是作家的苦恼，却往往是读者的福祉。

2001年12月9日

论文之间的对话

刚刚落幕的“廿一世纪世界华文文学的展望”研讨会提交的十六篇论文，当中或多或少都涉及华文写作的语言问题，其中尤以李欧梵、李爽学、黄子平三位教授论及的层面较广，也较具体、深入，互相参照着来读，最具启发性。

李欧梵引用王安忆的观察，后者认为大陆小说语言较为口语化、地域特征明显，较具“书面感”；台湾小说语言则是汉语技术化，熟字生用，旧词新用，变通之处很多，较具“阅读感”。王安忆认为大陆小说家是以语言“再现现实”，台湾小说家则是对现实的重新编码。

而李欧梵自己的看法是中文的“杂种化”，“杂种性”(hybridity)这个词听来不免刺耳，其实李教授要指陈的是中文的混杂化，即中文无可避免的会受到英文与地区性语言的渗透。黄子平的论文末节，提到香港的“旧三及第”文体与近年来流行的“新三及第”文体，正是具体的语言混杂现象，可以作为李欧梵论见之佐证。

何谓“旧三及第”文体？文言加白话再加粤语方言是也。何谓“新三及第”文体？白话加粤语加港式英文是也。“行快D啦”挪用英文字母，“Quali唔够”挪用了英文的片断，当然香港中文把英文单字的谐音糅进语文里的例子比比皆是。上述两个短句是我读了两位教授的论文，想到写到的。

研讨会的交流过程，来自马大中文系与语文与应用语言学系的学生，对语文的规范这点甚为在意，许思和教授则认为语文的规范对文学构成伤害。这问题很难有定论，可能正如诗人张错说的，研讨会会有结论就不必研讨了。作家一方面要掌握语文的规矩，一方面

又不愿受制于语法的箍限，文学的最终创作成果，很可能是作家通过内在的辩证后，综合或结合产下的宁馨儿。

受过双语训练，而又能用双语写作的人，往往面对两种语文互涉互扰（mutual interference）。李欧梵自己也承认：“当我用英文写学术文章的时候，脑后仍潜伏了中文的影子，但用中文写作的时候，却往往英语先行，甚至须先在脑中译成中文后把‘洋味’去掉，才能复归中文本位。”

李爽学教授在讨论《灵山》以及小说的语言问题时，指出2000年诺奖得主高行健由于熟悉法文，因此特别留意中文词性、主词与动词位置的限制等等问题。高先生甚至认为《马氏文通》应该改写，因为借用西方语言学来分析中文已不足应付。

语文面对前所未有变局

李爽学进一步指出，主修西洋文学系的学生，常常比出身中文系者更能体味中文或华语文学的价值，“语言上深具世界观的人……比语言上的国粹派更懂得什么是‘纯正的中文’。”我觉得李爽学论文里提到1993年9月高行健与诗人杨炼在雪梨对话，高氏建议以“华语”一词取代“中文”、“汉语”等名词，这点可能有争论余地，有心之士不妨在这方面进一步思考、探讨。

李欧梵就京派文学、海派文学的分野作了一些评议。他认为南北分歧其实不如想像得那么大。他问：“王安忆究竟属于北方或南方？”而在通俗文学的层次，从包天笑到张恨水，都同时兼具南北色彩，可谓南北冶于一炉。

李教授认为北方口语的霸权地位不是当前面临的问题，不同区域的中文都需仰赖语言的技术。我在想，所谓“语言的技术”是否与“语言的规范”同义？如果意义不对等，它们之间互斥互动的关系又如何厘清？

李欧梵在闲谈时对我说：“我们的语文确实面对前所未有的变

局，远的不说，就讲‘宵夜’这个词好了，大家已经用了几十年了，近年来却颠倒过来改成了‘夜宵’。”研讨会过后我返抵家门，我忽然联想到日文处理这个词的方式，查到的资料是“夕食”或“夜食”，我不知道“宵夜”何以会变成“夜宵”，却可肯定这种蜕变并非由于日文的影响。

2001年12月23日

与张锴谈“语言的共同体”

安得逊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体” (imagined communities) 概念，经常被引用作为讨论离散族群的心理认同建构，但是像诗人张锴于“廿一世纪世界华文文学的展望”研讨会提呈论文，把“想像的共同体”引申衍异为“语言的共同体”，以纾解边陲、中心之辩争与分歧似属首次，值得大家注意。张锴先说明各区域的华文文学，是“人类总体文化现象下一个多元有机整体”，并藉此引申其观点：

“……华文文化不再只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它们更像国族形成的前奏，是一个个想像共同体。在同一语言底下，它们个别衍生，而成一树多枝的多元体系，互相平衡发展，互相交叠指涉，互相影响或拒绝对方。如果这体系经过调整组合，它滋生衍变的力量必然强大无比。”

张锴的观点使我联想到杜维明教授提出的“文化中国”一说与其涵蕴的三个“象征世界” (symbolic universes)，根据杜维明的说法，大陆、港台、新加坡是“第一象征世界”；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构成了“第二象征世界”；而学者、艺术家、诗人、作家、知识分子与新闻从业员则组成“第三象征世界”。杜教授以地域与人物作为区分的方式，与张锴以语文作为“一统化”世界各地的华人文化认同，论述侧重点可谓大异其趣。

就笔者对张锴论文的解读，华人面对的地理边界并不那么重要，当他写下这样的句子：“华文文化不再只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我特别留意的是“不再只是”这个关键性片语。张锴一方面承认华文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一方面暗示华文文化可以纳入不同地方的区域因素，“在地化” (localised) 是为了适应政治环境与现

实需要，这种调整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

多年来诗人张锴一直为其“边界思考” (border thinking) 所苦 (“边界思考”是 Walter D. Mignolo 提出的概念)。诗人原名张振翰，出生于澳门，香港长大，于台湾国立政大西语系毕业，赴美深造，获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南加州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兼东亚语文与文化系系主任。他于1990年代初于台湾发表作品，流露明显的中国性与文化认同，本省意识激化的台湾评论界的反应不仅冷漠且近乎不屑，庄裕安撰文讥讽“张锴是站在迎风的高处咏赞婆娑之岛”，认为张氏对台湾的好奇与好感，与游客面对巴黎大街小贩、梧桐或公厕惊呼我爱你那美人没有什么分别。张锴于1991年1月于《当代》月刊发表〈文学不可以儿戏〉一文，语调充满了惆怅无奈：

“……我不欲在此强调我的中国情结及台湾偏爱，也不欲因无人了解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心情而伤痛，我只想在此给年轻的评论家说一个小小的《圣经》故事……”

中心确是一个强劲的磁场，散居边缘的知识分子、作家与对身份认同感觉敏锐的华人，都难以抗拒这种“中心的诱惑” (the lure of the center)，张锴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在众人都强调国籍的同时，不要忘了身份认同所蕴含的文化情感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诞生于中台地区以外的华裔，在面对现实的不快与政治的排挤时，自然而然会感觉到自己的“错置” (misplacement)。但自怨自艾解决不了问题，飞蛾般朝着中心的火焰扑过去，炙伤的恐怕是自己。本土意识强烈的今日台湾，和大中原主义仍颇当阳称尊的中国，都不会太欢迎孽子或浪子的“回归”，即使这种回归并非国籍的转换，而是一种精神的、象征的姿态，当然这种姿态往往会形诸于文字。

变数终于出现了，全球化的浪潮——尽管它同时携来的问题真的不少——适时地纾解了花果飘零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心理困局。

“华”字与血缘、文化、历史、族群、习俗相联，它凝聚了族类的集体记忆，来自欧美新马澳纽的华文书写都离不开“语言的共同体”，大家都可以用文字想像“中华”这个总体/本体。“语言的共同体”逾越了国界或至少模糊了国界，用文化理论来说那是“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使中心变得不再那么权威，使边界变得不再那么附庸。记得李欧梵教授曾经提及：边缘可以反中心，但是不可能取代中心(我在想，新马两地又如何可能取代中台两岸?)，李欧梵指出边缘的反中心模式是把中心解构，只要把中心变成数个中心，中心独一无二的权威性便被削弱，我在思量，花踪文学奖的颁发渐渐发展扩大为两年一度的“花踪文学节”活动，假以时日，花踪作为一个华文文学的重要节庆，它能否具备其中一个中心所需要的条件与能量呢？

以上所述有点跑题。让我们回到张错原先的论见。“语言的共同体”与另一位文化研究学者瓦纳(Michael Warner)的“文字的共和国”有若干相通处，两人都视语言文字为最重要的仲介与溶剂。所有“语言共同体”底成员，都可以抒发他们的家国之思与文化乡愁，在文字的艺术殿堂里找到故乡；或者换一个说法，在他乡里仍能寻得原乡底意义与慰藉。

张错终于想通了，他的论文给我的印象是，他终于找到自己精神的出路。12月8日花踪文学奖颁奖礼过后，张错与笔者乘坐主办方安排的巴士回酒店，时值午夜，车厢里又黑又冷，吉隆坡市区的高大建筑，在街灯摇曳下，光影破碎，似真犹幻，约半小时的行程中，我们一直在这问题上交换意见。张错讲了句令我难忘的话(大意如此)：

“海外华人实在没有必要‘申请’、‘呼吁’、‘企图说服’中国或台湾接受他们的认同或回归，有谁听说过作为子女的要申请、呼吁、企图说服父母，自己是他们的‘亲骨肉’的呢？”

2002年1月6日

回归与放逐的诗学

1月2日写成〈与张错谈“语言的共同体”〉，传真给报馆，两次校阅，已是定稿。5日中午收到诗人张错自洛杉矶寄来的诗集《槟榔花》，内附函件，读了信与书的原序、再版序后，觉得自己下笔不免孟浪，资料有欠正确，需要作些勘正。如果可能，笔者也会就回归、放逐的诗学略抒浅见。

最明显的错误是：“他(张错)于1990年代初于台湾发表作品，流露明显的中国性与文化认同……”实在的情况是，诗人于1988年2月杪应母校政大西语系之邀返台客座，后来又应余光中之约，于同年7月赴高雄中山大学外文系“与一群可爱的研究生谈诗”。1988年到1989年，张错教学之余，北上南下亲炙台湾的人物风土人情，写成长短诗作廿八首收入《槟榔花》，“……于1990年初于台湾发表诗作”宜乎改为“……1988、1989年于台湾发表诗作”才符合实况。

表面看来，《槟榔花》作为诗集名称稍嫌平凡，读了作者的序，印象才改观：“夏末我们曾聚众赴六龟，途中过美浓及十八罗汉山等地，穿越一条槟榔林荫大道，忽地一阵清香飘送，原来已是槟榔花开的季节……我嗅到那一股的清甜袭人，我听到一种呼唤，漫长而遥远，我应声遥应，彼此浑成一体，如风溶入更大的流动，浪卷入更强烈的波涛，槟榔树强烈茁长的欲望，惟大地可知。”(页18)这是作者第一次元的感受。第二次元是真正的体验与品赏：

“……大家围桌吃饭，余光中谈起宾士与槟榔，徐君鹤兄随即下楼购果，以‘启发’已入尚尚未随俗的我与余佩珊，青涩的果实，甘之若饴，好像经此一尝，我便已列入乡公所名册，落籍台湾。”(页21)

读了这两段文字，我才恍然檳榔花正是诗人意象化了的台湾本体。作为一个“漫游者”（flaneur），张错的身世颇为特殊，据书中所载，诗人小学六年在澳门念，中学时期在香港逗留了又复六年，在台念大学四年，加上1988、1989年的短暂居留，在台湾的时间亦恰为六年。张错在美国念研究所，学成留学教书，在彼邦居留逾三十载。1988年他曾认真考虑在台定居，却因受到谰言的“打击”，使他选择了自我放逐，回到美国去，用他原序里最后的一句话：

“一旦抵达目的地，我心目中的众人皆已舍我而去。”（页23）

双重文化的诗人

张错诞生于1943年，1988年返台时正值四十五岁的壮年。1989年之后返美与当年去美国念研究所的心情完全两样：早年赴美是深造而非流放。作为一个“双重文化的诗人”，比作为一个“双重文化的学者”可能更困难，因为前者感性强烈，容易受伤，而学者往往沉潜于科学实验与文史哲的理性研索而浑然忘我。换言之，“双重文化的学者”往往能左右逢源，他们是学界的宠儿，从世界的这个角落飞到另一个角落，用英语或华语发表他们的精辟论见与研究心得，获得众人的掌声与肯定。他们的行程表注上了各大都会包括巴黎、柏林、纽约、伦敦、北京、上海、东京、香港、新加坡和吉隆坡，由于在政经文教的学术舞台上能发挥影响力，“双重文化的学者”多可从事业的成就感获得心理的慰安或补偿。相较之下，“双重文化的诗人”往往摆脱不掉文化的乡愁，与因而萌生的失落感，甚至身心难以平衡，他们总觉得生活里欠缺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而那是丰富的物质难以（或无法）填补的。

“双重文化的诗人”如果要避免自己身心分裂，成为一个“解体的人”（a dispersed person），他最有效的武器是不断发

声，用声音证明自己的存在。写作是最有力的发声方式，它不仅证明了诗人活着，而且活得有意义，并且把个人的伤痛升华为艺术的结晶。艾斯勒（Richard Exner）在一篇讨论放逐与文学的关系的论文里提到：“语言是不折不扣的‘生命标志’（lebenzeichen），它代表了生命的存在。”个人的心境，现实的遭遇，异邦的漂泊感、边缘感，精神深处的抑郁、憧憬与梦幻，都可藉语言文字得到抒发，存在的孤绝感也在相当程度得以纾解。

流放心情的实录

我对张错的理解是：家国之不幸往往是诗人之大幸。张错的港澳台美交织成的现实与心理经验，与中年回归蒙受挫伤又复选择出走／放逐那种刻骨铭心、无悔有怨的遭遇，是他创作动力的主要来源。《檳榔花》出版之后，张错陆续写成的几部诗集如《沧桑男子》、《细雪》及《流浪地图》，都是思乡病（Heimweh）与流放心情的实录。用李文（Harry Levin）的话：“流放中的作家一直是人生经验最深刻的证人。”我想李文教授笔下的作家当然包括高度敏感的文字使用者：诗人。

2002年1月20日

“浪漫到贴地”

最近很想什么事都不做，只想学好自己的华语，写诗唱歌。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状态，很可怕的一种情绪。我想离开营营役役、蝇蝇苟苟的生活模式，即使离开是暂时性的“逃避”。

教了二十多年书，教的是中四、中五的华文与中国文学，最近却想“把华语讲得好些”，说来可能没人相信，这念头来自两个激素：一是在花踪文学奖的研讨会上，李欧梵教授说：“我虽没在北京逗留过多久，但自信还能讲点地道的京腔普通话。”另一激素来自近两、三个星期来观赏《雍正王朝》连续历史剧，从康熙雍正到狗儿翠儿，他们讲的华语，字正腔圆，让我只有咋舌的份儿，尤其是他们的卷舌音，掌握得太好了。二月河的三套皇皇钜著，我早已拜读，剧情亦已预知，但是从小银幕的声光效果衬托下看宫闱斗争，更是紧张逼真，除了可以欣赏个别演员的演技外，另一方面也可以留意自己日常的遣词用字，改善自己的华语发音。

回到诗的世界建筑自我城邦

至于写诗的冲动，一方面来自与张错兄的千里传真，互通讯息，我觉得他有一颗长青的诗心。诗、文章和信札行文自然流露勃然的英气，像他这种人去练武练剑，武艺与剑术相信都有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侠气，余心固向往之，乃有退隐江湖，撒下世事，回到诗的世界建筑自我城邦的企图。另一种驱动力来自这几个月来我对夏宇、白灵、欧团圆、鸿鸿、陈克华、罗任玲、丘缓……诸家的研谈，本来是学术的探究，却同时也变成了对于不同语言/形式的可塑性与原创性的强烈好奇。这当然要有一点时间的沉潜与消化。在这个节骨眼，大厅的电灯泡坏了汽车的的扫雨器有些吵，这些事我

无力去管也懒得去管。

近日这种退隐的行动愈炽，我想用一种过去不用的语言与语音与人对话，我想用过去自己不用的语言与形式去写诗。我突然想起欧文（Stephen Owen）。他在《新共和国》评北岛的诗，指出后者的诗没有个性，是一种世界诗，他引录了北岛的几行中诗英译判断北岛用的都是些陈腔滥调，是世界各国诗人常用的语汇与意象。李欧梵撰文反驳，指出北岛诗的北京腔调，他说：“祖国是一个世界性的意象；多音也可能如此。只有当你在读诗时心中‘听’到北京人的口音，才可能体会到现实带给诗人的恐惧。”也许，我应该认真思考要用怎样的音色与腔调，才能反映诗人的心境，以及诗人与现实如何发生龃龉，而这种尝试，正统的音韵学可能帮不上忙，要多方揣摩和尝试才可能有收获。

至于想唱点歌，倒不是为了调剂。去年6月，大将书行庆祝出书一百种的盛大晚会上，我曾想过以木吉打边弹边朗拙作〈一场雪在我心中下着〉，后来觉得自己以几个和弦伴奏毕竟难登大雅之堂，乃退而要求谢川成学棣在幕后清唱，我在台上拿着麦克风吟咏。不能以六弦琴自弹自朗多少有点遗憾，久之遂成了心头一个结。

最近听卓如燕唱陈徽崇作曲、小曼填词的〈花踪〉。卓如燕轻快地走到麦克风前一尺半的位置上稍稍侧身站好，笑靥如花，从她口中流露的是歌声也是文字，竟如泳鳞出水，又似鸿雁高翔，我完全给她那种饱满的自信，脱俗的风华震慑住了。是1988年吧（年份记不清楚了），亚洲华文作家会议在联邦酒店举行，记得当晚卓如燕也是受邀演唱的艺术歌手，那时她的音色已很圆融，但就是没有十多年后多番历练那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而歌要唱”的决绝与从容。那一刻，轰然涌进我脑门的“第一念”（“第一念”是佛家语）是：我什么事都不管了，我要去Yamaha，好好学吉打，好好唱歌。

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聆听了曼奴兴（Yehudi Menuhin）的小提琴演奏后，激动地说：“现在我相信上帝确实是存在的。”Menuhin是天才小提琴家，我可以了解爱因斯坦的激动，音色之美的确可以令人如斯激动的。我在电话中告诉小曼：“卓如燕令我惊艳。”小曼笑了，我想他会了解，我之惊艳非目眩于翠羽明珠的闪烁，而是浑然投入于飘逸跌宕的音响风云。

陷入拟高行健状态

这十多天来接电话，我故意（应该是有意无意间）“得罪”了不少朋友/顾客。他们听不到我平日的礼貌与客套，硬绷绷的一答一问，甚至连客人姓什么也懒得过问。没会过面的客人，完全听我的谈吐来决定要不要前来向我作业务諮詢，按常理来说，他们没理由又要付钱又得忍受我的冷漠。可能有人以为我用的是创意人詹宏志的“势利/傲慢策略”（snobbish strategy），哪里有这回事。我只是突然间陷入一种我称之为“pseudo 拟高行健状态”的状态中，放不下我的母语抑扬顿挫的韵致，想用自己的母语把思转化成诗，想唱歌大概是对吟游诗人的一种向往吧！周星驰会说：“温任平，你有病咩？浪漫到咁贴地！”

壬午马年将至，谨向电话里被我无心顶撞过的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致歉，请大家海涵，原谅一个在现实与理想间晃荡的人无意识的、偶发性的情绪走火，好吗？谢谢。

2002年2月3日

与王安忆谈情欲小说

陈思和教授曾提及王安忆颇为独特的文学发现，后者认为在汉语语汇里，缺乏一套现成描写性爱的语言，古代文学的性爱描写，多出自戏曲和诗词，《诗经》民歌式的性爱描写，古典典雅，很难产生性的联想，当前的中国小说的性爱大多污秽不堪。

这段话里头的因果关系，读者可能要作些衔接的工夫，那就是由于汉语词汇的缺乏一套描绘性爱的语言，古典作品亦缺乏参照的对象，当前作家写小说，涉及性爱只好闭门造车，想像卑琐，文字自然不堪入目。

王安忆于1980年代初出道，写过几部颇为大胆露骨的情欲小说像《三恋》，与晚近中台小说家写性的恣肆张致，耸人听闻相较，还算是相对含蓄的了。王安忆被称为海派作家，虽然她自己不一定喜欢这标签，而海派作家的“祖师奶奶”（用王德威教授的谦称）张爱玲写情欲曲折迂回，唯丝毫不减其可怖。《半生缘》写祝鸿才与曼璐两人设局强奸小姨/妹妹曼桢，张只提到关了电掣的房间里，曼桢嗅到一种她熟悉的男用哥龙水的香气向她慢慢逼近，场景全黑，完全没有飞檐大咬的巴洛克式写真。张爱玲师承《红楼梦》，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曹雪芹写来像雾又像花，都属点到为止。

五四以迄1930年代作家有郁达夫的性苦闷、偷窥狂，张资平、叶灵凤笔下的通奸乱伦，和新感觉派施蛰存等人性压抑的变态书写，是否已堕入王安忆所说的“污秽不堪”的雷池，或许尚待时间验证，西方文学已有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聚讼纷纭，需要一段时期才能让尘埃落定。有一点是肯定的，五四时期的小说，狎邪书写并非主流，而是旁支发展（但这不等于说不重要），一流的小说家从鲁迅数下去，沈从文、茅盾、巴金、老舍

他们更关心的是社会制度、习俗下的人伦与人性表现。

追溯上去，清末的《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和《孽海花》，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一概把它们称为“狎邪小说”，但这三部小说于性活动的着墨却出人意料之外的吝嗇。《品花宝鉴》写的是男优与恩客的同志恋，不愠不火；《海上花列传》一口气写廿多个妓女与嫖客的姻缘，但这部小说文字出人意表的干净，小说中的几个主轴争风吃醋的故事反而像家庭剧（妓院是另一种家庭形式）的妯娌斗争、妒嫉、诬骗、真相的揭露与人物的醒悟，描绘性爱或性行为的部分不是迷糊过场便是尽在不言；《孽海花》写的是中国传奇女性赛金花（小说里的傅彩云），用一个高级妓女与八国联军统帅的床上奉献，使中国得以免去更大的剥削与欺辱，国族寓言的意味颇为明显。有意向这三部狎邪小说学习性爱文字或修辞的读者，作者恐怕会失望了。

从古典小说中寻找灵感

对情色（或色情）书写有兴趣的作者，只能从《金瓶梅》、《聊斋志异》、《玉蒲团》这些古典小说里去寻找灵感。贾平凹步武《金瓶梅》，唯妙唯肖，《废都》的情色渲染除了直追《金瓶梅》、《玉蒲团》，经常露械和体液流泄不已外，还加上一串串“□□□□（此处删去若干字）”的注明，既拿洁本开玩笑，也是在吊读者的瘾。如实地说，《金瓶梅》、《肉蒲团》、《废都》三点皆露，真刀真枪，早已是逾越三级片的层次晋入四、五级的淫欲文字演出。

与王安忆同期的作家像李昂，她的《暗夜》、《杀夫》和原著《迷园》的情色描写：性变态、性虐待、性饥渴、性游戏可谓花样百出。《迷园》有一段情节写男主角林西庚与朱影虹的床上戏，林雇用了一位盲眼按摩女替他作裸体按摩，朱影虹则利用按摩师的失明与男人不能动弹的巧妙空隙，在林西庚身上玩性花招，李昂写的

性，想像力可谓十分丰富。李昂比朱天文、朱天心姐妹，与近年来崛起的卫慧更加“敢言人之不敢言”，奇怪的是，李昂的文字并不污秽，她只是把情欲想像的空间给扩展了。

情色小说在语不惊死不休的情况下，便出现林耀德、曾阳晴等人天马行空的性幻想，夸张到了极致便有上班族的全部裸体，尸恋，并且绘形绘声地写人物从自己的肛门钻进去从口里钻出来的历程，嗅觉稍敏感的读者可能会嗅到尸臭或屎臭。

中国小说家古华写偷欢细节，速写快描，手法别致，正如王安忆都与污秽无涉，要特别一提的是文字、格调与李昂迥然大异，而性想像活络生动、布局宏大的苏童，他的《妻妾成群》、《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罍粟之家》刻划大家庭的淫乱，情欲的泛滥，偷情乱伦，笔力、气势与内容情节都令人震撼，但文字并不恶俗。莫言写性可以很狂暴，他有一篇小说写城市青年在离乡的路上，被因意外而弄瞎了一只眼（我想到的是“独具只眼”的讽喻）的早年女伴拦着要求与他在野地苟合，实在是惊人之笔，不过莫言懂得用对比与象征过场，我想都不属于王安忆的“污秽不堪”者流。

王安忆的文学发现，笔者是把它“问题化”了（*problematized*），目的是让大家于色情文学与情色文学的歧异多作些鉴别。至于汉语系统是否因缺乏一套描绘性爱的语汇，而使情欲小说堕落污淖秽池，是可以进一步思考、讨论的课题。

2002年2月17日

《心经》偈“一切乱梦颠倒”

——人间义初探

《心经》文长两百六十二字，最为人所熟知的偈可能是“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日前因缘和合，与一日本僧人面晤，他说“空”是Sora，并举起一手指着天空：“在我上面什么都没有，同时什么都有。”

两年前听达赖喇嘛与释圣严法师论“空性”，这是根基扎实、发人深省的一场对话，使我了解英文词汇如emptiness、nothingness、voidness都不能涵摄空性的真义。所谓“色即是空”，指的是以某种形态存在的东西，均无可能永远存在；“空即是色”意云：正因为不能永远存在，东西才以假相存在于一时。“空”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没有疆域圈限的“无穷大”，因此，“无中生有”是可能的、可行的，作家、画家、音乐家、发明家以他们个别的不同方式，从事的正是无中生有的工作。

苦思多时而无法渗透的是《心经》章节的另一偈语：“远离一切乱梦颠倒”。根据常识，生活里一切有违常态的活动，都可以是乱梦颠倒。嫖赌饮吹是乱梦颠倒，过度的吃喝玩乐何尝不是乱梦颠倒？从语意学来解读“一切乱梦颠倒”，摆在句子最前面的“一切”乃关键词。它广泛的涵蕴了诸般乱梦、各种颠倒。现实中的赌场（casino）、卖摇头丸的卡拉OK、脱了胸罩来招徕客人的酒廊、万字票、高利贷、马场……是乱梦，也可以是颠倒，但就是不尽符合“一切乱梦颠倒”，因为它们的规模不够庞杂，仅及于贪嗔痴三毒或色、受、想、行、识五蕴的一部分，就我的观察，只有反映一国经济寒暑表的股票市场，在多项外力粗暴干预而造成扭曲畸形的股票市场，才称得上“一切乱梦颠倒”。

参与共谋者，盘根错节

股市由大小炒家操纵，涉及的钱财以亿兆计，其渗透面之广，不分种族性别，从卖甘蔗水的小贩到政府高官，从买卖两、三个lots的小鱼到几千个lots的大鳄，遍及社会各阶层。国内外的热钱，投资（投机）基金合纵连横，互通声气，目的不外乎择肥而噬。股票行里的常客有不少是白发老翁和老妪，有些甚且还是夫妻档，他们大多数是退休人士，当然十五、六岁少年瞒着父母炒股票者也时有所闻，股民年轻化是个不争的事实。

至于股市的各种黑幕、阴谋，复杂周密得难以想像。要推高爱价出货，和推倒股价乘低吸纳，都经过周详的计算、部署。除了散播谣言，更借助各类媒体推波逐澜。参与共谋（collusion）的人士包括在朝的达官显贵、工商巨贾、基金经理、股市经纪、报章经济版撰稿人和隔邻把黏土通知你的师奶。

以上所述属于公开秘密，兹举一例，说明股市之诡谲恐怖。两年前某上市公司热炒，公司执行董事的太太在雪隆、马六甲一带高姿态买进自己公司的股票，价格在六元五角左右，估计买进股票之款额不少过一百五十万元，这当然惊动不少消息灵通的股友，大伙儿觉得既然有关公司的董事家属大手笔入货，该股后市肯定大好，必然会大炒，不少人因此决定倾囊而出（也可能是连同自己的亲友倾囊而出）搭顺风车，准备大赚一笔。

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整件事是个布好的“局”，该公司董事连太太都瞒住了，让她去做台面秀，“谷”起股价，自己却大量沽货，赚个盆满钵满。至于太太亏蚀的一两百万，把赚益所得，分个20%出来便把洞给填了。其实类似的操盘炒作，屡见不鲜，有鉴于可能牵涉到法律问题，不便在此一一揭发。但是即使从我拈出来的小儿科黑幕，大家仍不难了解股市泯灭人性的丑陋面，夫妻都要欺瞒，太太或亲戚都可以拿来作诱饵，这不是“一切乱梦颠倒”是什么？

大小股友的实战经验虽然不尽相同，但堕身罗网，内心焦虑惶惑，以至于对日常事务心不在焉，整天患得患失，其根由与本质都一样，严重的程度与投进去的金额大小成正比。“一切乱梦颠倒”的症候尽在其间。

张五常教授曾撰文列举多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奖的一流学者，退休后觉得自己于经济内行涉足股市，结果一个个输得焦头烂额。在股市里，许多经济学知识都派不上用场。《One Up On Wall Street》这本畅销书，您有读过吗？作者是华尔街著名Guru彼得·林因（Peter Lynch），Fidelity Magellan基金经理，他曾直率地指出在股市里，散户处于绝对的劣势，在一般的情况下（不是大牛市也非大熊市），胜负的比例如以十人计算：大概介于一赢三和六输与二赢三和五输之间。为什么大家明知这是块砒霜，还要去踩？是佛家所说的“业力现行”吗？还是如吉隆坡一位城市策划师告诉我的那样：“蜘蛛人沿着玻璃幕墙攀上险峻的巨厦，享受着他人无法体会的晕眩刺激，和近乎自虐底快感？‘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说得对，‘子非蜘蛛人，安知蜘蛛人之乐？’”

资讯不对称，强弱悬殊

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史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艾克罗夫（George Akerlof）和史班斯（Michael Spence），以“资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理论荣获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史蒂格利茨曾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及世界银行副总裁，现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所谓资讯不对称，即市场某一方一定会比另一方把握更可靠有用的资讯，比如说，贷方比借方更清楚后者的资信，汽车卖主一定比买家更明了自己的汽车底性能好坏，公司董事和其他高级执行人员肯定比普通股东清楚公司的营运实况与获利能力。在股市里，一般散户是处于资讯匮乏（或资讯不确或资讯延宕）的一方。所谓自由市场，除了可以自由买卖外，其他都“不自

由”，公司董事完全可能以各种好处、假相为饵，引诱散户入彀，然后来个一网成擒。

911事件发生后，大家都生怕会爆发生化战，于是美国的生化科技股受到热捧，第一宗炭疽病患出现后，麻省的Avant，加州的Cepheid，圣地亚哥的Nanogen，股价分别涨了22%、40%和49%。国内平面媒体于10月17日报导了这项消息，附带注明“分析员预料”（所谓分析员通常都是撰稿者现身说法）：马来西亚市场涉及生化药物科技的THGroup、Latexx、Uhdove、Topglov、CCM、Supermx、Georgetown、Ahealth、Pharma等企业将会受惠。10月17日，报导一出街，上述诸股项热炒，股价飙升10%至33%（生产医疗用胶手套的Latexx于一天半内从RM1.72涨RM0.70至RM2.42）。10月17日之前，便已累积生化股的大户与投机集团全都发了一笔战争财。炒家、媒体与个别市场分析员、撰稿人的暧昧关系，呼之欲出，毋需明说，我要指出的是，先获得资讯的一方如何占尽优势，后知后觉的跟风者（10月18日进场）如何因资讯延宕而损手烂脚。

上回准确预测亚洲将会出现经济危机的克鲁曼教授（Paul Krugman）曾经指出：“股民不是一个快乐的族群。输的不必说，赢钱的或因沽的价不够高，或因当初买进的股票太少而闷闷不乐。通常输的和赢的都不快乐，虽然彼此不快乐的理由并不一样。”好一句“输的和赢的都不快乐”，它一语道破了“一切乱梦颠倒”的人间义。

本文无意打击国内本已低迷的股市，马来西亚的股市人口可观，如果股民一个个相继破产，其他非股民的处境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我是希望股民少听那些所谓股市专家的意见（他们也在输钱呀！）。他们在讲座上建议听众买进某些股项，说不定隔天他们就乘高沽出那几只他们推荐的股票。这是结合现代战略和古代兵法的“虚者实，实者虚”与“引蛇出洞”。要讲专，他们专得过诺奖的

得主吗？

当然，您也无需在读了拙文后，“大彻大悟”入场沾光手上的票据。股市有一定律，那就是“低买高卖”（“人弃我取”有时是自讨苦吃），当前的股票太低，而每日交易额近两亿的马来西亚股市后市并不那么坏。彼得·林因有一句话可谓语重心长：“Small investors tend to be pessimistic and optimistic at precisely the wrong times.”（“小投资者恰恰在不应乐观的时候乐观，不应悲观的时候悲观。”）现在还不是沾货的时候。

对于投机客，借花敬佛，谨摺用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话奉上：“在两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投机，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和当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冒险躁进，贪得无厌，最后只有在“一切乱梦颠倒”的泥淖里沉沦。

2002年3月17日

没有讲台的讲台

后现代主义大师李欧塔（J. F. Lyotard）就知识分子扮演的功能与角色，曾作过非常精辟的析论，针对“知识—权力”这个运作模式，李欧塔写了一篇电视讲稿题为《没有讲台的讲台》，他特别要求播映的方式是话语与映像的嘴型、表情并不同步。他用他自己发明的方法，破坏听众/观众对话语权威的信赖。演讲的过程，由于与演讲者的口型、表情都不配合，自然产生一种“除魅”（disenchantment）的作用。“知识—权力”的影响能减，人们较能客观和郑重地思考演讲文本的实质意涵。

傅柯的“知识—权力”理论，指陈的事实是，权力与知识相辅相成，为一共生体。当然傅柯的理论可以进一步引申，如果知识话语具备权力性，它就会对其他异质的知识话语起压制作用。李欧塔刻意部署的没有讲台的讲台，是让大家能在干扰较少的情况下作出理性的知识抉择。

身为一位哲学家，李欧塔对“写作”的“时间定义”十分有趣。他认为写作是“瞬间的呈现”，而“瞬间”在时间的夹缝里，它是“已经”和“未来”的悖论性存在。由于“世界永远不停止开始”，写作其实是在重写，作家在过去与未来间往返，即使作家在描绘过去时，他的瞬间呈现已涵摄了若干未来的图景。

李欧塔有一句话颇耐细嚼，他说：“当你对眼前的风景有所感受，你自然就丧失你的方位感。”这透露了他的美学观，场景（历史的或地理的）只有通过不寻常的想像才具意义。

身为一个前卫的知识分子，李欧塔觉察出知识的纯粹性变得愈来愈不可能。“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销售知识，

知识成了商品，知识有人消费，市场自然会大量生产知识。而为了方便知识消费，知识的浓度会被生产者刻意冲淡、稀释。李欧塔的观察不难找到佐证，读者只要走一趟书局，就会发觉爱因斯坦、尼采、佛洛伊德、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的深奥学说都有漫画版，这些掺和了白开水的知识鸡汤是为了推广销售而生产的。

李欧塔很早即意识到科技的力量，电子处理讯息的能力与日俱增，而整个流程和控制，甚至无需仰赖人类的生命条件，无人体的思想是绝对可能的，或许我们可以从机械人的愈来愈灵活，和愈来愈拥有智慧，看到新科技尖端化乃是一条不归路。工艺肯定会影响到艺术创造，艺术创造的非人性成分一直在增加，工艺美学的冷酷，在于它把技术——科学和经济理性的无限可能——都逼逼其间。

就笔者的理解，李欧塔的电视演讲语音与内容的不同频率底安排，似乎在暗示哲学家，或其他把握话语权力的人士走下自筑的讲台，演讲家再也不能高高在上，俯瞰听众，并通过扩音器把知识硬塞到听众的耳朵里。

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里，李欧塔以计算机为代表就当代知识所作的考察，可以说粉碎了当代对知识整体性的幻觉。各种知识都有它的规矩和自己的语汇。他承认：“思想是云，它的边界像Benoit Mandelbrot的断续线条那样是绘测不出来的。思想的表皮与内核可能由同样的材料所组成，但无损它的深度，思想一直不断改变它的位置与向度。”李欧塔显然认知到思想沟通的不易，他的看法与康德（Kant）可谓不谋而合，李欧塔与康德都对理性的能量（Streben）感到怀疑，思想的结合/整合，是十分艰难的工程。

2002年4月14日

安贝托·艾柯的启示

最近读了不少艾柯（Umberto Eco）的著作，对于文学批评的功能，作了一番前所未有的反覆思考。艾柯给我的启示是，往后自己在答应替朋友的书写序前必须三思，能够推辞的最好干脆推掉。一直以来，我把写序视为是一种对文本的批评、诠释甚至寻幽探秘的工作，而我面对的困局是，其实没有哪位作者希望看到批评者真正去“寻幽探秘”，无他，“寻幽探秘”的路上肯定会发现垃圾、破瓶子甚至用了即弃的安全套。

即使我怎样告诫自己：“温任平啊温任平，要小心，文本要读得仔细，不要妄下判断！”我总不免会犯上“诠释不足”（under interpretation）或“过度诠释”（over interpretation）之病。这是个人才学识见不足使然，很无奈的一个事实。而当我设法掌握某学派的理论时，自然就把自己框限在那个学派的“不见与洞见”（blindness and insight）里。如果丢掉学派的包袱，天马行空地去“胡思乱想”，那我会很容易把灯塔看成是勃起的阳具底隐喻，而把稀松平常的烟灰缸当作是女性阴户的“能指”（signifier）。

我不能认同这种文学批评，那是在“玩玄”，开读者的玩笑也在开自己的玩笑。

艾柯提到的“典型读者”（model readers）、“经验读者”（empirical readers）、“理想读者”（ideal readers）、“暗示读者”（implied readers）、“虚拟读者”（virtual readers）、“后设读者”（meta readers）等等，也使我头晕心怯。一个文学批评者首先必须是一名读者，那我应该成为哪种读者，才能有效地“执行”批评的工作？当艾柯在《悠游小说林》（“Six Walks in the Fictional Woods”）一书里说，读者可以作“推理的散步”

时，他的语气隐含调侃，我不认为他赞同这种诠释方式。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语意学教授，艾柯写过《玫瑰的名字》、《傅柯摆》、《昨日之岛》等享有盛誉并广为讨论的小说。《昨日之岛》我还未拜读，前面那两部小说已足够让我这个后辈开了眼界。我感到震惊的不是艾柯用小说形式质疑、甚至颠覆了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历史的发展绝对不是连续性的”理论，而是《玫瑰的名字》、《傅柯摆》提供了几可乱真的假资料、伪证据，小说里大量的历史、宗教、轶闻、掌故都是作者刻意杜撰出来的。艾柯十分博学，从文史哲到神学、历法到自然科学无所不通，这使他要弄的鱼目像足了珍珠，谎言在知识与语言符号的掩护下几乎看不出破绽。如果我面对一位作者，交给我一部充满谎言大话的文本，而由于自己的知识偏于一隅，苦读细品写出来的序，很可能是在牛粪上插鲜花。替谎言写序大概可以称作胡说。胡说并非“胡适在说”而是“胡说八道”。走笔至此，我想到的反而是虚构的正面作用，让我在这儿预告，那将会是我在下一轮与读者谈文说艺的主题。

或许在面对诗的情况下，文学批评会较易进行吧！我以前也这么想，写诗当然也需要材料，但感性的发挥可能更重要，借物起兴，空气、阳光、树木、花草甚至一片落叶、一颗沙粒都是可以藉之起兴的“物”；另一方面，写小说要搜罗的材料通常比写诗多出许多。左拉（Zola）曾对矿山与屠场作过广泛的社会调查，《老残游记》、《廿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刘鹗、吴趼人要掌握丰富的江湖生活体验与中国社会的腐败实例，才能写得出那么出色的谴责小说。诗含蓄深邃，言有尽而意无穷，诗人笔下满纸云烟能臻至上述境地的却寥寥无几；批评家发掘诗的内核质地，倾听诗的弦外之音，何尝容易。

情况比一般人想像更复杂的是，好些诗的赝品，可以故作深刻状，本来无话可说，却故意装出意在言外的款，面对诗，批评家像个宝石鉴定师那样必须先分辨成品的真伪。宝石鉴别有品

系、硬度、色散、比重、折射率可以查核，诗的鉴别却没这些工具上的方便，批评家只能从语言、语义去寻找意义衍长的草蛇灰线。像侦探在查案，案情扑朔迷离，原告与被告若隐若现，情节似相合却相悖，结局往往出人意料，甚至成了一宗无头公案，不少谈禅说偈的诗便是如此。

批评家面对诗的最大困扰，是作者过于信任语言的暗示性与无限性，诗人灵机一触，把一些文字排列在一起，然后用近乎“自动写作”的机制让它“因字生字，因句生句，因意生意”，他们坚信语言的“无限衍义”（unlimited semosis）。批评家可以同意文本的开放性，但却无法苟同语义可以像块粘土可以任意搓捏，不管文学的语言或非文学的语言都有它们的规范。

如果我们承认语言是意义的载体或容器，语言的呈现（包括诗）的意义自然生成与衍长仍然有迹可寻，有它自己的规矩，容器本身提供了容量与方圆，逾此即属“过度诠释”。我经常与诗的作者在这方面发生齟齬，作者告诉我他有表达（或他想要表达）某个意念，我的回应是我在文本里根本看不到他表达的东西，而问题的症结可能是：作者的语言控驭力有未逮。只有绝少的作者勇于承认他们的文字尚欠娴熟，故而表现不出他们要表现的意境，大多数作者会怪我过于严酷苛刻。我活了大半辈子，也做了大半辈子的愚蠢事，时至今日，至少在写序这码子事上头，我无意继续愚蠢下去。读艾柯至少使鲁钝的我聪明了些。

2002年4月28日

虚构与悬置怀疑

拙文〈安贝托·艾柯的启示〉4月28日刊《星洲广场》，我对艾柯的杜撰拟仿颇有微词。对艾柯把纳博可夫（Nabokov）的《Lolita》改写成Nonita，《新猫速写》则用烦琐不堪的细节描绘讽刺法国的“新小说”，尤其是代表人物罗布·格力叶（Alain Robbe Grillet）……等名家作品，我总觉得他的做法有点过分。

如果小说家都是张大春说的“大说谎家”，那么艾柯是在别人的谎言上改头换脸，增添删饰，使祖本衍异产出了另一个摹本来。这样做也不容易，需要学力与创造力兼备，大概也就是因为这项考虑，在我写成〈安贝托·艾柯的启示〉，并传真给报馆的负责人后，我在隔天即慌不迭忙地打电话给编者，多加上两行文字，预告下一篇文章我将续谈虚构这课题。

我们不一定要从西方文学经典去寻找例证，就以武侠小说家的《鹿鼎记》来说吧，世上当然没有韦小宝这混混，这个人一方面是康熙的朋友，一方面又和反清的天地会打交道，左右逢源，虽然有时也遇到困境，都能化险为夷。他爱上多个女子，左拥右抱，享尽人间艳福。韦小宝是个典型的市井之徒，爱吹牛喜撒谎，斗大的字没认识几个，仗着皇帝对他的支持与擅用权术，在朝在野的人都要惧他几分，不得不巴结他。《鹿鼎记》的读者在阅读这部虚构得十分离谱的小说时，必须“悬置怀疑”（suspension of disbelief），跟着人物的活动、情节的进展跑，才能真个投入，为小宝的兴衰安危感到快乐或忧虑。

小说英文叫作fiction，其意思是something invented or imagined（创造或想像出来的东西），即虚构之意，如果我们接受小说，就得接受它的虚构性。意大利的艾柯和台湾的张大春，只是比一般小

说家走得远些，手法更大胆些，我其实没有理由指指点点，旁敲侧击地指陈艾柯的不是。

我忧虑的是，这种拟仿与虚构作为书写策略的被滥用。1980年代初我在一家销路甚广的本地华文日报，读到怡保市是建立在一大块浮沙的报导。原作英文，先发表于国内英文报章，华文媒体在掌握到这项耸人听闻的消息后，马上把它译成中文在显著的版位上予以刊载。我当时人在怡保，读到这份由一组地质学家、考古学者以及环境生态工作者的研究报告，感到十分惊恐，马上把是则报导剪下。那时我已在怡保买了屋子，我当时想到的是，如何在浮沙与陆沉的讯息尚未广泛传播时，迅速卖掉自己这栋房子。我是公务员，屋子是向政府贷款买的，要卖当然可以，只是手续繁琐些，想不到“祸兮福所倚”，由于卖屋手续的延宕，屋子一时卖不出去，而我不久便接获另一项消息，“怡保市奠基于浮沙将逐渐沉陷”，原来是一群高明的恶作剧者开的玩笑。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读了那篇报导居然深信不疑，原因有二：作者是博士、教授，作者的学术资格先解除了我的心理武装，文中引用有关土质、岩石、水源成分的术语底专业水平，使我像读《鹿鼎记》那样悬置了所有疑念。两者都属虚构，前者是谣言的虚构，后者是小说的虚构，谣言的伤害性再也明显不过了，那位资深的华文记者（副采访主任应该是资深了吧），因这起事件而处境尴尬，报馆虽然两次出现主任的空缺，他都卡在副主任的职位上动弹不得，一直服务到退休为止。虚构与拟仿到这个地步具有恶意，可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也是我在谈《玫瑰的名字》、《傅柯探》时，忍不住含蓄地批评了这位年龄比我大十二岁的语意学教授的根由。

我想创作或书写应该有它自己的伦理，正如新闻工作者有其职业伦理一样。一些作者用梦的形式或戴上梦的面纱来处理一些棘手甚至离经叛道的题材，像鲁士迪（Salman Rushdie）的《魔鬼

诗篇》(“The Satanic Verses”)，小说里诡异的人物与情境，都充满了影射与暗示。真实与虚构的疆界许多时候不易分清楚，也不必分清楚，《红楼梦》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有其至理，道德境界模糊（比如说，某事件的发生，从社会规范来看是错了，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却偏偏合情合理），往往是小说的德性与优势。作为一个读者，在貌似假象的事件中看到真挚的一面，是绝对可能的；在真实的细部描述里，读者得到的反而是平面的印象而非深刻的感受，这是大多数批评家都体会过的不快经验。这句话如果无意间批贬了现实主义，或点出了现实主义的症结与局限，我想我不必在这儿表示什么歉意。

2002年5月12日

重构马华文学史

——从《马华文学大系》的出版谈起

马来西亚华文作协编纂的《马华文学大系》，汇辑1965年以来1996年马华作家底各类作品，包括戏剧和中长篇小说。去年年杪已付梓的有大系小说（1965-1980）与大系小说（1981-1996）；迈入2002年，大系散文（1965-1980）及大系散文（1981-1996）先后面世，编辑工作正以加速度进行，相信在今年年杪举办文学节之前，一套十巨册的《马华文学大系》将顺利出齐。

方修的成就与局限

1990年代下半叶，也即是大系筹编的同时，重写马华文学史的议论甚嚣尘上。说起来马华文学史的撰写，数十年来能持之以恒的只有方修先生一人而已。新加坡大学中文系杨松年副教授，1998年在一个由马来西亚留台联总主办的文学研讨会上对笔者说，大学里的研究生与国内外的学者，不管文学爱恶如何，方修写的几部马华文学史论著仍是大家必须参考的。方先生撰史用力之勤，数十年来如一日。方修的局限是意识形态先行，无形中窄化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史家的视野。文学的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一直是方修的标竿尺度。我们很难期望一个文学的现实主义者，能以“同情的批评”底眼光看待现代主义文学，遑论后现代的实验性尝试。在方先生笔下，现代派作品远离群众，孤芳自赏，不仅苍白晦涩，且有故弄玄虚之病。

当代中国文学界要求重写文学史，据刘再复教授的报导“是1988年中国年轻学者共同提出的课题”。在唐小兵编的《再解读》一书的序文里，刘再复清楚地指出：“每一个人对于历史，都有重

写权。……一部文学史，也只是叙述者的一家之见，决不是真的就是历史。”刘先生的意思是，文学史的重写或改写，只要当事人不误以为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这种工作是有意义的。

没有“最后的历史”

历史学者余英时教授与刘再复的见解相近，他在《历史与思想》一书中指出没有“最后的历史”（ultimate history）这回事，余英时说得直截了当：“有人说可以写一部历史，使后来的人没法更改一个字，我想这是文人的夸大说法。……历史永远是变动的，历史时时需要修改，这是史学与时代的关系。”

就马华文学史而论，1965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马新两国的华文文学虽说仍藕断丝连，唯国籍、身份已判然有别。就笔者的臆测，《马华文学大系》以1965年为肇始，可能是为了避开马新两地文学混淆的尴尬。马华文学史如能自1920年写到2000年固然是件善事，唯八十年来史料的收集爬梳，工程巨大无比，撰史者更须注意到马新分家后的马华文学新形势。

文学史的重构是一项“添改行为”（an act of interpolation），添补、改动，并且重新调整个别作家的位置。今日撰写文学史，与往昔杨荫深撰《中国文学发达史》或刘大杰撰《中国文学发展史》，形式与呈现方式已不尽相同。从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李欧梵的《现代性的追求》到王德威教授的《小说中国》，三者都擅扣紧某个时期的主导潮流或趋向：夏志清就中国现代文学的感时忧国多有发挥，李欧梵对五四文学的浪漫与颓废倾向析论甚详，王德威对晚清以迄1930、1940年代留学生文学的衍生演变着墨亦多，使文学史的重要脉络得以凸显。他们三人再加上其他学者如杨照、张大春亦擅以独立的章节析风格特异、表现殊胜的作家作品，如鲁迅、茅盾、沈从文、郁达夫、老舍，或晚近小说家如张发玲、姜贵、白先勇、朱西宁、施淑青、李永平等，以求捕捉住这些

重要作家后面的社会心理背景与时代的“精神实质”（spiritual substance）。

李锦宗与陈鹏翔撰史

近十年来中国方面也有一些学者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潘亚暾、马相武、雷达、古远清、王振科、陈贤茂、杨匡汉、黄万华等都先后参与其事，尤以潘亚暾、陈贤茂、黄万华、王振科论述最丰。可能由于地理的间隔，文学史料的不易寻得，上述教授学者笔下的马华文学（史）与真正的马华文学状况差异颇大，遗漏亦多，一些过度的溢美之辞，连当事人的马华作家都要感到脸红。

就笔者所知，国内的文史家李锦宗，多年来收集马华文学原始资料最是完整，他自首相署的公职退下来后，全力去撰写另一部马华文学史，时间上当较从容。台湾世新大学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亦已申请到研究基金从事这方面的专门撰述。陈鹏翔为马来西亚人，从他赴台深造到在彼邦任教逾三十五载，他经常在国内报章发表新作，以他的学术训练，相信可以摆脱一贯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刻板公式，在文学观察与论见方面有所发现与发明。

2002年5月26日

风格与语言

——覆林颉铄的一封信

在籍博大学生林颉铄近三个月来经常 SMS 给我，谈他于诗的想法，谈他对刊载于《文艺春秋》的诗底印象。他用的代号是 xie，我开始时不知他是何方神圣，心里不免有些困惑，不过每则短讯我都细读，然后 SMS 回去表达我自己的意见。用手机按英文字母凑成句子煞费周章，我们来回的短讯只能三言两语扼要的谈。

后来他问起我的通讯地址，我稍为踌躇便在短讯里写上。我相信对诗真诚的人，不可能是一个会伤害我的人，不久我就收到他的信和附上的三首诗作，正如颉铄自己作的注脚，三首诗“风格各异”。他在信末提出一个问题：“我以为风格迟早会成为诗人的‘监狱’，你认为呢？”他似乎颇为留意陈志鸿、陈强华、刘庆鸿、孙松涛诸家的作品表现。诗的体会见仁见智，颉铄认为强华的诗最难解，我反而觉得强华比其他三人易懂多了。

颉铄的三首诗，确实风格迥异，《你们、你们以及你们》以简驭繁，《祖父，你干吗过番？！》则掉回来以繁驭简。《祖父》一诗与第三首诗《掌上有大厦的人》分别在主题的处理：前者重历史感，文化意识强烈；后者则重都市感，描绘的是荒诞不经的现代情境。三首诗长短不一，但都写得很用心，作者似乎想做到每首诗风格都不一样，因为风格的诞生与思维监狱的形成几乎同时出现。

风格是稳定剂

就风格这一点，我想我有些话说，作者从事文学创作，开始可能毫无风格可言，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看一步走一步”，高中生的作文大抵都在套模式，用一些日常吸纳到的陈腔滥调搪塞敷衍，从“光阴荏苒，一年一度的……”开头，到“让我们更勇敢地面对人生吧！”作结，中间多的是熟口熟脸的词汇、成语、谚语与固定反应下底情节。这个阶段的写作需要某种风格的形塑作为稳定剂。

风格是一种奇妙的综合力，使作家、画家还有其他艺术工作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性情、秉赋的表达方式。风格的塑造，对任何艺术家而言都是必经之路。

不过，有企图心而又肯不断追求突破的艺术家，则会在某种风格的诞生、形成、成熟后感到厌倦，而想另觅其他形式取代之，此所以毕加索有所谓“蓝色时期”、“立体时期”……的戏剧性变化。以台湾的余光中而论，《钟乳石》的刻意西化，《五陵少年》的中国性回归，发展至巅峰乃有一长卷洋溢着古典清芬的《莲的联想》的开花结果。《在冷战的年代》与《敲打乐》是作者在美任教期间受到西方摇滚乐的影响，在文字安排、尤其是文字节奏调频的试验品，改弦易辙的企图强烈。《白玉苦瓜》反映了作者诗艺的圆熟，这之后余氏出版多部诗集，一直到近期的《五行无阻》，诗风变化不大。《白玉苦瓜》的圆满，像一个框架，也即是林颉铄所言的监狱，使余先生似乎难以跨越自设的雷池。

去年年杪与诗人何乃健兄在 Crystal Crown 酒店偶聚，谈起当前诗坛诸家的成绩，我刚提到杨牧，乃健兄便说他担心的是余光中，“余先生似乎在语言、形式方面有重复自己的现象”，听了他的评语，我真想告诉他目前人在美国的骆耀庭在三年前返马期间，他独自来班登英达与我叙面，便曾在谈话里透露他对余先生诗风的渐趋于一感到不安。我们的忧虑不是多余的。

诗：言之寺，寺之言

人的存在就像诗的存在，都是“真实的存有”，用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话，真实的存有是一种抛掷的状态，它是恒动而非静止，其间样态可以千汇万状。在奠立风格后仍需摆

脱既成的风格另觅新姿，诗才值得写下去，具有这种自觉而又有这份能耐的高手寥寥无几。连想像力丰沛、诗思如天马行空的夏宇也摆脱不掉风格的枷锁。夏宇拥有不少“一定信念的读者”（这个名词源自 Jonathan Culler 与艾柯的论辩），但只要这些“一定信念的读者”不为感情所蒙蔽，他们一定看得出来夏宇新近出版的诗集《Salsa》，其慵懒疲惫的语调与把平常事件哲学化的惯技，与十年前的《备忘录》风格几乎谈不上差异。

林毓栋强调语言，语言当然重要。诗是“言之寺”亦是“寺之言”，寺庙是崇敬虔诚的象征，古希腊神谕用的是诗，今日大小神庙的签文与民间的乩文用的是五七言律绝。在西洋与中国的文化传统里，诗都是用来处理重要事务与传达重要讯息（关乎个人命运之休戚）的媒介。“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可以使诗发出“雷庙之音”，创造出另一个价值世界，一个值得我们活下去的世界。我很能认同高大鹏教授的看法：“语言是有历史性和民族性的……好的中文应该兼有白话和文言的优点，並表现出历史文化的‘延续感’和‘积藏感’。”年轻一代的诗人大多注重想像，真高兴能有人像胡桦那样，也注意到语言。中文易学难精，用来写诗，纤则易至于冗，穢则或伤于肥；浓尽必枯，淡者屢深。凡此种种，皆前人之经验语，或可作为吾辈之殷鉴。

2002年6月9日

谢颢式震撼

谁是谢颢？他与理学家程颢、诗人崔颢有什么关系？马华文化界或学术界什么时候多了这一票重要人物而竟不为人所知？

谜底是：谢颢是谢川成的长公子。川成目下在马大语文与应用语言学系任教，儿子谢颢，九岁，念华小三年级。颢儿没参加过什么记忆训练班，却能熟诵《论语》〈学而篇〉十六章，据川成相告，〈学而篇〉长四百九十一字，他自己背诵亦难免疵误，偶有错漏，稚龄的谢颢在旁听了就会老实不客气地出言“指正老爸”。谢颢目前正在背《论语》的〈为政篇〉，已能熟诵前面十章。

我从来不曾见过谢颢，一直到6月8日夜晩，大将书行庆祝成立五周年纪念，我前往出席并亲聆郝明义先生演讲，川成携同妻儿联袂前来，我才第一次见到这个吱吱指数偏高、爱讲故事的小傢伙。

这两、三年来我有时打电话到川成家里，接电话的不是外劳女佣就是谢颢。颢儿华语讲得地道，我的汉语拼音却十分麻麻，有时腔调不正，他就会在电话的另一端指出我的疵病。两、三次下来，我与他在电话里遭遇，即使三言两语亦不敢掉以轻心，免得给这小子捉到宿脚“老猫烧须”。

“醋溜族”迷

这趟会面，会场里没机会说话，散会后川成驾车送我回家，一路上车厢里尽是谢颢的讲话声和笑声。原来这小精灵最喜讲故事，发表意见，提出问题，最enjoy别人听他滔滔不绝扯个没完没了。从《老夫子》、《娃娃看天下》甚至朱德庸的《醋溜族》和其他漫画、影片吸收养分，衍变出来的情节令我这个“师公”耳目为之一新。他一口气念了三个句子：

- “男人不短命，女人不短命，情人最短命。”
- “女人是水，男人是泥，碰在一起，成了泥浆。”
- “男人结婚靠的是勇气，女人结婚靠的是运气。”

这些类似定律的话语，是《酷溜族》漫画里的男女关系写照，怎么这小儿竟然能倒背如流？我马上从书包拿出记事簿来在黝暗的车厢里潦草地记下，方便日后据以分析研究。

6月9日晚间难得有个时间空档，笔者独自在家里观赏 Russell Crowe、Ed. Harris和Jennifer Connelly主演的《A Beautiful Mind》，电影的情节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约翰·纳许（John F. Nash Jr.）教授任教于聚美国一流菁英的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纳许的学术起步虽然面对挫折，但后来于数学理论方面却有重大突破，使他广受注目，正值他的事业攀上巅峰之际，他却患上了精神分裂的妄想症（Schizophrenia），妄想造成的假象经常干扰他。

就我的观察，谢颖的脑子里充满了奇思与幻想（whims and fantasies），这可从他喜谈故事，虚构情节看出若干端倪，他爱说故事的偏执使他的不少同学都不得不躲避他。他又十分好奇好问，看部电影也可以提出几十个问题，像“为什么要这样拍？”，“为什么他的表情是这样的？”……没完没了，川成的太太毛小燕在车里吁着大气和我说，她打算在近期恶补电影知识与理论，以应付这家伙排山倒海似的质询和疑问。

神童式教育具伤害性

约翰·纳许由于精神分裂，妄想不断而不得不离职，幸亏他得到太太（也是他的学生）的精神支援，终于克服病魔，返回大学教书。1994年纳许教授荣获诺贝尔数学奖，实至名归。谢颖如要在事业上有成，一定要把超强的记忆力作为他内在的资源，把喜欢虚构情节，擅以说故事的性向转化成学术研究、艺术创造或演讲发表的能力。谢颖喜想像，怀海德（Whitehead）不是说过“以

想像力取得知识”（the imaginativ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正是大学的理念吗？科学家、发明家都需要想像力，否则纵使无数苹果掉在头上都不可能发现地心引力。Robert Fulghum在他的一部非常有趣的书《All I Really Need to Know I Learned in Kindergarten》里有一段话最引人深思：

“I believe that imagination is stronger than knowledge. That myth is more potent than history. That dreams are more powerful than facts.”（“我认为想像力比知识更有力量，神话比历史更具说服力，梦想比事实更强大。”）

据川成相告，谢颖性向似不近音乐，绘画能力中中，很难成为另一个张学友或马荣成，以他的能言善道，不难成为成功的广播员或D.J.，像蒙润荣、方若琪或口水比较多的陈峰。如果他从事小说创作，滑稽突梯可以像王楨和、情节丰富直追黄春明、虚实难辨与张大春不遑多让，如果谢颖从事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的创作，亦不失为抒发自己的奇诡想像底管道，把兴趣/嗜好变成个人的终身事业，正如喜欢拍照的人开摄影社，喜欢养鱼的人开水族馆一样。

川成当然读过《伤仲永》那篇古文，小时了了，如果缺乏适当的培训指导，那是人才的浪费；操之过急，孩子面对太大的精神压力，难保纳许妄想症不会发生。关键在于如何因材施教，另一关键在于如何与学校的老师互相配合，扶植这株有潜质长成大树幼苗。最危险的教导方式是“神童式处理”。

写成谢颖式震撼，我决定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华语。惭愧得很，当了廿八年的中四、中五的华文老师，我的华语大抵已撇开方言的干扰，但是在翘舌音、切齿音方面却拿捏得不够准确，不知如何是好，目前我正抽暇一边观赏、一边学习中国制作的历史连续剧里头演员的华语腔调，老天，舌头都全打结了！

2002年6月23日

媒体与权力运作

哈柏玛斯（Jurgen Habermas）提出的公共空间概念，源自十七、八世纪初在巴黎与伦敦等欧洲大都会的咖啡茶座议政或沙龙式聚谈。印刷技术使报章广为流通，使公共空间可通过文字与言论，理性的去探讨一些议题，并形成一种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舆论并非法庭判决，但其力量——尤其是它的渗透力——往往比法律判决“更得人心”。

基于此项不辩自明的理由，不同的利益/压力集团都企图控制、至少是影响报章的舆论趋向。现代政治的权力运作不是“马上得天下”的武力侵占，而是当前稳定社会模式的维持，通过媒体、教育与价值体系的潜移默化，使群众于不知不觉间接受现实。

阿图塞（Louis Althusser）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就上述之权力运作论之甚详。现代权谋仰仗的不是“铁腕”而是“丝绒手套”，权力主体欢迎个体的加入，主体提供许多选择目标，个体也觉得自己相当自由，究其实，个体可作的选择寥寥可数，而且都是早已被规划和鉴定下来的目标。

教育的掌控先从教材的汇编着手，宣扬效忠意识，强调社会规范，并且在人文、历史这些科目的内容与主题方面调整润饰，以配合国家的方针与需要。日本篡改侵华史，绝非日本教育部的偶然失误，而是刻意的“改头换脸”。吉隆坡开埠功臣叶亚来的地位在每一次的历史教材改写中每况愈下，亦非国内专家学者的疏忽。

近大半年来，马华公会A队与B队的竞争激烈，允许笔者大胆揣测，两队都想借助公共媒体，包括报章与电视，以影响受众对事情的理解与判断。由于两队势力差距不大，夹在中间的华文媒体！

好选择最安全的做法：“平衡处理”，两支队伍所发出的文告消息都发，唯用词激烈、涉及人身攻击的言论则删去或删饰。

报章言论版或电视新闻成为政党的角力场，对媒体编辑与作者都是十分苦恼的事。我的一篇根本没有表态支持A队或B队的专栏文章，在印刷的前一刻被抽掉。笔者在电话里与编者据理力争，不得要领，仅从这起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大家即不难想像，在内部和外部力量同时运作的媒体，编辑和作者处境都同样尴尬。

本来报章正如其他媒体，其基本功能是客观地呈现、报导、提供讯息，唯媒体掌控者可以夸大某些事象，也可以对某些不寻常的现象视而不见。1990年初美国攻打伊拉克，媒体一面倒地报导沙旦·胡先是暴虐不仁，把他“撒旦化”，给受众的讯息是攻击伊拉克甚至铲除沙旦，胡先是“替天行道”，道德与政治两皆正确。

另一方面，美军在攻进伊拉克后，命令大批投降的战俘，自己掘洞，然后跳进洞里被活埋的事实却被封锁，连以报导翔实中肯见称的CNN也没播映以推泥机活埋俘虏的残酷映象。当媒体主控人全面掌握资讯运用权时，他便可以选择他认为政治正确的资料与图象，让它们“出街”，符号暴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便产生了。

哈柏玛斯提出“舆论管理技术”，媒体可以把政治事件非政治化，亦可以把非政治事件政治化，它可以美化，也可以醜化人物与事象，煽动公众的激情甚至怨愤，亦可挑起受众的同情与支持。对异邦异族的误解、猜忌，很多时候，都是媒体有意无意间酿致的。

壬午农历新年期间，马来西亚电视台上映的“大家都系自己人，唔使做戏”那几出短剧，只要不目盲心盲，每个人都感觉得出来里头蕴蓄的强烈负面判断。华人要面子、爱充阔、言不由衷、趋炎附势的主题与情节，配以粤语残片的桥段，凸显了华族文化的陈旧与落伍，这几出丑化某族群的广告片居然能播映，而且选在农历新年期间出街，在官方强调种族和谐、国民团结的背景前尤其令人

感到突兀。

看这样的短剧，更令我怀念一年前在马来西亚电视台播映的黑白广告短剧。剧情的背景是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华人家庭获讯之后惊惶不已，邻居的马来同胞却毅然挺身庇护，让他们住在自己家里，这里头没有肤色歧见，只有友情的善意流露，人物的眼神既关切又温馨，记得那是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拍摄片子。

媒体似水，至少它是流质的载体，它处处印证了“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它能使社群互相猜疑妒忌，也能促进彼此的了解与互助。

2002年7月7日

王安忆“四个不要”的商榷

《星洲日报》主办两年一度的花踪文学奖，于2001年晋入第六届之际，增设世界华文文学奖，首届得主为目下在美国专事写作的中国小说家王安忆。

王安忆崛起于1980年代初，于小说创作方面屡有突破，勇于尝试新形式，细腻深刻，是少壮一代中国作家的佼佼者。笔者与王安忆曾在两个场合碰面，最近一次是1999年第五届花踪促成的文学因缘：王安忆担任小说组的终审委员，笔者负责诗作品的终审。由于彼此负责甄选的文类组别不同，见面寒暄却从不在终审会议上交换过意见。

1999年王安忆莅临马来西亚，在机场面对来访的记者，重申她的“文学的四个不要”。这“四个不要”如下：

- 一、不要特殊环境人物；
- 二、不要材料太多；
- 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
- 四、不要独特性。

王安忆的“四个不要”，可以说是她从事小说创作多年来的心得，也是她的书写策略。以她今日的文学成就与地位，再加上刚刚夺下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的飙升效应，她的“四个不要”乃成了写小说的窍诀，不仅马来西亚新生代作家可能奉为圭臬，即使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都不得不郑重考量，自己的小说书写其成败是否应合了、或违背了这“四个不要”。

除了第二项“不要材料太多”，不太可能引起争议外，其他三个不要或有商榷、讨论之余地。小说人物固然不必像《金光大道》的高大全那样，完全典型化，成了“特立独行的人”（the

eccentric) 或“公式化人物”(the stereotypical), 唯任何人的思想、行为相当程度受制于其出身、文化与教育熏陶, 也就是潜而不露的阶级意识, 那是大家可以认知的真实。小说创作虽不一定要处理特殊环境底下的人物, 不刻意强调其特殊, 但人物自身的历史、教养与所属阶级, 都使他/她与其他人有异, 这就构成了人物与情境的“特殊性”或“独特性”, 因此第四项“不要独特性”似乎也是可以被质疑的。

假设小说处理的是文革经验, 人物是当年飞扬跋扈的红卫兵, 文革斗争是一场漫长与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无论是揪斗他人或被他人揪斗——构成了小说人物的独特性与环境的特殊性。这种经验在其他华人地区从来不曾发生过。文革造成中国的学校, 从幼稚园到大学的研究所足足关闭了六年, 中国人口那时有九亿, 在那六年内应该受教育的孩童, 都成了文盲, 这么残酷的事实是海外华人无法想像, 甚至难以置信的。这正是人物所处身的环境独特和特殊之所在。不管要不要, 文学的特殊性与独特性是撇不开的。

又以我国为例, 马来西亚有四百五十多个新村, 居民与经常到访新村的亲戚人口约两百万, 占全国华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但马来西亚新村与中国乡村不同, 前者是英殖民时期用来隔离、截断马共的支援管道与粮食供应的“战略性社区划分”。如果马华小说家要以华人新村人物为背景题材, 就不能不了解当年用铁丝网围筑起来底村落的政治、社会背景, 这构成小说情节演变的特殊场域, 与小说人物性格行为的独特性。附笔一提的是, 马来西亚华人新村并不“新”, 它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 目前这四百五十多个新村设备陈旧简陋, 只有1%的新村华人子弟能脱贫、脱困跻上大学。

至于王安忆提出的“不要语言的风格化”, 每位作家的文笔都有其特色, 遣词用字、行文布局都有自己的偏嗜, 这就构成作者自身的语言风格。李永平喜用僻字, 王文兴另铸新词, 张爱玲的修辞俏皮张致, 精警泼辣, 但调门却世故沧桑。黄子平副教授尝谓莫言

用的是一贯的披头散发文体, “披头散发”这个意象正可点出莫言想像奇诡, 汪洋恣肆的语言风格。大家目前热衷讨论的高行健式语言流, 与明末袁氏兄弟的“信口信腕, 皆成法度”或有相似处, 都是语言叙事风格的体现。

王德威教授称赞王安忆“文笔酣畅绵密”, “酣畅绵密”正是后者语言风格的殊胜处。笔者推测王安忆提出的“不要语言风格化”, 反对的是语言风格的定型化、珊瑚化。王的近作《纪实与虚构》夹议夹叙, 枝蔓横生, 一反作者一贯的酣畅绵密。作家容易被自己宠爱底语言行为所操纵, 唯艺术才情往往需要新的文字组合才能蒸馏和昇华。希望自己没有误读王氏的“四个不要”。

2002年7月21日

政治与文化的幻觉与逆幻觉

(一)

在我的阅读书单里，政治类大概是最寒酸的了。说来惭愧，卡尔·马克思的扛鼎之作《资本论》，我也只是翻翻便丢在一旁。《第三路线》在左右两派之间寻到另一条政治理论底活泉，使我大开眼界，怎么说都好，我对文学、美学、文化、历史、哲学的兴趣，任何一科都大于我对政治探讨的热忱。

精神分析学有所谓“幻觉”(hallucination)的症候，病人看到他人看不到的颜色、人物与景象，佛洛伊德的理论走得很远，他发觉另一种病人患的是“逆幻觉”(reverse hallucination)，也即是没看到存在的当前景象，简单地说，“视而不见”即是“逆幻觉”。我觉得当前的马来西亚政治是两种怪病都同时患上了，应合了古语所云：“祸不单行”。正如病人不知道自己中了招一样，华人政治人物不是把民族前景描绘得既天真(naive)又乐观，便是把当前存在的问题、困扰撇在一边，视若无睹。任何社群如果同时患上政治的幻觉与逆幻觉，病情就不可谓不沉重了。

2020宏愿的实践是十八年后的事，国内的华裔政治家对它的內容了解了多少？马来西亚被称为是个回教国，这说法于国家宪法有无裨格？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审慎去思考、探索的课题。如果西方人的幻觉是马来西亚乃一回教国，我们就索性宣称自己是回教国，逻辑上说得通吗？如果回教国的提出是用来化解回教党的政治压力，是一种权宜之计，历史告诉我们许多后来无法改变的政治现实往往是当年参与者权宜来权宜去，扭曲了现状的后果。

英语教育的重新被强调，数理用英语教学对华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华社反对的声浪颇大，而就我观察到的是，多数华团都以其

他主导单位马首是瞻，似乎没有什么自己的主见，也没作过深入的研究，我们可否召开一个研讨会由各行业的代表（当然包括教育界的精英）共同磋商研析吗？华基政党很早即表明会尊重华社的意见，这说法空泛得很，说了等于没说。我甚至要进一步申论，“华社”一词也一样空泛，谁或者哪个华团单位代表了“华社”？这都是幻觉与逆幻觉并发才产生的“创造性模糊”(creative ambiguity)。7月底马华公会的中央代表大会落幕后，也许情况会明朗些。

(二)

政治问题不多谈，因为懂得太少，说多错多，徒然贻笑大方。且让我们看看当前的华人文化，它有感染上幻觉和逆幻觉的疾患吗？

把具有历史意义与特征的社区改头换脸，包装成旅游景点，进行规划的人有些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是在保护文化古迹，实际上商业考量压倒一切，我们看到的是搽脂抹粉的文化历史复制。幻觉与逆幻觉至此真是难以划出界域。看看今日马六甲的鸡场街，商业化必然带来的庸俗化与恶俗化，令人盘桓期间，触目心惊同时也黯然神伤。在马六甲、怡保和檳城，留下的大多是记忆遗迹(memory trace)，马六甲、檳城和新山的古迹或历史遗迹，可能因为人工雕琢过甚或不当，予我的印象是“几乎是又不完全是”(almost the same but not quite)。

近四、五年来大将书行以一个书局的着力点，企图营造、撑起整条文化街，这有点像亚基米德所说的“给我一个杠杆点，我可以撑起整个地球。”大将诸子的圆梦企图，曾经是城中的热门话题，尤其是星期日在大将书行走廊及邻近街道的各类演出，从舞剧、华乐演奏到儿童合唱，在红尘十丈的吉隆坡真有点不可思议，甚至称得上化腐朽为神奇。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文字工作者，都

写过不少打气的文章，为傅兴汉、傅承得、林福南等人的努力喝彩。六个星期前在大将成立五周年庆典上，见到两傅，觉得他们眉宇间隐约有忧色（是自己神经过敏吗？），文化街的意念创始不易，推动经年也看到若干效应，唯后续能量似乎不足，基本上读书人口在数量与素质方面均难言改善与提升。我能做些什么呢？除了走进书行购下两三部书籍外，我什么都不能做。前尘如梦，就文化街的梦底打造作些反思，我觉得**大将诸君子这些年是在试验文化建构的可能性，文化社区的可塑性，以及文化动能在特殊的环境与条件下怎样调适，怎样拓展出一条路来。**

这就带出了前面提到的幻觉和逆幻觉的问题。大多数的华团单位或华社成员对大将的“文化探险”（cultural adventure）大多视而不见，大将哪里有麻将那么重要！“演艺联盟”的筹组到成立，可以视为是文化建构的另一种塑造。每次听小曼在电话里与我喃喃地谈他和林福南的“文化起义”，总觉得他像吃了迷幻药在诉说他的文化幻想，而我始终是个清醒而笃定的人。在吉隆坡这些年，我真的有点像当年在伦敦的卡尔·马克思，绝少与人交往，不参与各种所谓有声有色当然也是有意义的活动，我读书、思考、写作，房子乱得像狗窝，与马克思不遑多让。我和马克思不同之处在于他比我勤学和有学问得多，而且他还比我多出一大把与恩格斯几乎一模一样的浓密胡子。何国忠怕听陈徽崇的痛创鼓声，我不怕，我怕的是幻觉过后的心灵创痛。

我这种清醒笃定的姿态是逆幻觉吗？我想不是的，我只是较理性地审度着吾人身处的环境。**文化动力的衰弱或后劲难以为继，与族群的教育、政治境遇离不开关系。政教处境没有显著底改善，奢言突破，恐怕只是个大幻觉。高贵的幻觉仍是幻觉，正如七彩缤纷的泡沫始终是容易破灭的泡沫。当然如果我连剧团成立和开始演出的首都剧场也视若无睹，那是自己也患上逆幻觉了。**

我们有一群文化和艺术工作者，包括我认识的戴小华、陈亚才、姚新光、陈连和、马金泉、杨善勇等，和我不认识的云里风、吴木炎、孙春美、缪长青、陈耀威，他们认定文化是可以筹划，可以储存，可以设计，并且可以付诸实验与实践的，从精神分析学看他们，上述诸子均属于带点“病态”的“精神过度集中者”（over-cathexis）。《当代马华文存》的出版，《马华文学大系》的印行，是宝贵的族群文化储备，编纂这两套大书谈何容易，何况它们分分钟还得面对像温任平这种既不做事又喜挑剔的人在找岔子。他们其实可选择轻松（they can choose something light），唯戴小华、云里风、傅兴汉、傅承得、陈再藩诸人选择的却是沉重，因为沉重才有重量，文化记忆因有重量才不致被时间之流冲走，历史不致漂浮而有所附着。

精神过度集中的症候是当事人会锁定目标、锲而不舍，用各种策略与途径去克服先天条件的围限，作出超越。这些人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与理论，用自己的语言与声音，用肢体的节奏与意象，用源自赤子之心的关切与激情，去召唤主体，如阿图塞（Louis Althusser）所说的那样，使其因回应而存在。他们对赝品（kitsch）保持高度的警惕，从文物古迹的保护，到舞蹈的造型内涵，他们都希望做到本尊得以“再现”（re-presented）。这群精神过度集中的“病患者”，关心的是怎样完成目标，如何把点连成线，在他们脑海里可能完全没想到幻觉和逆幻觉，这个有点象牙塔倾向的精神病理学课题。

2002年8月4日

知识分子下海

——兼谈平路著《何日君再来》

(一)

1997年亚洲经济风暴来袭，马来西亚作为亚洲国家之一，自无法躲开这轮冲击。许多上班族因公司倒闭而失业，一些雇员在公司安排某种方式的赔偿下“自愿”辞职，企业界裁员瘦身之风愈演愈烈。2002年的今天，虽说经济前景稍露曙光，唯仍有不少在职者，薪酬偏低，与他们的资格履历并不相称，这现象不叫un-employment而是under-employment。不少华裔家庭主妇，为了帮补家用之不足，毅然当起形形色色的小贩，其间又以买卖粉面的小本饮食业者居众。每逢书展，有关烹饪的书刊总有不少人购买，或可为上述现象作注脚。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现象泛称为“家庭主妇下海”。

说来家庭主妇走出厨房，到街肆咖啡店开档炒粉，卖鱼丸粉、猪肉粉、虾面、云吞面，也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她们购入港台出版的烹饪刊物作为参考，提升自己的厨艺，作好就业准备，学习精神可嘉。当然作为消费者的大众，经常会碰上不少半路出家的经济粉面业者，煮炒出来的食物令人难以下咽。市场有它的供求机制，烹调工夫欠佳的业者自动被淘汰，要“下海”从事饮食业，也不容易，要靠真功夫才能在市场扎稳马步。

(二)

知识分子/文化人可能比家庭主妇更早就下海了。笔者大概算是半个知识分子或文化人，要申论演绎这现象，下笔撰文，颇感踌躇，真恐在谈别人之际，无意间暴露了自己的肚脐，弄个不好有心人会误读成在搞另类宣传。

还是谈谈中国的情况吧。名画家吴冠中说：“有审美价值的作品迟早要成为商品，作品能在作者有生之年成为商品是一种幸运。”中国第四代最具代表性的名导演谢晋愉快地说：“我现在有能力支付明星的高酬金了。”马来西亚电影观众较熟悉的张贤亮说得更坦率：

“我不下海，终身遗憾。”

中国知识分子不管他是大学教授也好，作家也好，电影编剧、导演也好，他们当前面对的不再是1960、1970年代的意识危机、阶级危机或话语危机，而是与柴米油盐酱醋茶紧扣的生存危机。换言之“衣食足而后言荣辱”是个不愉快，而又不得不面对的“硬现实”(stark reality)。

知识分子扮演什么角色？何怀硕说：“知识分子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心态”，知识分子并非作家、新闻从业员、大学生或大学讲师的代号或泛称。尊贵如医生(从牙科到妇科)，劳碌如司机(从驾驶货车到德士)，都可以(或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用余英时的话：“在多元社会里，谁都可以是知识分子，谁也都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关注社会问题与公共事务，并且有勇气提出批判，而就我的理解，最令知识分子心力交瘁的往往是知识传播与思想启蒙的使命感，后者甚且比前者更重要，少了思想的启蒙，价值中性的知识纵使对人类社会无害，也没多少道德意义。

问题是观念的传递，容易曲高和寡，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高档的学术思想论著，究竟有多少人看得懂？书籍或其他文化/艺术作品一味精英化、小众化而导致市场需求的干涸化，又怎样能带引一般读者提升他们的知识水平？作家、艺术家怎样在雅与俗之间找出路，正是横在出版商、制作人与读者观众的一条拔河用的绳子。文化菁英自囿在象牙塔的孤高里，“一览众山小”，在廿一世纪可能会失去受众。我可能是愈老愈糊涂了，近日来我把愈来愈多的时间用在考量生产机制无法避开的趣味提供，艺术作品又

怎样同时实验它们的高蹈形式，也就是“叫好又叫座”的可能性。

(三)

笔者在本栏写过一些文章，针对1990年代中台一些影片里刻意营造的中国情调与氛围，以满足西方观众的东方想像与窥秘欲望，一年后的今天，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张艺谋、陈凯歌和李安电影里某些番意取悦或迎合西方观众的片断（罗小虎的造型像不像西部的牛仔？），这些导演希望他们的作品除了世界各地的华人能够观赏外，更希望打进国际市场，连老外也能接受、欣赏，这其间便出现艺术与商业的冲突与考量（较量？）。陈凯歌、张艺谋、李安均力图在艺术表现、商业利益之间寻找某个折衷点。他们想做到的是，作品要有卖点、好看，并且兼具艺术价值，《红高粱》、《菊豆》、《霸王别姬》、《饮食男女》、《卧虎藏龙》都是在艺术处理方面非同凡响而又好看有卖点的影片。

台湾小说家平路最近出版了一部《何日君再来——大明星之死？》，不仅在书肆热卖，而且这本书还迅速成了两岸三地的热门话题。《何日君再来》的“君”明显影射1995年猝然逝世的歌星邓丽君。平路的小说向以想像力丰富奇诡，擅长虚构见称。1983年她自美国寄回来同时参加联合报小说奖和时报小说奖的少作《玉米田之死》，两大报的文学奖评审委员均不约而同给了它首奖（见詹宏志著《阅读的反叛》，页106），平路不走都市言情那种软绵绵的创作路线，詹宏志这样记述她：

“第二年，她的《大西洋城》也得奖……她来到我经营的一家小咖啡店；她显出对台湾社会急切的关心，她向我打听作家陈映真等人的动向及其意义，也问我很多台湾会怎样的大问题（大部分是我不能回答的）。”

据近期《亚洲周刊》（第16卷31期）的报导：“平路辞人在美国薪资优厚的数理统计工作，1993年返台，她说：‘在美国，

我关心社会的热情和能参与的程度不成比例，因此我选择回台湾……’”

引用上述资料，是为了佐证平路的艺术造詣与她对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的关心，平路是位严肃作家、是位知识分子殆无异议。就《何日君再来》一书而论，故事内容由台湾的情治人员调查大明星的真正死因，从国安局的文档，到当事人的日记，国共两边的统战交锋，各种媒体传闻，大明星的特务角色……把邓丽君因哮喘发作不及救治这个死亡证书的“事实”改写成一出扑朔迷离的谍海恩怨录，纪实的成分是陪衬，拼贴与虚构才是卖点，悬疑与追索的过程使这部小说相当好看。

平路在接受访问时坦然承认这部小说并非写实，用她的话：“……写实就失掉小说的趣味性了。”当作家注重作品的趣味性，让它好看时，在作家的潜意识里，商业考量显然在发酵扩散。今日平路已非昔年写《玉米田之死》的平路，《何日君再来》的卖点在它所引起的连串疑问：“女主角真的是邓丽君吗？她是国民党的特务？她的死是敌对间谍下的毒手吗？”邓家成员表示“不愿与平路起舞，正规划邓丽君的传记。”更造成宣传的互动，文化界一片闹哄哄的，支持或反对平路创作手法的声音都有，众声喧哗恰恰又替平路的新著间接造势。

1980年代初平路写的第一篇小说《十二月八日枪响时》，詹宏志阅稿后觉得平路是“很有意思的小说生手”，除了题材的特殊性，詹敏锐地指出：“她还没有感觉到读者的存在”（页105）。《何日君再来》的平路不仅感觉到读者的存在，而且巧妙地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窥秘欲与媒体的特性，让这部新著在莽莽书林中脱颖而出，就这个意义而言，平路是“作家下海”的一个成功例子。

是的，“下海”也要靠实力，要讲真功夫。平路的《何日君再来》解构官方神话，调侃国共统战，暴露人性的弱点与黑暗面，字

里行同每多隐性批判。我在想，如果庸手处理甫自杀身亡的陈宝莲，把她的恋情加以渲染，加上撞邪以致举止反常等怪谈，再穿插她和多位公子哥儿、富商及黑帮大佬的暧昧关系，这些材料拼凑成书，大概也可卖个满堂红，甚至轰动一时吧。走笔至此，我不期然地想起十年著一书的王文兴，在大伙都在赶潮儿的今天，惜墨如金、字雕句琢如《家变》的作者，人数是愈来愈少啦。

2002年8月18日

夏志清·李欧梵·刘再复

——三种批评模式

中国批评家刘康指出三位学者的三种批评模式，笔者是拜读了张隆溪教授的大文《走出文化的封闭圈》才留意到的。刘康认为夏志清的评论用的是形式主义模式，李欧梵用的是历史主义模式，刘再复用的是人道主义模式。刘先生的看法是，政治存在于一切文学的文化表现当中，政治贯穿文学，自然文学批评也无法避免政治的渗透，对理论有兴趣也就是对政治有兴趣，这是刘康的主要观点。

用“形式主义模式”概括夏志清教授的文学批评，我想是不太恰当的，“形式主义”似乎隐含贬意。夏志清六、七十年代以迄八十年代上半叶于美国、港台享有盛誉，乃是由于他超越了当时盛行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那种局部字质、意象结构的分析，留意到文本与人生、社会环境、政治生态的关系，这方面屈林(Leonard Trilling)与李维斯(F. R. Leavis)的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对他的文学史观底影响既深且巨。由于他的中西文学的学术背景，他于文本的研析往往能用较大的社会时代的视角去审视评估。读夏志清的文章一方面可以觉出他的学养深植，慧眼独具，在他的经典之作《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头，姜贵、张爱玲这些被当时文坛忽略了的小说名家，都被夏志清发掘出来深入的剖析评价。如果没有夏氏那部小说史特辟章节，凸出张爱玲的成就，后者还可能金剑沉埋较长的时期，何年何月文物才会出土尚是个未知数；至于姜贵，如果没有夏志清的肯定，他的小说《旋风》、《重阳》大概会被一般批评家归类为平凡无奇的反共文学。

李欧梵与夏志清都熟读鲁迅并讨论过这位一代文豪的文学成就。就单一作家而论，李欧梵教授是鲁迅专家，他花在鲁迅研究的

时间与精力比夏志清多，李氏一方面肯定鲁迅在五四阶段作为主体话语的地位与气魄，另一方面也注意到鲁迅作为一个作家在他笔下所暴露出来的五四现代性的负面，在李欧梵著《追求现代性》一书与其他的一些议论或访问的场合上，李对鲁迅的观察既深刻且新颖，他的历史训练使他在看文学时多了一副眼镜。

夏志清大概不怎样读得下去拉岗、德里达、傅柯、詹明信等人的后现代与解构主义理论，李欧梵对这些新学说、新思潮亦不免有心理抗拒，但他却强迫自己啃下这些理论，经过反刍、消化，得到的学术营养不少，也扩大了他的批评视野和批评策略的灵栖度。史怀兹（Schwartz）是李的恩师，对他做学问的态度影响很大，史怀兹以博学通识著称，对中国历史、哲学思想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解，能言人之未能言。李欧梵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五四一直追溯到晚清一代、晚明的情色和欲望之作，以及这个过程来自外国的间接与直接冲击、衍异，使想当然尔的“现代性”（所谓 *modernity*）具备耐人咀嚼寻思的历史纵深度。

詹明信分析老舍的《骆驼祥子》，指出小说故事架构是“两种不同叙述范型的叠合”，是资本和市场智慧的冲突，用的是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篇论文对李欧梵而言犹似熊十力对徐复观的棒喝，李欧梵读后的反应是“出了一身冷汗”，他想到的问题“不是詹明信说得有道理，而是为什么他这个跟中国现代文学完全没有关系的人——他恐怕一辈子第一本看的就是《骆驼祥子》——为什么他提出来的一个想法我就没想到？”李氏的学术警觉性高，使他能不执一端，而能广纳各家各说综合成为自己的判断，近年来他的评论“蛋头”的味道少了，反而使文章更灵活有趣。

刘再复教授是一位十分谦逊的文学评论家，他的文革经验与六四冲击，使他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有一种超乎一般批评家的同情与洞识，他的笔锋常带感情，唯思路却缜密理性，擅于宏观式综览全局，他也是鲁迅专家，他的成名著作《性格组合论》、

以及他在不同篇章里对于文学主体、本质与发展的反覆辩证，使他成为一个勤于反思的文学思想家。他的论著里可能没有多少玩玄的批评策略，也没多少当代流行的批评术语与词汇，却对人的观察与了解至深，《人论二十五种》正是这么一部人物的百态图。

刘再复对拉岗、德里达、傅柯、罗兰巴特等人把语言推到极端的现象颇有微词，他似乎介于夏志清与李欧梵之间，刘研读过维根斯坦（Wittgenstein）、拉岗等人的学说，甚至还前去芝加哥大学亲聆德里达演讲，他承认他们很聪明，但就是不能认同他们这群人对语言的玩法，并质疑这种语言游戏意义。刘再复与李泽厚合著的《告别革命》一书里，对这些西方的前卫理论家作了一些批判，刘再复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如果照搬拉岗、德里达这套语言哲学，还会落入很深的陷阱。”李泽厚的看法是：“我相信德里达等人的解构主义已走到尽头，下一个世纪（廿一世纪），这一套很难再愚弄人了。”

即使没有《告别革命》的表态，以刘再复的秉赋性情，鲁迅对他底人格成长的影响，五四文学这个“文本总体”（*corpus*）对他的潜移默化，他都不可能崇尚消解、诡仿、嬉戏，对一切都质疑，对已有的都颠覆的美学或哲学有什么好感，他和夏志清不同的是，夏先生根本不去管这些所谓新潮的玩意，刘先生是接触了、认识了，而觉出它的虚无与贫乏。李欧梵则汲取到一些有用的养分，对另类的文学表现也能“另眼相看”。相较之下，刘再复认为“文学是人学的深化”，注重文学的人性深度，下笔为文，他对人物、事象与构成这些人物活动的时代背景都流露关切、悲悯之情，刘康以人道主义批评家称之，刘再复可谓当之无愧。而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自己可以从三位文学理论家不同风格的比较与权衡，找到个人的批评出路；当下的我被各种艰深的真伤学说所纠缠，日子实在不好过。

2002年9月1日

一个他者看《悲情城市》

(一)

我不懂闽南语，完全不会讲，只会听几个常用的片语，因此观赏侯孝贤导演、詹宏志策划的《悲情城市》倍觉吃力，我必须仰赖中文字幕说明，去揣测人物要表达的意思。《悲情城市》拍摄于1989年，并为台湾夺得第一座国际影展的首奖（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在台湾学术、文化圈广为识者与不识者议论，而笔者却迟至2002年9月才购下录影光碟看这部影片，我对它的心理抗拒，不言可喻。

《悲情城市》语言驳杂，台语、日语、粤语、较纯正的华语以及不同外省腔的华语穿插其间，不过主要语言仍是台语，即闽南话。身为一个不懂闽南语的观众/听众，套用一句时下流行的批评术语，我是如假包换的“他者”。电影的内容围绕着发生于1947年的台湾二二八历史事件，与我这个马来西亚人也遥远得不像真实（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我人在彭亨州淡马鲁教书，吉隆坡动乱的第二天，我与十多名学校同事挤进一间四房一厅的排屋互相照应的经验，却迄今难忘），在“隔岸观火”的位置，看一场焚烧于五十年前台湾的政治大火和它造成的阴霾，我的身份可谓“两重的他者”。

不谙台语所造成的“隔”，与我的马来西亚国籍，使我比台湾本土的知识人多了点客观距离；我不可能被电影的主题先行感染，除非剧情以及人物底演技令我由衷感动，在我拜读到的数十篇文章里，我发觉当中有不少台湾文化知识菁英，基于他们对二二八事件的悲悯和关切，有“过度阅读”（over-read）《悲情城市》的现象。统独问题——也即是国家认同的持续争议，也让统独两边的支持者几乎用“自由心证”的方式去解读《悲情城市》的意涵与影射。

(二)

如实地说，《悲情城市》拍得十分零碎，剪接不算好，情节很多时候都接不上，得靠观众用自己的想像去填补空白。在二二八事变发生前省籍冲突、帮派械斗，都交待得不清不楚，再加上许多情节都在黯淡、昏濛的森林或屋内一角进行，身为一个起码的观众，我得费力去猜谁被谁用麻布袋套牢绑走了？两帮人马之间的怨隙根由是什么？我甚至得像小孩追故事那样去问一些愚昧的问题：哪帮人赢了，哪帮人垮了？侯孝贤不喜用近拍，整部电影完全没有人物脸部的特写，他擅用中距与景深长拍，使人物远而渺小，看这部电影，老实说，我是看得一楞一楞的，到现在还有些糊涂。

一些场景，重复多次，像男人聚首谈事有酒女陪伴都是那张桌子那几个人，后面的背景衬以流行于三、四十年代的彩格玻璃，镜头就定在那儿不动，而这些酒馆和风月场所只是三几栋楼房衬以闪烁的霓虹灯，背景是“乌暗暝”的夜晚，每次采取的角度都从左侧四十五度左右拍摄，一看便知道是叠架起来的道具。流血事件发生之后，众多伤者被紧急送入医院，一片喧哗呼叫声中，医生、护士手忙脚乱在移动伤者、拿药做着抢救工作，镜头用中距，一丁点都没有左右挪移过，使《悲情城市》看起来不像电影而更像出舞台剧，我的意思是说，比杜国威的《我和春天有一个约会》更“舞台化”。

(三)

也许我们应该谈谈《悲情城市》拍摄的时间/时代背景。1988年李登辉当上了台湾总统，同年2月28日，针对二二八事件提出各种诉求的活动在台湾各城镇展开，李登辉表态会“以诚恳的了解来对待此一事件”，二二八事件不再成为一个政治缄口个案后，《悲情城市》即开始拍摄。凑巧（或不巧）中国于1989年6月4日爆

发天安门学生流血事件，《悲情城市》作为一部电影作品“恰逢其会”聆听罹难者家属的日记书写的声音讲述，追溯一出政治惨剧，相信参与1989年9月份威尼斯影展的评审委员观赏《悲情城市》，都有芒刺在背的炙痛感吧。

中国的六四学生运动，官方论述以暴乱名之，军队展开血腥镇压，官方也说成是在维护社会秩序，海内外人士读之聆之莫不心惊胆裂。回头看《悲情城市》，这边厢广播电台播出首长浙江口音读得化不开的训示（影射蒋介石？），宣布“被捕者已释放，由家属领回，伤者受到照顾与治疗，死者会得到应有的抚恤，政府成立委员会处理此事，并委民间代表广纳人民的意见，请人民放心”，那边厢陈仪却“正在调兵，一路走，一路杀”，《悲情城市》十分有力地质疑、批判了官方叙述的虚伪性，这批判很容易让1989年威尼斯影展的专业影评家，因联想到发生于天安门的学生悲剧与官方论述的虚矫而气愤心恸。说了那么多，只是要指出这部电影诞生于1989年这个历史岔口，使它份外引人注目，至于它是否因此而获奖则无需在此作无谓之臆测。

附笔一提的是，1990年，《悲情城市》上映的翌年，台湾二二八事件获得平反，评论侯孝贤这部电影经典的长短文章迄今不曾间断过，是台湾电影史上被撰文讨论得最多的影片。

（四）

如果我们觉得《悲情城市》可能因为台湾本土的二二八平反暗潮，中国的六四而获奖，而忽略了侯孝贤、詹宏志、朱天文等人在这部影片里的艺术功力，那是十分不公平的。二二八事件的受害人除了台湾那群向往社会主义，经常议论时政的知识分子外，又聋又哑的摄影师林文清，根本无可能参与其事的一个小人物，亦被牵连受审，后来还被带走杀害，那是非常巧妙与具震撼性的安排。由不谙台湾甚至华语都不能够灵光的香港影星梁朝伟饰演聋哑摄影师，

本身就是个反讽。

维根斯坦（Wittgenstein）尝谓：“人处在不能言说的情境中，便必须噤声。”文清是个哑吧，不噤声也得噤声，再加上他是个聋子，连周遭的人在讨论什么都没法听见，按常理来说，应该不致受到株连，结果仍然难逃劫数（如果文清是个瞎子大概可免一死），他的女友（后来的妻子）吴宽美是医院里的护士，为人洗漆包扎伤口，从隐喻的角度来看，她也在为家庭惨剧包扎伤口，为历史包扎伤口。

《悲情城市》的许多重要情节的衔接，都依赖宽美日记的叙述，既聋且哑的摄影师文清与其他人物的沟通也得靠文字书写，互递纸条，才能进行。如果文清不能书写以抒己志，则他和外在的世界便完全隔绝。发生在林家与吴家的历史横逆，便是靠吴宽美写的信，她的日记留下的点滴，拼凑而成。这部片子似乎在告诉观众：唯有书写才能为历史留下痕迹。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悲情城市》甜情的含糊闪烁，是另一种方式的“装聋作哑”。每次暴力事件发生之际，导演的镜头反而自现场移开，缓缓地拍摄山川、海洋、森林、船只……以风景的静态来取代现实的残酷与逼害，这种“替代”（displacement）是装聋作哑还是避重就轻？论者认为侯孝贤独特的景色诗学，内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感慨。

出席威尼斯影展，侯孝贤与詹宏志被询及这部电影的主题，他们都承认这是部政治电影。荣获金狮奖回到台北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回应却说这部电影的焦点不在二二八事件，而是“关于生活在自然法则下的男女底命运。”这说法一方面让影片有更大诠释的空间，另一方面在1989年台湾政局仍不十分明朗的关口，把影片题旨含糊化，也使片子较有生存和腾挪的余地。

有一点是肯定的，《悲情城市》很难叫好又叫座，它不是一部知识分子下海之作，它围绕着某个历史事件，或表现，或暗示，或

讽刺，态度严肃认真，在这部片子里，我看不到《菊豆》或《风月》等影片的商业元素底潜性运作。

2002年9月15日

服装伦理与语言伦理

服装的配搭正如语言的配搭，其间有无穷的文学趣味。悬挂在衣架上面的衣裙即使艳丽仍是没有生命的，正如埋伏在字典里面的词汇纵使华美亦无可能散发什么光彩。作家、诗人、评论家、语言学家、修辞学者，如果能注意和感觉到语言组合的力量，我看不出任何理由，他们可以忽视衣饰组合衬在人体上的艺术效果。

康奈尔大学英文系教授亚丽逊·鲁里（Alison Lurie）写的《解读服装》，把衣服视为句子，每件衣服正如每个句子都同时具有意义甚至歧义。服装也有文法结构：白色圆领汗衫衬蔚蓝色牛仔褲的干净简洁那是言简意赅，V字领淡色外套配A字深色裙那是短句衬长句的compound sentence。当然，服装也有自己的一套语汇，钮扣、麦穗、珠片、流苏就似语文里的方言、白话、俚语与顺口溜。穿衣外出，即使你沉默如金，你的服饰会说话，悄悄地告诉你旁边的人你的性情、倾向、品味甚至教养。一个妓女走出来，她还没开口与任何人搭讪，从头发到脚趾的那一身俗艳，很快地便暴露了她的底细。

服装正像语言，可以大胆宣示，也可以隐约暗示，前者近似文学的自然主义或者现实主义，没什么花巧，能暴露的就暴露；后者则接近象征主义或后来的现代主义，表达的方式迂回，形式多变，是“犹抱琵琶半遮脸”的欲说还休，提供想像的空间。

麦当娜外穿意大利名牌西装，内着印上啤酒罐的T-shirt，要告诉观众的讯息是：我是上流社会的淑女，也是住在你家隔壁的野女孩。麦可·积逊威风凛凛的军装，要昭告天下的是：他才是真正的王子（Prince是另一位著名黑人歌星，一度声势显赫，直追麦可），两排金色子弹匣衬饰，象征他“具备武装实力”。服装与语言一样，

可以掩饰，可以避重就轻，甚至可以裁长补短，利用腰封、胸垫可以使人的身型苗条同时又丰满了许多，直线条纹衣服图案使人看来高挑了不少或不太矮胖，对了，提到矮胖，无论男女老少穿起全黑服装都能造成约四分之一的瘦身视觉效果（应该说“错觉”）。

这儿有两个重要贴士：**穿亮丽的衣服可以使睡眠不足的人看来精神抖擞些；还有，长期穿用丝袜的女性其小腿线条会变得较好看，弧度较美。**我与丝袜公司毫无利益关系，没理由为丝袜宣传，许多人只注意到丝袜能遮掩腿上的伤疤斑记，而完全忽略了丝袜对大小腿肌肉的调整作用，这是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的笔者所不能忍受的。

让我们回到语文与服装的平行比较，语言文字用的佳妙，可以把一则内容平淡无奇的轶闻处理得生动有趣，这是化腐朽为神奇，正如服装剪裁，料子不一定昂贵，由于手工精致，颜色组合恰好，穿在身上一样可以令人惊艳。语言不一定要艳丽，周邦彦的秾丽雕镂即不如李清照的率性任真。服装伦理亦似语言伦理，那些非Armani、Versace和Gaultier不穿的人，其实犯的毛病正如当前的一些诗作者那样，误以为非意象密聚、冗长繁复不足以表现作品的份量。笔者读英文报，总不忘翻阅犹似服装展览的城中舞会/晚会图文并茂的报导，可能是自己老眼昏花吧，**好些城中的富婆仕女身上的行头，斑斓似花罗汉（有些连体型也像），适足以伤目倒胃，有时那些名牌披在名流太太的身上，反而比不上一个中五女生穿起合唱团制服的清纯可人。**

曾经一度脍炙人口的香港才女林燕妮，经常出席名流舞会，每次在香港出版的娱乐周刊上看到在镁光灯下肉光致致但皮肤已经开始皱褶的林小姐，我都掩卷叹息。我不忍把文思敏捷、笔触细腻的《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的作者，与刊物上“历经沧桑一妇人”的形象绾接在一起。

服装设计师最喜欢“玩嘢”，有些新潮服装穿在身上像禽兽比

像人多些，Gaultier的设计最能令人联想到《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的作者王朔那种无厘头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经过名模、歌手、影星、名流、富婆与媒体的精心炒作、造势，一件睡衣似的晚礼服也有人当宝，内衣外穿（这正是麦当娜喜用的招数）居然被认定为新款、前卫，被众多娱乐圈中人所模拟仿效。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其著作《裙子底下的剧场》曾直率地指出“覆盖着内裤的身体比裸露的身体更猥亵”，可是谁会去管这些教授级的学院理论呢？

“流行”其实是进行中的（实践着的）阴谋，从时尚服饰到流行小说都可作如是观。英国作家尼古拉·柯立基（Nicolas Coleridge）写了一部十分有趣的书《流行阴谋》，道尽了包括皮尔·卡登、范伦·迪诺、三宅一生等高手的玩世作风与所谓大师创意的逆错与虚矫。用语言为媒介的小说家像卫慧、九丹、春树的“身体写作”，是用文学的外衣包装情色、肉欲的馅料，挂羊头卖狗肉，无非为了要制造新闻价值，使作品能够畅销热卖。美女作家与媒体共谋（collusion），营造出来的效果绝对不逊于时装设计炒作掀起的风潮轰动，十八岁的春树写《北京娃娃》，内容是她自己从十四岁失身到十七岁花样百出的性经验，书籍上市仅两周就印了三版，卖了十多万册，可为例证。这样比较下去，我们不仅要谈服装与语言的伦理，恐怕也要面对后期资本主义制度下性、女体、青春、情欲等原始元素被“高度开发”与“商品化”的社会伦理，限于篇幅，就此打住。

2002年11月10日

现代性液体化

我对现代性的了解，主要以文学为依据，兼及发达资本主义、跨国资本趋向，从生产机制到消费形态以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我一直忽略了现代性的液体化，对全球化的流动性、加速度和与之俱来的高度不稳定性，一直不够关注，也没有人提醒我应该关注。

我留意到这问题是当我读了1981年诺贝尔奖得主卡内提(Canetti)在其著作《人的领土》("The Human Province")的忧虑：“人类来到某个确切点之后，历史就不再真实”，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因此发展出他有名的“历史终结论”，第二现代性或“超现代性”(surmodernity)时代正在降临。加速度使人类脱离真实(the real)，也脱离了历史的指涉，社会正以惊人的速率新陈代谢或“改朝换代”。动力学告诉我们不断加速会造成离心的动能(kinetic energy)，用布希亚的话：“没有任何历史可以抗拒事实本身的离心作用……因此性不得不解放，文化抵不住促销，真理挡不住验证。”

“解放”之后的人类社会是否就大步迈向文学作品中描绘的乌托邦呢？散漫的自由，没有约束力的自由社群组织，“没有约束力”亦意味着“无能为力”。未来社会将塑造一种“接受批判与对抗行为而又不为所动的”体制，政策上的开放/开明(open-house policy)完全不会干预到执政者原先就订下的政策底实施。现代社会像路边的汽车酒店，为每个能付房租的客人提供方便，房间里有睡床、空调、洗澡间，沙发、电话等设备，当然客人得付房租，而且没其理由质疑酒店的外型设计、内部装潢及人事系统等等属于酒店老板所管辖的问题。

我想除了乡间的老妪小儿，大多数人都体验到加速的力量，以

手机下载资料的速度为例，第二代(2G)下载一首三分钟的歌曲需要41分零7秒，目下在我国使用的2.5代GPRS传输速达115kbps，同一首歌10分钟便下载完成，方兴未艾的第三代下载时间却大幅减至0.14秒。大幅增速的结果是城市、商品、资讯、线路的超载，事件的发生与陨灭因为太快了，“就不可能回来证明自身的意义；意义通常都是一项证言”，这是布希亚说的。他也认为资讯与意义的过度生产，会造成“意义的内爆”(implosion of meaning)，摧毁了意义社会化所需要的进程。

现代性的持续液化，使它看来更像火山溶浆那样，它是流质的也是摧毁性的，它携来创造性的毁灭(也有人说那是毁灭性的创造)，古迹被拆除、销毁，阿富汗巨佛的被炸毁只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例子。其他较小规模的古迹销毁活动，几乎在每个国家展开。二十年后这世界的山川河狱与城镇景观必然大异，但是请大家记住，我们都是汽车酒店的房客，我们能干预酒店的行政管理方式吗？

柴松林教授前些日子在《星洲日报》礼堂演说，他讲了一个“笑话”：“在座各位今天仍然被公司、机构雇用，不是这些企业单位特别有人情味，而是因为生产机械人的成本今日仍昂贵，所以暂时还不能用它们来代替你们。”(大意如此)一个不愉快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即使世界经济景气好转，“企业瘦身”仍是一股很难阻遏的趋势，电脑的广泛使用已经使到不少白领失业，过去要聘用十名文员的公司，今日只需三名能操作电脑的员工便可提供同样的生产成果，富裕国家面对的是愈来愈尖锐的科技发达所携来的“结构性”失业危机。

人们追求个性的抒发，表达反体制、反主流的意见，他们大多会匿名走进网络空间去揭发、骂骂，并作出各种耸人听闻的警告，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电脑客多采取“逃避、躲开与隔离”(escape, avoid and disengaged)的姿态。艾塞·柏林(Isaiah Berlin)曾把“自

由”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整日在网络上游弋出击的新人类能把握的恐怕是消极的自由吧。

《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作者路易斯·卡罗 (Lewis Carroll) 说：“为了保持名次，你已经费尽气力，如果你要得到更高的名次，你得更快地跑。”更快地跑意味着工作量的加重，移动次数的增加。新人类对“福特型工厂”(Fordist factory) 及那种作业形态愈来愈不耐，行之经年的韦伯 (Max Weber) 式僚属制度 (bureaucracy) 也是第二波现代性必然会冲击的对象。新人类喜欢松散的组织形式，充满不确定性但具备弹性，可以为了完成一个企业个案而凑合在一起，工作完成大家便恢复个体户的自由身。组织的液体化使它可以应付变化迅速的企业与职场需要，人们无需被圈限在厂房、工地或办公室里，他可以在咖啡厅通过笔记本电脑发出 e-mail 或利用手机打出买卖短讯，在横越大西洋的飞机上整理企业计划或工作报告。

1997年 Nigel Thrift 在其著作《文化价值》(Cultural Values) 的其中一章用到“温和资本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soft capitalism) 这样的字眼，现代性可以轻便灵巧，唯即使所谓“软件资本主义”(software capitalism) 也不是“温和”的。用“舞蹈”(dancing) 和“冲浪”(surfing) 这些词汇予人的印象好像第二波的现代性很优美、很有型，其实“舞蹈”、“冲浪”只是恰切地描绘出现代性的液体化与流质性，舞蹈员与冲浪者都得经历严格的训练，身手矫健，应变能力迅速，才不致失去重心而摔倒或受伤。

在液化的现代情境里，人与人之间凑合无常，时聚时散。资金流动从投资到撤资，仅仅是键盘按钮一瞬间的事。过去固体的、沉重的现代性是“愈大愈好”，从重型机械、器材、仓库到各阶层的员工，液体化现代性走向轻巧、灵活，一个毫不起眼、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拿着公事包、笔记本电脑和手提电话四处旅行，与世界各地的朋

客接洽交往，做的可能是以百万元计算的生意。

液化的企业环境，使挂牌公司变得不可靠，连续盈利不足五年(真正的情况可能是连续亏蚀五年)的公司找到门路一样可以上市；一间在来上市前营运良好的公司可以在上市后一两年内亏得仅剩空壳，真是不可思议。液化现代性纵容公司以“加强效率”、“改革”、“重组”等理由，让公司从大变小，从椭圆形变成三角形，从固体变成液体然后自动流失，怎样在这个过程中从容脱身，是有关公司董事最关心的问题。香港人最喜自诩为“食脑一族”，所谓“食脑”卖的是点子、概念、创意与做了坏事又能开脱嫌疑的策略。在固体现代社会里物质硬件是最可依附的东西；在液化现代社会里，思想/想像这种抽象和流质的因素，却往往是最大的利润来源。

2002年9月29日

谈两种“历史终结论”

——致黄俊麟书

俊麟先生：

您好。

谢谢您在收到传真稿〈现代性液体化〉之后，在电话里第一时间提醒我美裔日本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撰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也用到“历史终结”这个耸人听闻的片语。

拙文〈现代性液体化〉第二段论及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的“历史终结论”，与福山的“历史终结”内涵差别颇大。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福山曾于1992年发表另一篇名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这篇文章删去了“历史终结”这个片语后面的问号，语态变得肯定。

福山的见解其基本假设是美苏对抗告一段落，“美国主义”必然大行其道，成为大家都接受的“世界主义”，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被摒弃乃无可避免。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可没那么乐观，他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过后，世界政治版图有变，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文明将会与东方文明发生龃龉而导致对抗、冲突。就目下的国际形势来看，西方基督文明与回教文明正互相对垒，剑拔弩张，地点在中东，焦点在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所组成的核心地带。亨廷顿的预言比福山悲观，但似乎也比前者准确。

基督教有所谓“末世论”（eschatology），日人福山在意识形态上可能比一般的美国人还“美国”，他把美国的敌人都视为魔鬼撒旦，一旦苏联这魔头降服了，则人类便晋入西方的极乐世界。

亨廷顿的观点不同，他从基督教历史找到另一理论根源，即“启示论”（apocalypse），认定一个撒旦垮了，另一个撒旦将诞生，明乎此，读者也就不难理解美国不断要找另一个新敌人（伊拉克？中国？朝鲜？）的集体潜意识背景。

布希亚的观察，不似福山、亨廷顿那么泛政治化，他关注的是社会内在因素的快速流动性（fluidity）所造成的意义“内爆”（implode）。一切都是拟象（simulation），通过媒体所呈现的符号都严重失真，由于拟象栩栩如生，有时比真实更真实，使真伪无从区分辨别。商品的增长如癌细胞的繁殖，人类发明的“物”反过来包围、吞噬人。据布希亚的看法，人类来到二十世纪末，已经历了形形色色的解放，包括政治解放、性解放、美学解放、价值解放，大家都看清楚没有可以献出热情的乌托邦。剩下的是例行的事件“反当”，这种“反当”使意识里的世界景观愈来愈变成糊状。人类因刺激过度而麻木，因激情燃烧耗尽而冷漠，用布希亚在〈公元2000年会发生〉一文的话：“历史自己会停下来，自我消除走上终结”。布希亚没有确切地指出“消失点”（vanishing point），不过他有提到末世的形式：最后的审判，终结的具现可以是革命、灾难或救赎。

严格来说，布希亚不是一位社会学家，他的旁征博引，涉及电视、拟模、仿造、游戏，里头有许多后现代的媒体理论。笔者对福山那一套“以美国人的梦为自己的梦”的历史终结论兴趣缺缺，却对布希亚充满智慧与警戒意味的话耿耿于怀，他说：“我们继续在编造历史，搜集社会符号、政治符号，进步与变迁符号的同一时间内，我们促成了历史的终结。”

谢谢您的点醒，身为一个编辑人，您博学敏思，而我也有这责任向读者交代福山与布希亚两者“历史终结论”的歧异。布希亚把人放在宇宙的背景来考量，以物理学来说明加速度所造成的离心作用，使他的理论显然比前者有趣得多。专此

即
颂

编
安

潘朵拉的盒子打开了

——谈全球化

温任平 谨启

2002年10月3日

我对全球化的认识十分粗浅，在不同场合与友侪胡兆龙、林明俐、林庆焰谈起全球化这议题，获益不少，大家都能认同一个很硬的事实，即全球化是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既不能与之抗衡，亦无可能将其来势逆转。上周在电视节目听法立诺博士(Dr. Farish Noor)与三位外籍教授讨论“Ethics and Globalization”(“道德规范与全球化”)，与会者谈到科技、医药等知识转移的种种好处与各国政府的管理与干预。论坛的内容对我颇有帮助。最近经常困扰我的其中一个是：“全球化能否在地化”(globalization localized)?或者大势所趋，人类社会正走向维希里欧(Paul Virilio)所指陈的“全球去在地化”(global delocalization)?

即使最乐观的人，在今天大概亦不会相信媒体学家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所描绘的全球一体化将出现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美景。但不相信又怎样?全球化的进程正以加速度进行，即使某人远遁非洲藏身在康拉德“黑暗的中心”，恐怕也无法躲开全球化的影响。那么，去了解全球化，去适应全球化，甚至在自己能做的范围内调整一下自己的步伐，大概是必需的吧。

我国首相马哈迪医生在多个场合下批判全球化的种种弊端，诸如全球化明显地有利于西方先进国家，因为主导权就在这些国家手上。全球化使贫富更为悬殊，社会更缺乏公义，弱肉强食的结果使发展中国家更处于捱打的被支配位置……首相这些严厉的批判矛头对得很紧，绝非无的放矢。我们最深刻感受到全球化的侵略性(伤害性)的那年是亚洲发生经济风暴的1998年，梭罗击垮了泰国的金融体系后，进一步对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南亚诸国肆虐，并在股

汇二市动手，企图一举弄垮香港。电脑按钮式的资金输进与撤离，使每个蒙受过重创的国家仍有余悸，也对全球化的跨国企业、无疆界的资本流动的负面效应提高了警惕。

全球化大概是在1990年代末期才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但全球化并不始于1990年代。当欧洲国家往外移民，全球化的进程便开始了。最大规模的全球化是十六世纪欧洲各国人士移民新美洲。十九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以及欧洲列强的涉足中国土地，都是以船坚炮利的暴力征服姿态，强行把西方的器用甚至思想意识带进封闭的中国，蒋梦麟笔下的“西潮”东渐是个事实，而西化正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一轮的全球化与上一趟很不一样。中国接受西化是勉强的，抗拒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类的主张或可窥见这种抗拒的心态），当下的全球化可谓兵不血刃，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接受。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Levi's 牛仔裤、摇滚乐、好莱坞影片，几乎遍及全球。不管是哪国的人，皮肤是黑还是白，大家都想把握新的技术与资讯，俾自己更有竞争力。笔者在文章前面提到的“在地化全球化”，罗柏逊（Roland Robertson）称之为 glocalization。意大利的比萨饼来到马来西亚添加了本地人喜吃的辣椒，日本寿司在不同国家也会稍为改变其馅料使产品销售到全球各个角落去，弹性生产与包装为的是克服在地消费者的心理抗拒，这就是“在地化全球化”。

我觉得罗柏逊在其论著《Gloc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在地全球化：时间与空间，同质性与异质性”）提出的某些观念值得吾等留意，那就是时间增速，空间因而更呈压缩，电子讯息的立即传送，使地理距离不再成为障碍。必须在此指出，光纤在全球化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光纤的研究始于1960年代，大量的商业用途的开发却在1993年，光纤的发明使互联网成为可能。大量讯息以光速传播，讯息载送量大，速度快，效率

高，耗费却极廉宜（传送一则 e-mail 要多少钱？），许多昔日不可能发展的业务，今日可在网上进行，并且在买卖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完成交易。我的一个客户在吉兰丹培育到一大片有机泥土，在丹州销路却一直打不开，我建议他在网上打个一页的广告。目前他的情况是，订单源源而来，应接不暇，他那点有机泥根本无法满足市场所需。

全球化是一种动能，也是一把两面刃，带给人们希望也携给人们灾难。利用网络进行各类的欺骗甚至犯罪的活动层出不穷，当坏人可以藏匿在一个代称或符码后面为所欲为时，他自然更大胆放肆，问题是全球化的潘朵拉的盒子已经打开了，尼格利与哈特（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在他们合作的巨著《Empire》（“帝国”）提及全球化造成道德沦丧、人性堕落。贫富悬殊除了经济强弱也反映了不同阶层知识的落差，这都埋下社会不安与失序的种籽。可能的话，我会另写一篇文章进一步讨论这方面的现象与问题。

2003年1月5日

去国家化/治外法权/平庸影响

——再谈全球化

最能让一般人感觉到全球化力量的是经济与资讯的迅速流动，一些学者开始考虑到未来跨国企业与资本将超越国家政治成为真正的主宰。国家如何维护其领土之完整？这儿的“领土”除了地理意义还包括政经文教的范畴，国际公法、在地法律与军警的“合法暴力”（？），使国家的概念与空间得以具现，不过贺姆（Hans Henrick Holm）与索联申（Georg Sorensen）合著的《世界秩序谁属？不平衡全球化与冷战的结束》（“Whose World Order? Uneven Globalis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预测国家的政管力量将渐趋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多国公司与跨国资本的综合制约能力。远的不说，只要我们看看美国的微软（Microsoft）电脑的实力，它的资产总和比马来西亚股市近一千家挂牌公司的资产总额还要大，便可知贺姆与索联申二人并非杞人忧天。

回到全球化的定义，纪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把地理距离甚远的地点连结起来，强化各个地点的社会关系，使远方发生的事可以快速有力地影响本地，反之亦然。”

这个定义并没什么新意，纪登斯下面的阐释才令人不得不深思：

“……社会关系从在地人际互动的运作中抽离，跨越时空然后重新组合。”

他把这种效应称为“剥离”（disembedding）。纪登斯的学术伙伴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全球化是“时空的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我们将纪登斯与哈维的看法放在一起观照，即不难了解全球化以光速通讯消弭地理距离，并对人类的社

会关系进行彻底的颠覆与瓦解，我的看法是“后国家时代”会到来，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手提电话与治外法权

从器用的层次谈全球化，以手提电话（下称手机）为例，手机的发明与广泛使用，使权力主宰者拥有“治外法权”（extra territorial power）。公司主管交一台手机给他的员工，除了要知道员工在哪里，在做什么，而且在办公时间（一般的情况是朝九晚五）过后仍能向下属交代、询问业务进展，甚至嘱咐他们做额外的工作（比如说，以自己事忙无法抽身为由，要员工代替自己去接机），由上到下的全球化同时携来的是由上到下的剥削。

傅柯（Michel Foucault）多年前提出的“全景监狱技术”（panoptical technique），有效地监视囚犯们的行动，命令囚徒做当局要他们做的事，手机的免费供给发挥的正是 panopticon 的效应，让“老大哥”（big brother）在这儿是高阶主管得以监控一般员工。高层的意愿通过手机用“婉言”（euphemism）的方式得以传达、贯彻、执行。受僱者则愈来愈身不由己，私人时空明显地受到剥夺侵占。大家都看过“没事干，半天吊”的电视广告吧，我的解读是：即使你在度假，攀高滑雪，要找你的人还是会找到你。

全球化鼓励大量的商品生产、传输、消费，商品不再以持久耐用为制作伦理，而是以它的新颖别致进行促销。全球化的“去国家化”（denationalized）与“超国族化”（trans-nationalized）作用，使社会关系，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异常短暂与脆弱。

就我的观察，全球化最厉害的一面在于它的平庸与大众文化性格。华尔迪斯尼绘制《花木兰》卡通片的“中国风”（chinoserie）；好莱坞利用古埃及传说摄制了一部又一部以木乃伊（mummy）为主题的烂片，以异国风情（exotic）吸引票房；伦敦

餐馆目前以印度烤鸡 (tandoori chicken) 代替过去英国传统的 fish and chips；一流的男高音卡瑞拉斯在奥运会上唱的主题曲《Enigma》，玩的是台湾原住民音乐，这种文化交融杂化一切都以经济效应为依归：产品要销得出去。文化学者会把上述现象解读为“文化异化”，即文化发展脱离正统/常规，异化也不完全是件坏事，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华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变异性和坚韧性，鬼佬版《花木兰》提供另一种诠释，但却无损花木兰故事的原始精神。

文本太多，正本太少

人们今日的焦虑是要面对太多的资料，太少的资讯；太多的意符 (signifiers)，与太含混的意指 (signified)，太多的文本 (texts)，却缺乏可信赖的版本，在报馆服务的朋友，每天都困面对一大堆知识垃圾而烦恼。

霍金教授 (Stephen Hawking) 继《时间历史》之后出版了另一新著《The Universe in a Nutshell》(“果核中的宇宙”，书名用的是莎剧《哈姆雷特》的文学典故)，他提到今日全球出书数量之迅速，一个人必须以每小时快跑 90 英里 (1 英里等于 1.609 公里)，才能赶得及接刚出炉的另一部新书。我的一个从事国际贸易的客户告诉我，他的公司每天平均接到六百则 e-mail，四分之三由公司秘书、文员跟进、处理，其他约一百五十则电邮则由于牵涉到重要的业务磋商，他必须亲自阅读，并字斟句酌作出诱导式回应。他前来咨询我的时候，抱怨两肩及颈项酸痛，视力衰退，精神困顿，他问我有无可能转行。我建议他把电子邮件的往还工作逐步交给亲信代劳，减轻自己的负担。一个很硬的事实是，今日用手机通长时间电话与浏览回应大量 (过量) e-mail 而患偏头痛的“后现代病者”，人数正在增加。

关于神经耗弱的现象，我想在结束本文前稍加引申。麦哥积逊与麦当娜的做秀唱，已成为全球化其中一项显眼的表征，世界各地

不同种裔的歌手都在仿效他们，包括国内听众/观众熟悉的郭富城、杜德伟、张惠妹、李玟。每次看歌手们在台上既唱且跳、满脸汗水那种亢奋，我都不禁怀疑他们服用了多少药物，才能支撑三个小时唱作俱佳的巅峰状态。我更担心的是，通过播音系统高贝分的裂帛嘶喊，对受众会造成什么程度的集体脑损伤。

我的朋友黎广才医生告诉我，三十岁后的成年人，每天脑细胞大约死去 (infarc) 千余个，而人的脑细胞一旦死去，无法再生或取代。羊痫症患者每次病发，脑细胞可以一次死去数十万个，数量视病发时间长短而定。歌手在台上撕心裂肺的嚎叫，台下受众如痴如醉、歇斯底里反应，症状与羊痫发作相似。如果有人不知死活，一边嗑摇头丸，一边追随爆炸摇滚乱晃乱摔，则不啻是赶鸭子似地赶着脑细胞集体自杀。

全球化是另一种形态的殖民，它的大众文化的平庸面渗透力绝不逊于资本的蚕食与吞噬，但今日已没有任何一个区域/社群可以“自我区隔” (self-ghettoization) 以求免疫。文化学者史碧娃 (Gayatri Spivak) 主张以“策略性的本质主义” (strategic essentialism) 应变，丢开围城心态与排外思想，以承受、挪用、转化全球化的影响。史碧娃认为文化可以超越国界，并在文化交融活化的过程中保留在地的特色，她的看法与李泽厚的观察遥遥呼应。对全球化的前景，也许，我们不必太过悲观。

2003年1月19日

花罗汉与博彩资本主义

花罗汉作为一种吉祥鱼，大约出现于世纪之交，开始是在丁加奴试行饲养。坊间盛传它是非洲鱼的混种，恐怕有误。我问过一些行家，他们告诉我是台湾金刚鹦鹉鱼与印尼青金虎的混种，有人则说那是金刚鹦鹉与本地迦菜鱼的杂种，也许花罗汉乃是不同品种的慈鲷鱼（*cichlasoma*）的配种改良较为可信（青金龙也是慈鲷鱼的一种）。当然，在“交叉繁衍”（*interbreeding*）的过程中亦不能排除非洲鱼也曾以身相许，在授与受方面作过贡献。目前市场上卖的各种巧立名目的花罗汉（金花罗汉，东姑罗汉，珍珠罗汉，马骝面……），变种变形变脸变色，已经到了族繁不及备载的地步。

根据笔者对文化的粗浅认识，任何区域，如果文化混杂便会出现“杂种性”（*hybridity*），而混杂文化往往比原来的本土文化更多姿多彩，更活泼有力。有唐一代引进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又带入印度佛教文明，唐代文化从而蓬勃多元，为前所未有的。我们今日审度高度杂种化的香港文化，同样觉得出来它的“强烈脉动”（*vibrant*），它的可塑性。我猜想今日大家竞相饲养的花罗汉，能那么多姿多彩（应该说是七彩斑斓），亦是拜 *hybridity* 之赐。

2001年花罗汉的身价飙升，一度骄人的金龙鱼、银龙鱼相对被冷落（虽然这种古董鱼在面对花罗汉的严峻挑战的今天，价格仍然不菲，原因何在？这是要另外撰文才说得清楚的问题），就星座的运行而论，双鱼座时期（*Pisces*）告终，水瓶座时期（*Aquarius*）肇始。大家都看过双鱼座的符号：两条鱼并列，头尾却朝着不同方向，难怪上个世纪一百年间，从政治取向到意识形态都一直那么两极化。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不同国家组成的两个阵营的对垒，直到其中一个阵营全面溃败，这种对抗才告一段落。资本主义 vs 共产

义，西方文化 vs 东方文化，还有911事件激化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猜疑与矛盾，都可以解读为双鱼座内蕴的两股宇宙动能，互相抗争的表象化（*manifestation*）。

水瓶座时期是一个推崇灵性、追求知识、提升智慧、追求真理的另一阶人类文明，水瓶座的符号是一个水瓶（水壶），它象征容纳性，道家的“虚空待物”或可描绘之。我倒没想到 *Aquarius* 才启幕，市面上一古脑儿会冒出那么多同的 *Aquarium*（水族馆）来，而且由马来西亚率先，真是吾国人民的造化。

花罗汉的购买者（消费群）包括三大民族，我们叫它作花罗汉，友族唤它作 *Flower Horn*。体型漂亮，颜色配搭艳丽，身上那些黑色图案/斑点别致的花罗汉，叫价从几千元到数万元，报载一条金刚罗汉卖给新加坡商人，售价高达十四万元。有人从花罗汉身上的图案读到可兰经的爪夷文，有人读出（或拼凑出）阿拉伯数字，四个号码可以一连两期开出首奖与入围奖。初聆这些天方夜谭我开始亦嗤之以鼻，以为谣言应该止于智者，后来我去怡保狮美新村某水族馆又蹲又站了两个多小时，居然发现有一条四寸多长的花罗汉靠近鳍尾处浮出“现代”二字的草书，仔细端详还真有点像陈瑞献先生的“蚯蚓体”。我的妈啊，原来我在马华文坛推广现代主义，通灵的是知晓原委的，这三十年来的苦心经营，招来那么多的明枪暗箭，大可见怜，有鱼见证，也就值了。

我对花罗汉的兴趣愈大，寻根究底的好奇心也就愈强，好不容易我才探悉，花罗汉身上的图纹是培植者刻意加工弄上去的。黑色图案随着鱼儿的日渐长大而拉长延伸，自然湊合出既像文字又像数字的符篆书写，从不同视角透过不同的心理需求揣摩这些符号，往往各有所获，这就像乱童涂鸦一样，善男信女看了都“心里有数”。这重大发现使我十分震愕，但又不得不打从心坎里佩服养殖者的创意。金龙鱼的泳姿优雅（甚至带点倨傲），血鹦鹉红彤彤的一大片，看久也就腻了，不像花罗汉身上的谜，耐人寻

释，令人费解，尤其是万字票开奖的前夕和当天，它提供下注的灵感，甚至“突然富起来”的神奇契机。

《语言与沉默》(“Language and Silence”)的作者，著名人文批评家乔治·史丹纳(George Steiner)曾经指出，人类正进入“博彩文化”(casino culture)的阶段，也许中国学者甘阳的称谓“博彩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或更适当。经济不景，人们往往弃正道、走偏锋，通过投机、冒险的管道希望侥幸胜出，赚它个满堂红。在西方社会，旧资本主义以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s)作为待人处世的规矩，勤奋工作，适当理财以改善个人与家庭经济的观念已被遗弃；在华人社会，儒家的那一套克苦耐劳，重义轻利，节俭兴家的优良传统，在后期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亦几乎彻底被摧毁。

借贷消费文化的运作，鼓励人们用未来钱，信用卡的广泛使用使透支额迅速增大，人们甚且可以挪用未来五、六年的金额。贷款当然是要摊还的，一般人在逐月还了房屋、汽车的贷款后，还要筹钱付信用卡的款项，手头都十分拮据(虽然大家仍然衣着光鲜，维持着风光的外表)，为了多挣几个钱，人们不是身兼二职，业余从事形形色色的传销活动赚点外快，便是冀望从赌场、马场、球场捞点偏财横财。花罗汉图腾适时地引发了“神秘经济”(occult economy)，这股势头一发不可收拾，新加坡之后的销售热点可能是香港、深圳、广州和民生多艰、经济低迷的台湾。

本文无意打击这一波的神秘经济(增加国民收入，提供创业就业机会，不是件坏事吧!)，我要指出的是这种神秘经济到头来可能毁于育种改良业者的“炫耀性创意”(conspicuous creativity)。北马与泰南的一些行家有计划把花罗汉身上的图案直接“电镀”上“马到功成”、“年年有余”等吉祥语与宗教的经文片段。以微晶片(micro chips)植入皮层，鱼儿仅受轻伤，涂些消毒药水，很快便能痊愈，用电镀法则不啻杀鸡取卵，花罗汉蒙

受内伤，只能存活三、四个月。但这些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当“阿弥陀佛”与“真主伟大”这些字眼清晰地铭刻于鱼体那一天，神秘经济便不再神秘，创意变成了匠意，花罗汉谜一般的魅力将消失于无形。当那一天到来，博彩资本主义便需要其他披着神秘面纱的概念/产品/创意来填补花罗汉缺席或淡出后所留下的生产/消费的吞吐空间。

2002年12月8日

2003年形势蠡测

个人经历纪要

我的星座是射手（Sagittarius），按理来说，三对我是当然的吉祥数字，对这资料存疑的读者不妨翻阅一下这方面的书籍，一窥即知。我对三这数字十分敏感，对我来说，碰上三的年份，人生际遇的变化虽大，唯大抵都不坏。

1943年我还未诞生，1953年我从美罗冷水河新村培英小学转去美罗火车站新村平民小学念书，爸当上了校长，自己在同学间的地位无形中“增值”，1953年到1955年在平民公立小学，我度过了一生中仅有的快乐童年。1963年我念完高中转去怡保念英校，被形势所迫，不得不苦修英文。1973年我第一次出国前去台北西山大饭店参加是年的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那时我和瑞安搞的天狼星诗社晋入全盛时期。1983年我在金宝培元国中教书，积极参与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事务，担任总会的语言文学组主任兼霹靂州文协分会主席。1993年提早退休，离开教育界，那是我下半生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九年过去了，衡量得失，我肯定当时毅然选择下厨的决定没有错。

历史大事追溯

撇开个人际遇，从宏观的角度看世界大事，逢三的年份倒不见得好，我查到的三的年份往往是凶年：战争、动乱、革命、饥馑、地震，各种气候剧变都在三的那年出现，为了证明我并非危言耸听，兹把上个世纪碰上三的灾难年与事件列下方便参照：

- 1903年：日俄战争前夕，亚洲各国政局动荡。
- 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两个阵营剑拔弩张。

- 1923年：俄国革命，共产党成立苏维埃联邦，同年发生关东大地震。

- 1933年：美国股市崩溃，经济大萧条。

- 1943年：德国的六十万纳粹机械化部队于苏联的史达林格纳被奇寒（零下50度）所困，兵败如山倒；同年4月，日本海军总司令山本五十六阵亡，日军在太平洋全面溃退。

- 1953年：经济恐慌，百业萎靡，史达林于是年3月遽而去世，使世界政经局势陷入纷乱。

- 1963年：肯尼地总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被谋杀。

- 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工业国蒙受重挫。

- 1983年：亚奎诺返马尼拉，于机场被射杀。

- 1993年：作为亚洲经济火车头的日本，经济泡沫破碎，迄今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有日渐沉沦之势。

如果追溯上去，1893年是中国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夕，东亚局势绷紧。1883年8月27日则发生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火山爆炸，印尼的喀拉卡托岛几乎尽毁，三万六千余人死亡，地震加上因此引发的海啸击沉了六千多艘大小船只。细心的人可能记得在肯尼迪于1963年被刺的一百年前——也即是1863年，同样是碰上三的凶年——林肯总统于剧院被枪手击毙。谈了那么多，读者心里关注的大概不是十七、十八世纪逢三的年份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而是近在眉睫的2003年可能会出现怎样的天灾人祸。在作出任何臆测之前，我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太阳的运作情况。

太阳能量强弱的影响

太阳活动力极强，喷发出炽热无比的烈焰，巨量的氢与氦的原子，互相碰击而造成的核融合反应，造成持续的爆炸。太阳表面的火焰高热超过一万度，喷起的火高达一千万公尺。太阳有它活动激烈的时期，也有燃烧较为平静的时期，从活跃到平稳的周期约为十

年，如是循环往复，而被阳光普照的地球上的人类，他们的情绪也受到太阳的无形牵引。

太阳的表面有黑子，有些黑子体积甚至大过地球。黑子是呈漩涡状的高浓度气体，当太阳活跃，能量增强，黑子的数量增加；反之，当太阳活动弱化时，黑子的数量亦剧减。也许是巧合（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那是周期性循环），逢三的年份，太阳的黑子剧减，地球于是面对各种冻害。

情况是这样的，当太阳的红外线放射量减弱，地表趋冷，即容易出现大寒流，造成灾祸。寒流的出现（或延长）所形成的冷气团可以吸去周遭的水份（这与雪柜的原理相同，冷气间空气特别干燥是大家都体验过的），造成干旱，而寒流与干旱势必影响到渔农作业的收成，其结果是经济不景。一些政府因而倒台，造成政局动乱，一些国家领导人以各种藉口为名，发动战争，掠夺他国财富以自保、自强，天灾人祸于焉接踵而至。太阳能量弱化的时候，人们的心理出现异乎寻常的焦虑。傅柯（Michel Foucault）在他的《疯癫与文明》一书指出人类文明的发展，每隔一个时期便会陷溺于集体的疯狂中，观察可谓十分敏锐，不过傅柯依据的是历史演变的某些可资辨识的律则，以上笔者所述，描划的是人类对于太阳能量强弱的生物反应。

距今还有几天便是2003年了，大家面对的局势是：恐怖分子可能再度袭击美国与英澳等附庸国，而美国正盯紧伊拉克，只要联合国武检人员指证沙且，胡先不合作，攻伊行动就会发动，而这一战将比十年前老布什主政时期的海湾战争更为惨烈，死伤人数更多。最近美国因沙地阿拉伯某公主涉嫌资助恐怖分子，两国关系绷紧，美国近日对伊拉克的挪移某些器材，事先探获武检人员的勘查地点感到不满，凡此种种，都显示美国正在寻找藉口动武，大家都明白美国垂涎的是中东油库。2003年的暴乱热点肯定就在中东一带。

英国剑桥大学的霍金教授（Stephen Hawking）在一篇讨论音

速与光速的文章里提到，地球接受太阳能有愈来愈不稳定的趋势，臭氧层的破损日益扩大，太阳喷出来的微粒子、高能量子、磁气、红外线、紫外线、X光在愈来愈缺乏过滤的状况下播散到地球。

2004年上半年的黑子数量可能与2003年相去不远，要到下半年才开始略为活跃，霍金教授认为地球生态被破坏，使估测太阳能与其效应出现“高度的不稳定”（high precarization），因此对于2004年是否就能否极泰来，仍不宜太过乐观。

三元九运的蹊跷

风水学有所谓三元九运之说，目前正值1984到2003年的下元七运末期，明年便进入2004年到2023年的下元八运，下元九运是2024年到2043年，敏感的读者可能已发现风水周期都以三的年份结束（中元六运是1964年到1983年），季节之交一般人都不易适应，更何况是二十年一周期的“改朝换代”？没有人要你相信风水之学，但三元九运由堪舆家通过长期视察与研索厘订下来的二十年为一运，每运均以三结束（为什么不是以零为始，以九作结？或以一为始，以零作结？），用“古代智慧”一类的述语恐怕无法描绘其中的蹊跷。

不要以为只有伊拉克的处境最险，就笔者所见，以色列全境以及作为美国象征的纽约市情况可能更危险。12月的奇寒正侵袭纽约，路上积雪二、三尺，而邻近的加拿大却发生森林大火，多么奇怪的对照。笔者并非预言家，鉴往是否可以知来殊为难料。量子理论物理学者波尔（Neils Bohr）曾慨叹：“预言很难，特别是预测未来。”从声誉卓著的十六世纪预言家努斯特拉达木斯（Michael Nostradamus），到晚近的杜弗勒（Alvin Toffler）、奈斯比（John Nasbitt）的趋势研究，费丝·波普康（Faith Popcorn）的“爆米花报告”，都对未来的世界前景作出不同角度的预测。也许未来学家更应思考的是“人类究竟有无未来？”、“人类还能拥有多久未来？”这些带点荒谬的问题了。

纤柔书写的“阴性中国”

与某美国学者在一个座谈会上聊天，我们用中英文夹杂着谈。这名老外称得上是个宋词专家，他的硕士论文专研柳三变（柳永），目下在香港中文大学念研究所，博士论文比较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与意境。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对中国的看法没有政治正确或不正确的问题。从谈话中，我觉得他对中国的印象大抵上源自对中国韵文——尤其是词——从修辞、内容、情调、氛围到音韵给予他的感觉。他对我说：

“To me, China is feminine, melancholic, overwhelmingly nostalgic, subtle but subdued.”（对我而言，中国是阴性的，感伤的，洋溢着乡愁，精巧但却是压抑的。）

他的评语使我有这冲动去检视晚唐以迄有宋一代诸家词风，虽然限于时间精力，这是做不到的，北宋苏东坡词逾五百首，南宋吴梦窗作品三百五十余首，卷帙浩繁。退而求其次，我决定翻读温韦冯李四家词，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都是男性，这位美国学者却从这几个大男人的作品中读出“阴性中国”来，宁非咄咄怪事？

温韦冯李词风概述

上述四人为晚唐五代的著名词家，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就四家词作了不少眉批式的批评，叶嘉莹教授亦曾撰文比较讨论过温韦冯李的作品特色。

温庭筠最为脍炙人口的词是《菩萨蛮》，词不长，可以尽录：“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飞卿的另一首较为平易的词《更漏子》：“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

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词中人物均为女性，《更漏子》比《菩萨蛮》多了一份沉重的闺怨。

韦庄词的特色是寓浓于淡，运密入疏，其名作《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前半阙直达，后半部纤郁。韦端己的另两阙《菩萨蛮》的开首句，分别是“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与“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用的形式/技巧都是次句“颠覆”首句，点出人不在洛阳，人已远离江南的不愉快现实。这两阙词内蕴的人事变迁与时间伤逝，不言可喻，基调是地理的以及时间的乡愁。

而冯延巳的佳篇甚多，难以尽录，《女冠子》的“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及“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的自我抒写，仍是比较含蓄的流露，正中写《荷叶杯》：“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词中主角，跃然纸上。正中词颇为多元，他写《鹊踏枝》十四首便较沉潜婉约，耐人咀嚼，或写桥上伫立：“……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或借雪景喻意：“梅落繁枝千万片，犹自多情，学雪随风转”或写垂杨：“心若垂杨千万缕，水阔花残，梦断巫山路”，伤春怨别，甚至以梦为意符曲达离情。

至于李煜，乃南唐后主，早期多闲阔庭台、歌舞宴饮之作，亡国之后感慨深刻，王国维认为李煜“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其名作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及《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或融情入景，或融景生

情，感慨既深，下笔任纵，得其自然跌宕，每多奇句，亡国之伤痛每每化作“天上人间”、“一江春水向东流”、“林花谢了春红”等意蕴因约深沉的意象语。当然我们仍然可以说这些作品伤春叹逝、凄怆悲惋。后主词的艺术造诣即使高于飞卿、端己、正中，基本格调与情韵仍离不开老外所领会到的“阴性”：忧伤的、乡愁的、精巧的、沉郁甚且是压抑的。

为赋新词强说愁

词也有豪迈雄奇的一脉，苏东坡、辛弃疾、陆游乃其中佼佼者，唯毕竟是词家中的少数，即使才华横溢如苏轼者，“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固然广为传诵，但其他以女性口吻吟风弄月、遣怀寄托的词作数量更多。词作为一种叙述体，仍以婉约、轻倩、精致、纤美为正宗，德曼（Paul de Man）把语言分为“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宋词的字雕句镂可谓典型的“文学语言”。说得不客气一些，“为赋新词强说愁”几乎是词的常态。钱钟书先生曾经直率地指出“不病而吟为文学生活里不可忽视的事实”，各种文类中词的“不病而吟”是最常用到的，并且为众所认同的艺术技巧。

应该指陈出来的事实是，从晚唐以迄南宋的词家辈出，作品数量众多，出色的女词人却只有李清照、朱淑真等寥寥数人，可是如果只读词作，不管作者，或者外国学者只读译作，不参照作者的性别，我们得到的印象将是词坛为女性作家垄断，“怒发冲冠”、“想当年金戈铁马”一类的作品，只是三两个儒将的偶作。男性词家在词中化身为女性，用女性的语言、语调、形象来写作，用现实的楼阁庭院，以心理的闺情愁绪来书写，浸假为词之“文学成规”（literary norms）。朱耀伟博士认为男性作者使用女性语言按女性形象创作是一种“双性化”倾向，奇怪的是，唐诗并无此倾向，偶一为之是另辟蹊径，求出奇制胜，并非常态，翻读《唐诗三百首》

或任何人编纂的《词选》，略作比较便可知所言不虚。

老外念硕士攻读的是柳永词，柳三变〈雨霖铃〉的“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词写得有意境，唯仍围绕在送别伤怀的题旨上，是伤感的、柔弱的。至于像〈定风波〉：“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事事可可。日上花梢，梦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鬓，终日恹恹倦梳里。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通篇伤春倦起，嗷吟妮态，是“变成她者”（becoming the female other）的阴性书写。老外于硕士、博士阶段读的尽是绮靡、纤丽、哀愁、忧苦的柳永、飞卿、端己、正中、后主词，久之所阅读到的中国面目亦呈阴性反应，这情形正如今日的不少西方作家、学者、艺术工作者从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作品读出了“专制中国”、“风月中国”。

允许笔者岔出题外，成龙武侠的杂耍式演出，老少咸宜，既好看又逗笑，但总不如李安的《卧虎藏龙》城门夜斗，“粒声唔出”的惊险厮杀（衬以心跳似的鼓声）的动人心魄。而由杨紫琼、章子怡两位女演员表现中国男性的、阳刚的一面（相对于周润发饰演的李慕白的道家阴柔），取向与宋词迥然大异，也就特别令人觉得惊喜了。

2002年11月24日

1970年代的文学行动主义

——从《文学七环》谈起

这两年来陆续收到杨康、刘庆鸿、周锦聪、陈志光、宋飞龙等人编的《文学七环》，中文打字，影印装订。据记忆所及，编者曾提过打字的工作是在办公时间抽暇做的“副业”，影印更需眼明手快，在其他同事不曾留意的前提下进行。我估计这份影印刊物最多只印一百份，送给文坛朋友，包括我在内的同道中人。

《文学七环》收录诗与散文/极短篇，水准参差，作品每多奇思妙想，意念颇大胆新颖，唯一些作品似乎善于谋句，缺乏实力谋篇。这份油印刊物使我联想到过去我曾在四间中学，督促华文学会成员编壁报，出版影印刊物。这四间中学先后是霹雳冷甲的拿督沙略中学、金宝培元国中、怡保育才国中与吉隆坡的尊孔国中。联想翩翩，我自己仿似走进时间隧道，回到1970年代的马华文学时空去。

抗衡话语霸权

活跃于1970年代的文学团体包括犀牛、棕榈、鸽、鼓手、人间、天狼星。这些文学团体都是同仁组织，都曾出版成员的个集或合集。（当时的马华文坛，两家华文日报的文艺副刊都被现实主义掌控，现代主义（所谓“现代派”）只能在《蕉风》、《学生周报》、《教与学月刊》等文学刊物找到发表的园地，偶尔在报章刊出的一两首现代诗，作用在点缀，证明园地公开，编者没有派系之见。这情形我想当时二十来岁的我看得很清楚，因此天狼星诗社的成立，一开始便对现实主义的话语霸权采取对抗的姿态。）

1970年代的所谓现实主义，内容粗糙，形式僵固，技巧拙劣，

文艺副刊编辑经常纵容一些作者以不同笔名攻讦、漫骂现代文学，而这些杂文又被美名为“鲁迅式的匕首投枪”，使人啼笑皆非之余又感到十分厌恶。（我决定把我接触到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与港台的陌生诗学带进来，先“传授”给舍弟瑞安，他很快的便把新的文学观念在同学李宗舜、周清啸、蓝启元等人之间扩散出去，在霹雳美罗先成立绿洲社，那是天狼星诗社的雏型。）

瑞安擅于活动，南上北下，一方面与《蕉风》、棕榈、犀牛等文友联系，一方面藉旅行之便物色人才加盟天狼星。（我则就地取材，在学校华文学会发掘有潜力的文学新秀，鼓励他们参加诗社主办的文学聚会，吸收他们成为诗社新血，我和瑞安与继起于1975年的诗社重臣张树林、谢川成、徐若云、沈穿心、洪而亮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文学需要推广，现代主义必须要有一个团队，而且还是可以发挥团队精神的组织，才足以与老旧陈腐而偏又“店大欺客”的现实主义抗衡。）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去检视当年天狼星的作为，发觉当年的诗社是靠自己发明/发展出来的文学行动主义（literary activism）去推广文学的再教育计划，挑战斯时当阳称尊的“老现”。现实主义作者自1950年代至1970年代已建立相当牢固的谱系体制，配合媒体编辑人的控驭，不断因袭与复制同样的主题：小说充满了训诫教诲，散文平板乏味，诗（他们喜欢沿用“诗歌”一词）则像标语、口号，十分散文化、普罗大众化。

1970年代的中国文革运动如火如荼，国内的左翼文学如虎添翼。把两地的政治气候放在一起排比观照看似悖理，走过这段历史的人都清楚中国的政治大环境对所谓“马华文艺界”（老现倾向沿用“文艺”一词，因为后者可以纳入更多政经文教的因素）确乎起着某种牵引的作用。只要看1980年代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马华文坛的现实主义亦随之调低音频，1990年代甚且日愈趋于式微，即可知两地之间确乎存在着某种微妙的隔岸效应。

文学培训的得失

天狼星的文学行动主义大抵如是：首先是广招社员，1973年我们在国内十个城镇成立十个分社，社员逾百人。诗社选择于每年6月诗人节主办文学聚会，自1976年以迄1986年出版了十一期的《年度诗人节纪念特刊》，封面设计是屈原临江的图象，出自不同手笔，或肃穆，或沉哀，或悲苦，三闾大夫的烘托除了有其象征意义外，也能激发社员对诗艺的向心力。另一次聚会则选在年杪学校放长假期间举办。

聚会通常都是三天两夜，以文学常识、文学辩论、限时创作、诗的造型朗诵等比赛培训新人，优胜者可获得余光中、杨牧、张晓风、张爱玲、郑愁予、白先勇、叶维廉、王文兴、刘绍铭等名家的书籍。文学聚会的压轴戏，通常是文学研讨会，由诗社资深社员发表论文，大家提问讨论，我则从旁点评。勇于新的形式与技巧运用的社员作品，都会特别被提出来共同赏析。

1975年11月殷建波赴台并退出诗社，一年后，瑞安、娥真一干人在台北另创“神州”，张树林、沈穿心、孤秋、朝浪、暮静于1976年年杪成立世纪文化公司，以代理/销售港台现代文学书刊的另一种方式维持诗社的活力于不坠，继续推广文学教育。如实地说，天狼星的文学行动主义在张树林的操盘下，渐渐摆脱温瑞安主事时期的帮会风格（瑞安成立“刚击道”，学习空手道，兄弟二十余人，他本身一直担任“大哥”）。树林为人亲和，唯作为一名智囊、一个行动人，他的魄力绝不逊于瑞安。

叶曦先生在1997年举办的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呈论文〈论马华现代诗的发展〉，指出马华现代诗在1970年到1979年期间进入“天狼星时期”（《马华文学的新解读》页294，留台联总），事实上天狼星的影响跨越1970年代，渗透入1980年代马华文学的底层，此点容后撰文再议。诗社于1970年代的十载期间出版书籍十余种，其中以1974年的《大马诗选》与1979年的《天狼星诗选》意

义最显。前者由我主编，收入国内廿七家现代诗，摆明车马不承认现实主义的“散文分行”是诗或诗歌；后者则有凝聚社员力量之效。《天狼星诗选》一共收录卅八位社员的诗作，分平装与精装，在台北印刷，力求美观。天狼星自1969年之“绿洲”起家，于1989年年杪结束，一共出书廿六种。1970年代天狼星的文学行动主义，收获比1980年代丰硕，端在引介西方文学与港台文学思潮兼及作家作品研析方面，用力最勤，用心最苦。陌生诗学与前卫美学一直是诗社的内在引力。

不过，文学创作或文学兴趣，毕竟是相当个人的事。在诗社培训新人的过程中，其间也不能避免地引来一些不快，某种反弹。当年的绿洲分社社长何荣良因瞌睡被我出言揶揄愤然退社，女高音陈凤采（今日是执业的西医），则因半夜被叫醒参与文学会议而不满诗社地狱式的文学训练。她是陈徽崇老师的高足，睡眠不足可以伤害嗓音，也难怪她会不悦。其他类似事件，以今日的后见之明，在在显出诗社当年的文学训练有操之过急之嫌。

回头看《文学七环》，它不定期出刊，陆续有新人加入写作的阵营。方法温和，策略缓进。与天狼星当年的激进强烈，作风迥然大异，唯《文学七环》诸君子处于廿一世纪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风起云涌的当下现实，温和渐进，持续保温，并且锲而不舍，可能才是明智之举。他们要面对的已非曩昔的现实主义，而是庸俗化、趣味化的通俗主义（secularism）对于文学信念，无声无息的稀释与蚕食。

2003年2月9日

1980年代的文学扎根工程

——天狼星诗社的角色扮演

1980年，是天狼星诗社挥别1970年代的第一年，论者每每认为诗社的力量肇端于1970年代初，到了1979年11月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把第二届文学奖的团体奖（马币两千元）颁给天狼星，诗社从发轫到绚烂，整个周期便算完成。其实这是“想当然耳”的臆测之词。

史迹斑斑，文献可征。1980年代3月我与蓝启元、谢川成编的《愤怒的回顾：马华现代文学21周年纪念专册》，以廿一岁为成年人的视角审视现代文学在诗、散文、小说三方面的成绩。我们也以面谈与笔谈的方式访问了姚拓、钟夏田、王润华、郑良树、吴天才、李锦宗、杨升桥、陈徽崇、叶曙、宋子衡等十位文教界人士，由他们发表对现代文学的意见或看法。

1981年年杪，天狼星与陈徽崇领导的“百聆合唱团”把现代诗谱曲制成唱片卡带，我撰写的〈惊喜的星光〉成了诗社社歌。一个文学团体有自己的社歌，这是组织强化，艺术探索多元化的明显趋势。程可欣、林若隐、廖牵心、胡丽庄、吴缓慕后来也为社友的诗作谱曲，格调走的是校园民歌的路数，与徽崇兄的艺术歌曲不同，唯现代诗的可诵可唱，确乎有助于诗的传播与感染。1982年，我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语言文学组主任的名义，邀请台湾的余光中来马在三春礼堂演讲，演讲过后的特别节目，是男高音陈强嘉唱张树林的诗《记忆的树》，程可欣姐妹以吉他伴奏吟唱余光中的名作《风铃》。当时在场的文协听觉艺术组主任声乐家邱淑明，亲口向我表示，她相当喜欢这种别开生面的诗的发表方式。

资源互补的结果

我之所以加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并于1982年3月成立霹州分会担任主席，由谢玉麟校长担任副主席，正副秘书长由张树林、谢川成领衔。因为年近四十的我，逐渐看出诗社的结构性缺憾。诗社成员大多是学生，经济能力太弱，作为一个文学团体，它可以发展拓宽的空间已臻极限，天狼星要能突破，非把力量注入另一个规模庞大、人力物力充沛的社团不可。但我无意解散诗社，反而借助文协、天狼星两方面的资源互补把一些活动办得更有声有色。1981年谢川成荣获文协总会颁发的文学评论奖，1982年天狼星二度夺得文协总会颁发的团体奖，同年张树林获得文协总会的诗奖，1984年谢川成又获文协总会诗奖，如果“作品本身是最雄辩的”，那么1980年代上半叶的诗社成员确乎以他们的作品，证明他们的诗艺表现不俗。

上文谈1970年代的文学行动主义，特别凸出诗社编纂的两部诗选，一为出版于1974年的《大马诗选》，一为1979年的《天狼星诗选》，我忘了提1978年出版的《大马新锐诗选》（张树林主编）。新锐诗选的纂编作用有二，一是填补《大马诗选》的可能遗漏，像年纪比我大、出道比我早的澳北羊便是一例。而且从1974到1978年的五载，正足以构成诗的新一代，像林燕何、沙禽、张锦忠、郑玉礼、何荣良、林秋月、冬竹、蓝薇、郑荣香、沈穿心、谢川成、陈明发……等廿三位诗人必须要有另一部诗选容纳他们。

张锦忠于〈典律与马华文学论述〉提到：“散播现代主义理念的文化人，尽管心存典律焦虑，在典律建构方面的努力，显然不够全面。”（见《马华文学的新解读》页232，留台联总，1999），他的判断说中了一些事实：首先是《大马诗选》与《大马新锐诗选》收入五十家诗，唯基于各种因素，白廷、叶曼沙、何乃健、陈政欣、黄远雄等五家诗始终未能一网包罗，这是一大遗憾。其二是在我担任文协语言文学组主任期间，虽然竭尽所能希望能编出一套四

册的《马华现代文学选》，唯是项计划先受阻于文协理事会，我被指示把书名《马华现代文学选》改为《马华当代文学选》。一字之别，编纂选稿的方针却不得不修正。1984年、1985年文协先后出版了文选的小说与散文部分，却因经费支绌无法出齐选集的诗及文学评论部分，成了张锦忠所指陈的“未竟之功”的佐证。

校园文学风行十载

遗憾的不仅是这些，1984年是马华现代文学运动的廿五周年，文协霹州分会在怡东大酒店召开〈第一届全国现代文学会议〉，分诗、散文、小说三组，邀得六十位作家参与其事，为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的成绩与未来发展作出估衡，勾划版图。可惜两天的会议各组整理出来的报告都是急就章，无法像《愤怒的回顾》那样可以纂编成书作为文献。选集的编纂与会议的举办都是现代文学的扎根工程，成果都不够理想。

文学会议沦为“表面风光”之后，我们嗣后在邦咯岛、安顺、金马岩等地举行的文学聚会，便不再邀部长开幕，而强调会议的内容实质，并邀得文学界的友好包括永乐多斯、陈应德、傅承得、祝家华、沈钧庭、潜默等助阵，提呈论文，发表演说。这个阶段的诗社新一代成员包括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张婧好、张允秀、郑月蕾、张芷乐、游以飘、吴绥慕、袁钻英、丘云笈、陈神铭、廖幸心……等廿余人，他们陆续在国内报章文艺副刊发表作品，文学的须伸向四方。

在社会网络的联系上，树林的能力远比我强，我带进来的大多是我的学生，树林则广结善缘，把蓝薇、冬竹、飘云、川草、许友彬、绿沙、朝旭、风客、千帆、亦笔、李木真、蓝雨亭、林添拱、叶河、叶瓦、桑灵子、雷似痴、陈强华、黄英俊、淡灵、弋湘月等人引介入天狼星。文学扎根的根有多深，殊难衡测。上述社员（前社员）今日是四十岁上下的少壮派，分布于各行各业，当中以

服务于教育界与媒体者人数最多。

较易衡量或评估的是1985年添拱、可欣、若隐、一翔、允秀、婧好等先后进入马大深造，与马大一群朋友包括骆耀庭、陈全兴、潘碧华、庄松华、林云龙等的文学因缘。他们联手成立了“马大文友会”，1985年成功举办了第一届的“文学双周”，后来这项节目还成了中文系的常年活动之一。从文学扎根到文学深造，若隐、婧好等六人的努力，功不可没。文友会的成立掀起校园文学之风，从1980年代中叶的初绽一直延续到1995年才出现力弱退潮的现象。校园作家出了数十本书，有些是大专文学奖的佳作合集。

谢川成的努力重点在穿针引线，联系陈石川、潜默、张锦良进行《多变的缪斯》的中英巫三语翻译，并在1985年6月6日诗人节推出。这部三语诗选可谓马华文坛的创举，川成是以另一种方式为马华现代文学扎根，经营筹划过程艰苦，希望这部三语诗集能在国内文坛引起他族人士的关注。

1988年川成出版诗集《夜观星象》，1989年5月潜默出版诗《焚书记》，同年8月川成的学生谢双发自资印行《江山改》，唯1989年11月杪我远赴吉隆坡尊孔国中教书，诗社力量终于星散。

诗社的式微，除了社员就业，兴趣转移、婚嫁诸问题外，我想1980年代中叶我不再担任《中外文学》的顾问（我于1974年被委为该刊东南亚编辑顾问，从1974年到1985年一直获得台大外文系的赠书），使我突然与台湾文学思潮脱节是一肇因。中国的顾城、海子、杨炼……我那时还未能习惯汉语的另一种感性表达。我向社员介绍杨泽、罗智成，而没能看出“蔷薇学派”与“鬼雨书院”的局限。1988年台湾解严，文学变天，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论述等都与我擦肩而过。当我再不能把陌生诗学和前卫美学携给年轻的一代，我的社员离我而去，我自己则舍弃了文学。1988年到1992年我留意的是社会趋势，在报章写“特约评论”，表面声势仍“显赫”（一

笑)，事实上是自己的文学细胞已濒死亡，我的文学复苏是1997年后的事。

2003年2月23日

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研讨会侧记

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中心连同新加坡作家协会，于2月22日至23日举办“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会议分八场，两天内总共宣读论文三十四篇，时间十分紧凑。除了中台新马四地的学者、教授、作家外，《香港文学》总编辑陶然、泰国华文作协 Kriangkrai Setthavong 医生、汶莱女作家王昭英、菲律宾《商报》编辑李勇与日本立教大学副教授舛谷锐都前来参与。台湾的李瑞腾、王润华两位教授发表专题演讲，来自台湾的还有陈鹏翔、张锦忠、黄锦树、陈大为、钟怡雯，马来西亚受邀的是戴小华、傅承得、谢川成、许文荣与许维贤。研讨会两位联合主席，新大的吴耀宗博士与南洋理工的许福吉博士亦分别提呈论文。较为特别的安排是两名新大博士班候选人朱崇科、南治国都在台上亮相，让我们有机会聆听到年轻一代学者的看法。

时间那么紧，参与者实不可能听完八场演讲，本文也只能记下些花花絮絮。笔者的论题是〈当马华文学遇上陌生诗学〉，阐释马华文学自1960年迄今四十余年的历程中遭遇到的港台欧美各种陌生诗学以及国内作家的回应，探讨“文学迁徙”(literary transference)的“在地转化”(local transformation)的状况，文长连附注约八千五百字。不过我无意在此为自己的论文着墨，我想谈的反而是会议空档间中的小插曲。

我在第五场宣读论文后，来自中国厦门的博士生孙玲玲，在饭桌上问我“流放情境”与“文化乡愁”会不会是作者的自怜想像，虚构出来的一种书写策略。我回答她“因情造文”固然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唯历代的诗人墨客“因文造情”篇幅亦浩繁。她的博士论文是《三毛与尤今的飘泊话语》。三毛是1980年代风靡一时的台

湾女作家，尤今于1990年代颇专心于旅行书写（travel writing），两者当然可以比附参照。话讲开了，我忍不住在离开饭桌前说了一些自己的感想，那就是尤今的人生态度乐观旷达，大抵可谓表里如一；三毛表面活泼亲切，内心却孤寂凄苦，“人格分裂”。她喜欢与朋友玩占卜算命，用灵魂钱推测自己的命运，这些举措在在显示三毛的缺乏安全感、需要安全感。研究三毛与尤今，似乎不能不注意外在的移徙（漂泊的一种方式）与内在无尽的漂泊其间的层次与意蕴。

来自法国的另一位念比较文学的博士生Claude，与我闲聊时向我抱怨，他赶了好几个场次，主讲人讨论的议题十分多元，但就是没有人提及“电影”与“戏剧”这几个字眼。我的〈当马华文学遇上陌生诗学〉亦仅提及贝克特（Samuel Beckett）与伊涅斯高（Eugene Ionesco）的荒谬剧，与这两位大师的荒谬诗学（poetics of absurdity）对1970年代的马华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启示，但我并没进一步申论马华文学的戏剧状况，也没论及马华戏剧的荒谬成分或情节与法国荒谬剧有什么关系。面对这位三十多岁留着胡髭的年轻人的怨怼，我真的有苦难言。马华的现代诗、散文、小说以及今日“流行”的极短篇都有荒谬剧的蛛丝马迹，就是我们的戏剧一点也扯不上。我们拥有的戏剧文本多为广播/播映而写的通俗剧，搬上舞台的多是曹禺写于二、三十年代的作品，《雷雨》、《原野》、《北京人》……是中国剧作家的心血，并非马华制作。至于电影是不是文学的一个类别，有待商榷。如果三十四篇论文当中，有人讨论蔡明亮的戏剧，相信较能满足这位法国学生的愿望。Claude的华语讲得地道，语音的把握可能比日本学者舛谷锐还标准。

主办方局派给我一项“特别任务”，第一场研讨会由《新明日报》总编辑杜南发主持，第二场则由我负责。四位主讲人读毕论文后，一名听众，会计师兼小说家唐正明向我询及东南亚诸国文学

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的问题，她的箭头指向我，要我这个主持人回答。她的问题不易回应，因为它不能单单从文学的角度考量，还要审度东南亚各国不同政经文教环境才能找到答案。首先，“东南亚”（South-east Asia）是二战后英国为了堵住美日势力扩张的战略区域。英美两国表面亲如兄弟，涉及政经利益的节骨眼，彼此仍会寸土必争，“当仁不让”。二战之前，只有“东亚”、“南亚”的称谓，美国于战后大力扶植日本使它迅速复苏，有损英国的战略利益。回到东南亚诸国的情况，这个地区华裔人口可观，同文同种，自有其不辩自明的同质性。不过东南亚各国国情不同，在地的条件不一，文学创作的内容、风貌自然迥异。像汶莱一地，几十年来只出版了二十多部散文杂文，谈不上文学规模。印尼于1967年苏哈多上台，迅速关闭了一千八百多间学校，造成三十多年的教育/文化断层，泰国的华文文学也有后继无人（或乏力）的现象，“再现”（re-present）于各自的文学作品里的内容，从题旨到处理的方式自然大异。

我真的很想也谈谈新加坡的英语独大政策，把华文边缘化所造成的伤害。但一想到自己人在新加坡，新大、新加坡作协是东道主，恐怕有些不便，就按捺着不说。如果允许我畅所欲言，我甚至想指出这一届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义务工作人员几乎都是来自马来西亚目下在新大中文系念书的学生，国立新大中文系相信也有不少新加坡子弟吧，但他们大多不热心，也无意协助，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说出来就伤感情了。在结语时，我对唐正明说，文字/语文可能是作家/诗人最后的栖身之地，东南亚诸国政经文教条件虽然各异，唯血浓于水的同质性仍会以某种隐性的方式流贯着。

这趟赴新，遗憾不少。每场研讨会过后便得赶洗澡、乘坐巴士到不同地方用餐，与来自各地的学者没什么机会交谈，更不必说交流。我与苏州大学的曹惠民教授、山东大学的黄万华教授与南京大

学的刘俊副教授闲聊了几句，虽然是极短暂的交会，也可以感觉到中国学者与台湾学者所用的文学词汇相当不同，而马新两地的学者在文学术语与发声腔调（enunciative tone）方面却过于近似，以我现在的心态（学术倾向？），我反而更想向中国取经。

就论文的质量而论，这届研讨会，台湾、新加坡两地的论文从内容到形式，总的而言要比中国学者强许多。新台两地学者具有双语（bilingual）背景，较能灵活运用西方文学理论；中国学者一来囿于资料不足，二来囿于中文系的“国学训练”，立论小心，见解就缺乏新意了，但他们后势强劲，不用三、五年，就会赶上来。衍变自中国文学理论传统的词汇或可改善台式硬译自西方（往往别扭古怪）的术语，而使评论文章可读性高些，多点人味，不致沦为“专家的谜语”。

2003年3月9日

幻想与想像

——南洋书写内在的辩证性

王润华教授甫卸下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务，即接聘台湾元智大学文学学院院长一职。二月中旬，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中心联合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办“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年东南亚国际研讨会”，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李瑞腾教授的专题演讲主题是文艺生态学，角度新颖十分精彩，可惜没有分发讲稿，不敢妄作评议。润华兄的专题论文是〈重新幻想：从幻想南洋到南洋幻想——从单元的中国幻想到东南亚本土多元幻想〉。研讨会过后在返回吉隆坡的飞机上把文件夹里的讲稿抽出来再读一遍，觉得文章可供反思的空间很大。兹不揣谫陋，把是篇论文置放在马华文学的场域里作些比较参照。

幻想与想像

“南洋”认真来说是一个十分含糊的地理泛称，虽然它比陶渊明的《桃花源》，李汝珍《镜花缘》的女儿国、君子国，Thomas Moore的《乌托邦》（Utopia）较有地域实质。新加坡过去有南洋大学，马来西亚有年貌悠久的《南洋商报》，唯“南洋”作为一个区域实在疆界难分。许云樵教授在《南洋史》尝谓：“南洋者，中国南方之海洋也。在地理学上，本为暧昧名词，范围无严格之限定。现以华侨集中之东南亚各地为南洋。”王润华也了解“南洋”一词的空泛，在他的《南洋乡土集》里，他说：“南洋这个区域地名，早已在世界地图上消失了。”有趣的是，王润华虽然明知南洋的消失，却仍以南洋的树木花草写了不少颇堪吟咏的诗与散文；南洋的各类花卉果类是润华兄重要的创作灵感源泉。

在《重新幻想：从幻想南洋到南洋幻想》一文的第二段，王指出：“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幻想或想像（imagination）被诠释为创造高等、严肃、充满情欲的诗歌的心智能力。想像往往把东西溶解、消散、扩散。然后重构、创造……”这段论述把“幻想”（fantasy）等同于“想像”（imagination）。根据 Longman 当代高级辞典，fantasy 的定义是“幻想，胡思乱想”，Oxford 现代辞典的定义是“幻想，狂想”，英文的释义是 imagination especially when extravagant。是柯立基（S. T. Coleridge）于《文学传记》中提到的第二种想像力才能“将事物溶化、扩散、分解，然后再创造”。艾略特曾经说，是诗人的想像力，才能将牛排的气味，打字机的噪音，玫瑰的芳香，和读史宾诺莎哲学等毫无关系的经验综合成“统一的经验”。当我面对南洋书写时，我毋宁相信这些作者运用的是他们活泼恣肆的想像而非散漫无根的幻想。

南洋热带雨林 vs 马来西亚胶园

就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发表的作品来看，近两年以林健文的双南书写最勤。他的南洋系列，以年载为经，以事件为纬，从 1957、1965、1969、1975 写到 1985，每则诗作篇幅可观。长诗《叶亚来》以华人先贤入诗，用的是史的架构，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陈大为那一系列“南洋史诗”。《文艺春秋》曾编过两期的“马六甲文学导览：六月诗情，古城行脚特辑”，发表了方路、傅承得、小曼、刘育龙、赖碧清、杨嘉仁、梁靖芬、庄若、曾翎龙、林健文与我本人的作品与新加坡方面的蔡深江、盛惠龄、向明、希尼尔、葵盛等人的南洋记忆书写，篇幅可观，是编者与作者共同经营的成果。

上述作者有些从历史事件着墨，有些从古迹的受到破坏，古迹变成旅游景点的商业化、庸俗化切入，一些则今古对照，个中蕴藏深意，一些则借古人酒杯浇今日忧患之块垒，由于这些人物、遗

迹、历史记忆的真实性（当然经过了艺术处理的真实），它们应该归类到“本土性”、“本土意识”那个范畴去，还是放置在容量较大，界域模糊的“南洋书写”里才较妥贴呢？

相对来看，像李永平的《乌鸦与太阳》、《拉子妇》、《一个游击队员的死》，张贵兴从早期的《赛莲之歌》到近期的《群象》、《猴杯》，黄锦树的《乌暗瞑》、《M 的失踪》、《鱼骸》，黎紫书的《天国之门》、《山瘟》，梁放的《龙吐珠》，徐仁修的《赤道无风》，南洋的赤道雨林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场景，就像曹禹的《雷雨》里头不时爆响底雷声一样，是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华人南徙的移民经验，华人与森林里原住民错综复杂的关系，华人的边缘政治命运，热带雨林仿似一个幽邃、神秘、令人颤栗不安的舞台，让各种恩怨情仇、矛盾挣扎得以演出。

李永平、张贵兴笔下的婆罗洲雨林，里头尽是奇花异草，飞禽怪兽（《群象》里漫山遍野的巨大蜥蜴令人阅后难忘），砂共的武装斗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黄锦树把南洋热带雨林写成马来半岛的胶园。前者象征性较浓，后者较具体实在。雨林与胶园均阴森可怖，茂盛葱郁而又危机四伏。日治时期的屠杀，马共的被围剿，印尼非法移民与歹徒的活动……可在婆罗洲丰饶的雨林下进行，亦可在苍翠的胶园内发生，重要的差别是，黄锦树似乎刻意以实体的马来西亚取代空泛的南洋，以创作实践贯彻他的文学断奶主张。陈大为曾坦言：“我从来不处理马来西亚的现实”（见《星洲日报》《新新世代》，1999年10月24日），黄锦树不太可能认同陈的书写策略。不过，文学创作本来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别人怎样想对作者并不重要。

陈旧的双南？

就南洋书写而论，不管出自幻想，还是源于想像，不管这想像

是积极的 creative imagination 还是消极的 perverse imagination，本

土作家与陈大为同齡的吕育陶早在1999年10月24日的一项“旅台与本土作家跨世纪座谈会”上，即曾提出过他心中的困扰：

“我们可以不可以写些比较现实的马华的东西，来作为一种身份的定位……我们来来去去写马共或是一些陈旧的南洋。”当时陈大为的回应是：“根本的原因是你要把南洋写好，人家才理你。”“人家”是谁？是中国还是台湾的文学界？“人家”是“中心”的代称吗？陈没有进一步申论。

另一位本土诗人周若涛最近亦提出疑问：“我们大量反当‘南洋’记忆，是否我们别无他物，在我们的书写背后没有其他灵感与情感想像，书写之所向也没有更辽阔宏大的视野？”（《星洲日报》〈不同凡响〉专栏，2002年11月29日）

我想写了多篇南洋系列的本土作家林健文不会觉得南洋“陈旧”，以史诗的想像来建构南洋的陈大为也不可能认为南洋“陈旧”的。南洋书写内在的辩证性，或可说明王润华在“幻想”与“想像”摆荡而终于把它们等同起来的心理因素。

2003年3月23日

混沌理论与文学联想

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科学发现，分别是相对论、量子力学与混沌理论（Theory of Chaos）。我对后者特别留意，早在1995年便托在英国念书的邱美爱小姐替我找这方面的资料、书籍。就我看，不仅气象的变化，政经的动态，甚至文学的衍异，都可从混沌理论的角度切入观察。

自然生态的不寻常现象：从蝗虫的大量聚集，龙卷风、地震、海啸，在未能预先测知的情况下突然发生，到气体的不规则形态，甚至湖面的漩涡或涟漪，到天上飘下来的雪花，都与混沌理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蝴蝶效应

混沌理论的研究，大概可以追溯到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劳伦兹（Edward Lorenz）的重要发现：“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在北京上空出现的一只蝴蝶由于双翅振动，干扰了大气层的内在平衡，这种不平衡逐渐扩大，随着气流的移动，竟然在一个月后形成纽约市的一场暴风雨，用混沌理论来说明，那是“输入”（input）的极微小差异可以造成“输出”（output）的巨大差异，这现象是“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sensitive dependence on initial conditions），中国古语如“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说是“蝴蝶效应”这个科学术语的文学版，后者甚至诉诸动作，颇为形象化。在文学作品里，如果起始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那么整阙词的调门终不免是困怨的流露；反之，如果起首句是节奏快速、情绪奔放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则整首诗跌宕纵横，一股不羁的豪气逼人而来。

“好的开始成功了一半”，诗、散文、小说莫不如是，起始句发挥的作用，许多时候超过了引起动机，而更像整阙文字组成的乐章都得敏感依赖的定音鼓。

蝴蝶效应只是混沌理论最为人知的部分，科学家要考量的因素远比蝴蝶效应深刻复杂。比如说天上云絮的变化，白云苍狗，一般人都不太可能把它视为观察与省思的对象。美国物理学家费根柏（Mitchell Feigenbaum）于1970年代初曾频频乘坐飞机，透过机上的窗口，研究与思考云絮变化的成因。附笔一提的是，由于费根柏乘坐飞机过于频繁，1975年美国当局决定撤消费根柏作为一名科学家的飞行特权。

必须指出的是，蝴蝶效应也不尽是破坏性的，它也可以创造。漫天飞舞的雪花，从洪荒的天穹飘坠到地面约一个小时的历程中，决定它的六角形晶体主轴的枝桠开展形状的是起始的气温、湿度与空气里的杂质。没有一片雪花是完全相同的，因为它们坠落地面前所经历过的气候条件不可能一模一样。每一朵雪花都有自己的来历与身世。

流动与奇异引子

谈混沌理论亦不能不注意“流动”（flow）这个词。对一般人，“流动”只是一个平凡的动词或名词，对混沌学家而言却是一门大学问。“流动”是形态加变化，迁徙加形状（flow was shape plus change, motion plus form），这是柏拉图的概念，现代物理学已不满足于这样的定义。为什么把牛奶倒进红茶里，由于杯中红茶热度不同形成的漩涡与图案会这么不一样？为什么火燃烧时外形总是跳跃着，上端出现不规则的摇摆像一匹兽在张牙舞爪？炊烟上升要到达什么高度（假设周围环境静定无风），它才脱轨散开？古典物理学一直不太重视时间与空间可能出现的某种形状，对移动的内在酝酿着的另一股移动力量的牵引（我想起的是中文里常用的“暗流涌

涌”）也缺少关注。

不要以为上述问题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世界某些重大的而突然的变化，包括资金的流动，整个股市的浮沉或某只股项在没有任何促成因素的情况下暴升或暴跌，甚至人类社会每隔一个时期即陷入的集体性疯狂，像犹太人的被集体屠杀、文革十年浩劫，都可以在混沌理论里寻得答案或启示。蝴蝶效应开始的那一点轻微的翅膀扇动，费根柏称之为“奇异引子”（strange attractor），从生物性的律动如心跳脉动、脑波的频率，交通流程到某个饱和点变成的交通阻塞，到瀑布下坠到关键性的一刻碎裂成水花，都与“奇异引子”有关。

原创性与疯言狂语

笔者关心的仍是文学。我从波赫斯（Borges）的《沙之书》看到了混沌，波赫斯买到一部可从任何一页翻读、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书。现代主义最重要的其中一位诗人波特莱尔（Baudelaire）耽于酒色，混沌恍惚，终于写出《恶之花》。李白与苏轼一流的诗同，大多都在醉酒后的混沌状态，摆脱知性的约束，一挥而就的佳作，从“云想衣裳花想容”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莫不如是。那波可夫（Nabokov）在《符号与象征》一书里说：“成熟而具原创性的杰作，可能看来像疯言狂语”，他的判断使我联想到的第一个人便是鲁迅。

鲁迅的《野草》，许多篇章描绘的是精神错乱的情节，故事的诡谲怪异非常理可以言喻，虽然鲁迅以梦作为引子，以掩饰背后的动机，唯文章处处可见的是紊乱、倒置，光怪陆离。

以鲁迅语文的精湛造语，他在《影的告别》一文里，竟然可以写出这样的句子：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併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

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一连串的“然而”式句子，已故夏济安教授很早即曾指出这样的句子“打破了文言文和白话文的‘雅’字诀”。余光中尝谓“语言表达的含混往往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含混”（大意如此），不过**鲁迅的语言出现 chaos，是意义欲言而未能言（或未能尽言）的边缘颤抖状态，是美学的 aporia 状态。**“欲言而未能尽言”与道家的“言无言”的空白诗学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说“然而”一词是这个句子的“奇异引子”，而混沌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因为它让我们了解“乱中有序”的道理。

苏东坡对自己的写作，有一段广为后人引录的自述：“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不择地而出可以造成混沌之前的动荡不安（turbulence）；随物赋形，则可以跌宕激越，姿态横生。既混沌，又有序，至颐而不紊，近乎林语堂所谓的 **studied disorder**。混沌学与文学可以贯通、联系的当然不止上述数端，限于篇幅与个人学力，仅能点到为止。

2003年4月6日

马来西亚商贾与中国商机

踏入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努力与成果逐渐赢得国际肯定和马来西亚华商的注意。人们开始留意中国市场，并作投石问路式的投资，一些华人政党领袖甚至催促马来西亚华商把握先机，因为再过三五载，其他地区包括欧美、日韩台及东南亚国家都会登陆神州，那时才和别人竞争，恐失之交臂。

马来西亚华人在1980年代中期蜂拥前去中国重访祖居探问故旧，蔚然成为一股热潮。国内几家华文报章每隔三天就有大陆行的报道；老实说，这些文章我没几篇读得下去，这不是文笔的问题，而是内容千篇一律都是美丽的山川河嶽、亲切的风土人情，像我这种凡事都想从现象的后面探究真相或讯息的人来说，这些书写实在太公式化、太乏味了。

1989年天安门事件使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国重新感到恐惧、疑虑。至少有两年时间，马来西亚华人，尤其有意在中国投资的华商，都在密切关注中国领袖的言论和政治动作与整个国际大形势的变化。最后大家都看出改革开放是疾行的列车，不是几个极左的老头拦得住的。1992年开始，马来西亚华商投资中国市场渐增。奇怪的是，这些经验丰富的商人大部分都铩羽而归，有些受了硬伤退回马来西亚后一蹶不起，有些是亏了钱但是还不致伤了元气。我从事的业务谘询工作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当中以商人居众，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埋怨：“**中国这个市场是个龙潭虎穴，搞不好，连命也不保。**”

中国市场不好搞，当然不是因中国地处马来西亚之北，风水不利酿致，而是法律制度与马来西亚不同，人情应酬没完没了。从政府高官（他们通常也是党的干部）到值勤的公安，都得上下打点，

而且到头来还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与中国有关人士洽商业务，对方表示要“研究研究”，脑瓜子转得快的马来西亚商人马上奉上洋烟洋酒（“研究”与“烟酒”谐音），但拿了烟酒红包并不等于事情就能办好，肉包子打狗有去没回的事例多的是。

笔者与常到中国开拓书籍市场的大将书行总经理傅兴汉谈起上述现象，他认为这也不能完全归咎中国有关人士大小通吃，马来西亚商人以为中国人没见过世面，容易“搞掂”，因此过于“轻敌”，好些企业投资本来要通过正常法律程序，按部就班去申请办理，耗时一两年，他们觉得那太费事了，不如抄捷径，花些台底钱透过关系瞒天过海，以这种方式涉足中国商场反而容易中了地头蛇专为这些人设的圈套。

也许情况比我们想像的还复杂、严重，马来西亚好些太平局绅、拿督、丹斯里（马来西亚皇室封衔）级的商场老将同样在中国摔得脸青鼻肿。有些由马来西亚注资的公司顺利成立，业务营运良好，一两年下来，马来西亚商家觉得可以从中国员工中擢升有领导能力者，提供训练，授以机宜，他们自己则退回马来西亚老乡继续做自己的生意，中国方面的业务由自己甄拔、培训的中国籍亲信管理。人回到马来西亚，开始一两个月联系正常，三四个月下来电话传真渐稀，半年之后人都找不到，这些拿督、丹斯里感到不妙，急忙前去中国查看，才惊悉自己的工厂不知什么时候已关门大吉，更令他们震动的是毗邻不远却冒出另一间改了名的工厂生产同样的货物。前去探询，发现从总经理到营业主任正是当日自己一手栽培出来的队伍，气得几乎晕死过去。去理论去交涉甚至告到公安和有关部门去，到头来都是不了了之；失去的东西是拿不回来的。

愈是有身份地位的人，愈是不想别人知道自己的投资糗事，因为这肯定有损自己几十年来在马来西亚商场上建立的良好声誉，大部分“伤残人士”都宁愿哑子吃黄连。由于事情被低调处理，媒体甚少报导，因此马来西亚华商对中国仍充满近乎天真的乐

观，十三亿人口、刚入世贸、申奥成功，看来中国处处是商机。这类“北进想像”可累倒、拖垮不少不了解中国市场性格的热心投资者。

有些中国人真是不好惹的，熬得过十年文革的中国人不仅生命力极强，而且懂得“扮猪吃老虎”，以憨直、朴拙甚至带点愚昧的形象（面具），轻易解除掉马来西亚商贾的心理武装。文革经验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不少中国人的人性，他们眼里只有钱，没有感情。一些乡情最浓的福州人、海南人、潮州人一样在中国被同乡讹骗。

中国有四点二亿贫穷人口，大家都想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崇尚中产”（midcult）的社会风潮正席卷全国，而增长中的中产阶层正是马来西亚华商的行销对象；但在假货、赝品、翻版商品泛滥的中国，马来西亚商家要在彼邦立足，真是谈何容易。

《亚洲周刊》，2002年2月25日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久旱逢甘露

农历新年前后，整整两个月，马来半岛干旱无雨，气温在摄氏三十五度至三十六度上下，大家都毛躁得寝食难安。就在这关口，马华公会——马来西亚执政的国阵成员党——突然宣布拉曼大学将在今年6月17日开课，分八个科系，包括备受华社关注的中文系。前马来亚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洪天翔教授、华研中心主任林水椽博士（前马大中文系副教授）已应允加入拉大中文系的师资阵容。刻在新加坡大学任东亚研究所所长的王庚武教授，是拉曼大学首任校长或副校长的热门人选。

消息于2月27日见报，吉隆坡当天下午下了一场豪雨，冲走了不少溽暑的躁气。雨停后，街头巷尾冒出许多小市民议论纷纷，都说马华的龙头林良实英明神武，公私兼顾得恰到好处。他为华社作出一项巨大的突破，为自己添了不少功德。在公与私的灰色地带，马华党选将于三月开锣，从各地的支会、区会一直打上去。报载拉曼大学成立之日，首相马哈迪将亲临主持开幕，六月份党选也恰于此时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这是林良实与马华署理总会长林亚礼的世纪大战，拉曼大学如顺利开课，时机上非常巧妙地为前者头上罩上一轮光环，有造势效应。当然这也可能纯属巧合。

马华总秘书陈祖排博士宣布拉大中文系主要以华语授课，一部分学术研究则需用其他语言媒介进行。他的谈话使我很自然地联想到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现状。

全国共有十五间大学，只有马大拥有自己的中文系；博特拉大学（Universiti Putra）外文系辖下中文组课程包括翻译、商业中文、时事中文，性质比较特殊，暂且不论。我要指出的是马大中文系目下主修生三百余人、副修生两百余人。五百多名学生的一个系

却只有七位老师，包括五位副教授、两位讲师。师生比例之大，可谓罕见。每位老师每周授课十余个小时，要改要看的作业堆积如山，忙得不亦乐乎。马大中文系原来有十位老师，一人休假，另两位讲师分别取得奖学金，暂停教学全力攻读博士学位。系方争取新的讲师、助教以纾解压力，上头就是延宕著不积极处理，中文系只好在师资荒的水深火热中干耗着、折腾着。

其实马大中文系早就该添新血了。我从中文系毕业特刊核查七位在职师资的学术背景，发觉他们是文学学、语言学、语法、民俗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宋史、戏剧的专家，却没有熟谙《诗经》、《楚辞》、《汉赋》、《史记》、《左传》、唐宋古文以迄于明清及近代/现代文学这方面的专才。成绩优异的中文系研究生如果要以韩柳文、公安竟陵的笔记小品、刘鹗老舍、萧军萧红为主题或人物撰写他们的硕士、博士论文，找谁做自己的指导教师呢？来来去去只有那七张熟面孔。

马大中文系有过辉煌的历史，名教授傅吾康、钱穆、王叔等曾先后在这儿任教。马大中文系的另一问题在于它的高度混杂性：举凡中国哲学、历史、宗教、社会现象、政治问题、文字语法都挤进中文系的课程，它的文学分量——从中国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反而相对薄弱不堪。它又不是汉学系，与台海两岸的中国文学系课程安排差别甚大。大二、大三的学生为了修足六十个学分，得用四分之一的的时间以马来文作学术研究。政府办的大学情形如此，民办的拉曼大学中文系也以“部分学术研究将以其他语言为中介”，就难免令人杞忧了。

马大中文系不健全的措施是：硕士与博士生只能选择用马来文或英文（而不是用中文）来撰写毕业论文。这种安排最要命，中文系被这么一搞就变成“四不像”，好些在籍学生或研究生，中文造诣反而逊于马来文的掌握能力。除了天资特别聪颖、对中文又特别用心的学生，一般而言，马大中文系学生的中文水平

实在很难与两岸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的同侪相较，这并非马来西亚华人子弟“智不如人”，这些学生都是经过“固打制”（种族配额）汰选的精英，是整个大环境与在地条件，使这些在大学先修班考试表现标青的学生先天地受到制衡剥削，以致不易在中文的学术领域出类拔萃。

我们祝福拉曼大学于马年“马到功成”，也希望有关政党不要把焦点都聚在拉大，而忽略了处境危殆、艰苦甚至尴尬的马大中文系。让“一鸡死一鸡”的现象出现，肯定是文化、政治的双重短视。雄才大略如林良实，相信对这种形势洞若观火，并且成竹在胸。久旱逢雨恰值喜讯宣布，吾人宜乎以吉兆解读之。

《亚洲周刊》，2002年3月11日

马来西亚华文高教沉痾待治

今日马来西亚的华文高等教育，实在已来到一个不得不检讨的阶段，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修生、副修生总共五百余人，讲师、教授却只得七位；马大语文与应用语言学系辖下中文组，学生三百三十多人，仅有三名讲师。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师资二十七人，比马大中文系多出四倍。香港岭南大学的师生比例目前是一比十六，该大学校长陈坤耀教授想将这比例调整到一比十一左右（见《亚洲周刊》第16卷10期），目前马大语文与应用语言学系中文组的师生比例是一比一百一十，这么高的比例，大可跻入健力士世界纪录之林。老师负重之沉重，可想而知。

林语堂早年说过：“教三十人易，教一千人难。”面对一大群学生，个人有力竭之时，林博士建议用蒸馒头之法“一筐蒸来两百只”。林语堂的幽默中透着苦涩。教学生有如养鸭，今日的养鸭人处境更恶劣，因为鸭子实在太多，难以兼顾。

鸭子的譬喻是林语堂的，笔者在这里挪用，希望在籍教师与同学勿以为件是幸。林博士的比喻虽然有些不敬，用心却良苦。马大有一特色，周一到周四，校园里熙熙攘攘，热闹得很，但是一到周五，学生走了一大半，周末只剩下小猫三两。学生对安排在周五周六或星期天的各种活动大多兴趣缺缺，他们周四下午上完最后一堂课便赶着回乡去，这和港大、北大、台大的星期五上课过后，学生们积极参与各种文娱、学术活动，校园一片喧闹，连晚上也灯火辉煌，恰成强烈对比。

马大学生是把一个星期的功课，包括读书、复习、应付作业全都挤在四天内完成，至于其他人文研究或学习活动与学分无关，大家都“无力”（无心？）参与其事。

一位在籍中文系学生告诉我，马大校园设有ATM自动提款机一台，周一到周四每天都大排长龙，周五则静悄悄的，提款机里多的是钱却没什么人提取，正如许多学术演讲、研讨及其他可以提升自己的见识视野的活动，本可在周五、周六进行，学问就在那里，却难得有人愿意留下来攫取一样。再加上大专法令、行为守则的诸多制肘，我们的大学生似乎更加有理由“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了。

那么，大学的一些学会怎样筹划进行各自的活动呢？方法仍是一字记之曰“挤”。利用周一至周四中午那段午饭时间，塞一、两个小时演讲或座谈进去。笔者于1980、1990年代多次应马大中文系“文学双周”筹委会之邀，前去谈文论艺。我准时讲，学生有些在食堂匆匆忙忙用了饭才进来听，有些尚未用饭的同学听到一半肚子饿了或赶着下一堂课，便悄悄起身，蹑步到礼堂后面去，一掀门一闪身，便溜走了。看在眼里，主讲人真是百感交集。

笔者是那种死心眼的人，无论去哪儿参与座谈、演讲，要么不讲，如果答应了前去参加，一定全力以赴，准备讲稿之余，还多方搜罗有关资料，务求对自己对听众都有交代。这些年来我尽可能婉拒出席座谈或演讲的邀请，不是摆架子，而是准备这类演讲实在太费神费力（做学问没有空手入白刃这回事），还是躺在咖啡座里读书写作轻松自在。

每次我站在马大讲堂中间往上瞧，学生进出如过江之鲫，有些听众听我讲上半段，有些匆匆赶来听下半段，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一向喜欢用辩证方式（dialectical）来反复检验一些现象/观点——文学或文化的——我可以在演讲前半部褒扬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使想像力逸出常轨，在创作形式上作出更新与突破，但同一演讲后半段我可以痛陈后现代主义的缺乏历史感，没有精神的维度，平庸堕落。听我的演讲不听全套，是听众的损失，是我的遗憾。我在想，眼前这些大学生，如果观赏梁朝伟、张曼玉的《花样年华》，也是这

般来来去去，他们会少看多少袭漂亮的中国旗袍呢？

“文凭主义”非今日才有，只是于今尤烈。讲师或教授对于知识的传授，如果不强调分数，学生多半漠然以对。也不能全怪这些年轻人，功课那么繁重，一周的工作又得压缩在四天内完成，如果教授课堂上讲钱穆如何教中国哲学思想，王叔岷谈老庄如何神采飞扬，坐在椅子上等着抄笔记的学生心里可能会嘀咕：“这些‘资料’有用吗？又没算分数！”求学问而不能有一种 disinterestedness 的超然态度，只着重于眼前的一丁点好处，哪里可能有大成？事事只讲求功利，求学也好，生活也好，哪里还会有情趣？

《亚洲周刊》，2002年3月25日

记忆回收·行动解读

《南洋商报》、商务印书馆、大将书行于10月发起的“记忆回收”行动，收集本世纪旧照片作为百年历史的返顾，并预备以十年为一单元，汇编成书《马来西亚百年老照片图鉴》出版印行。在这迎接千禧的时间当口，这举措值得大家研索解读。视这项行动为有关单位的一般人文活动，用过于简化的评语如“颇有意思”云云，是不能满足我们底心智需求的。

进一步把记忆回收，看作是一项商业策略或促销方式，亦未免小看了主事人的用心与智慧。就我看这项记忆回收，让老照“重现江湖”的举措还牵涉到历史书写与解释权的问题，我们甚至还可以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衡量这个文化动作。也许，我应该从后面这项说起。

后现代文化的怀旧

“怀旧”是后现代文化十分明显的现象。1990年代初期以“旧情绵绵”为主调的怀旧情绪，弥漫十年，久久不散；周璇、阮玲玉、林黛、猫王皮礼斯礼、玛丽莲梦露，都是人们追忆怀想的对象。由于人物已逝，人们通过“拟象”（simulation）去追求某种满足感，拟象文化正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指陈的，是符号消费文化。通过照片的时间锁定，人物事件得以历久长青（新），因此百年老照回收行动，自然而然地会挑动广大群众的敏感神经，使他们作出回应，并且在回应中“翻新”已经折旧了的陈年回忆。

詹明信指出，后现代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杂汇”（pastiche）。高尚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疆界模糊，各类艺术从文学、电影到音乐、建筑都有雅俗並陈、古典与现代互为表里的现象。摄影作

为一种艺术表现，自身就是一把通俗性与艺术性具备的双面刃，只要有一架相机在手，谁都可以拍出面前的人物景致。

有时无心插柳柳成荫，随意的拍摄也可以拍到意想不到的珍贵镜象。这样的记忆回收方式，即平民化又具草根性，每一个阅读到或辗转听闻到这项消息的人都可从容参与。

历史书写与解释权

从历史书写与解释权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历史撰述基本上是一种选择性行为，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话，历史的发展绝对不是连续性的，只凭单纯的因果关系去推衍历史发展，可能犯了放逐大量历史材料之弊。傅柯的知识考掘学，让我们了解历史充满偶然性、分歧性与不规律性。历史往往不是“从怎样到怎样”，而是“为什么会被书写成这样”。

就事论事，我们不必在这阶段接受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历史哲学观点，即“人类历史只是胜利者所书写的野蛮史，弱势民族或受压阶层的声言经常被扭曲甚或彻底消音”，我引用班雅明的话旨在说明史家撰史的主观性。历史资料的主次位置，甚至是非、价值判断都视乎历史家的“言说地位”（enunciative stance）而定。

拿着相机取景的人，在相当程度上像个历史撰述者；在二十世纪末某一年某一天的某一刻，他看到了对他而言有特殊意义的人物或景象，于是按下快门，拍下那镜头。人物景象的材料选择当然是主观的：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景物之间的主次位置，动与被动的辩证关系，整个汰选、凸显、聚焦的过程是摄影家的权利也是历史家的权利。从照片里头的人物、表情、衣着、环境、景观，阅读者可以捕捉到历史关键性的瞬间，看到某项历史事件的侧影。

每帧照片都有自己的故事空间，透露若干时代的信息。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提醒我们要看清楚一张照片，可能要在初阅

之后暂时移开视线或闭目冥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唤醒沉睡着的情绪。

罗兰巴特给我们的启示当然不止这些。在他的名著《明室》（“La Chambre Claire”）里，他提出了“知面”（studium）与“刺点”（punctum）说。“知面”是一张照片给予阅读者表面的、整全的印象。以1971年银星艺术团来马义演那张照片为例，一群挥着镰刀的农家女一起展开笑靥，“她们的笑容绽放如花，动作姿态好整齐啊！”这是“知面”的阅读。而如果观赏者察觉到每张灿烂的笑靥都划一无瑕，因而联想到样板戏与那个政治严酷的年代，那便是“刺点”的阅读。“刺点”有时是埋伏在照片一角不起眼的局部细节；有时是照片景象的两个（或两组）相斥元素，互相碰撞发出火花。“刺点”甚至会刺痛阅读者，让他/她跳起来；或恍然大悟，领会到景物内蕴的深义，把握到照片人物场景的叙事主体。

知面与刺点的阅读

另一帧拍摄檳城街头的折子戏老照，除了透露本世纪初年（1910）野台戏在马来西亚已甚流行的信息外，照片的“刺点”在于绝大部分的观众竟无视台上的精彩演出，反而回过头来带着困惑的神色望着摄影者。他们对着镜头的“凝视”，与拍摄者构成微妙的无声对话，似乎在告诉我们对摄影机的莫大好奇；另一种解读是，观众对拍摄者的动机存有猜忌疑虑。至少是在那拍摄的一刻，台下观众的兴趣已从台上的戏目，转移至台前那个拿着相机的人身上。

另一帧令人惊心的照片是这样的：一边街头站着三五成群留着辮子的华人，另一边是几间毗连的双层店铺构筑成的赌场。“华人喜好赌博”是“知面”的阅读印象。“刺点”是那些驻足而观与留连不去的人的衣着，都极其简朴近乎褴褛，这些远赴重洋南来的早期华

人，哪来的闲钱去赌博？那些伫立于街头一角的人，是不是输了钱才那么潦倒？是殖民者故意纵容赌业盛行，让被殖民者身心断丧，无力改革现状，只能被控制被奴役？不少第一代南来的华人，因为嗜赌成而散尽钱财，以致叶落归根的希望破灭，客死他乡的历史映象，突然在我眼前变得清晰无比。

从小叙述到大叙述

由于百年老照、记忆回收的行动是通过商务、大将书行以及南洋商报各地的联络站进行的，照片的提供者来自社会各角落，源自社群的各阶层。每张照片都是则小叙述，众多的小叙述通过连贯、交织、拼贴——也就是历史的解释权的操作——当可组成建构成史的“大叙述”（grand narrative）。

以十年为一单元的汇编方式固然不错，希望编者也能照顾到照片内容的多元性与戏剧性，排排坐的合照太多就枯燥乏味了。

《马来西亚百年老照图鉴》如能顺利付梓，它应该是个人与社会记忆的化石证据，其意义已非“怀旧”一词所能概括。

《南洋商报》，1999年12月4日

建构“文化新山”

与祝家华在电话里谈了半个小时，他对早年人文荟萃、人才鼎盛的檳城，文化活动近年陷于低潮的情况引以为忧。我认为问题不出在檳城没有演艺人才，而是缺乏人脉把这些人才串连起来，发挥良性的互动。檳城素有“东方花园”的美誉，由丹斯里许子根博士任首席部长的政党班底执政，他应该可以为沉寂的檳城文化活动推波逐澜。

家华和我的这番谈话，勾动了我的陈年回忆。1989年7月4日我于《南洋商报》版发表〈文化总体的微分观察——我看“新山模式”及其意义〉。我不仅企图为新山这社区，寻找其文化运作模式，还把这模式放到首都的文化脉络里探讨，检验其可行性。

说来1986年新山主办中秋园游晚会，主题是“牵着孩子的小手过节”，新山模式已粗具规模；1987年的中秋传灯，“把一首歌唱成一个节”。1988年端午节诗曲朗诵，新山模式开始跨出一大步，因为主事人陈再藩、陈徽崇、姚新光，已有足够的力量汇集新加坡与吉隆坡的艺术/文学资源，作出更大幅度的文化动员。新加坡诗人谈莹、郭永秀、梁文福，马来西亚的方昂、傅承得、游川和笔者便是在1988年应邀赴新山参加端午诗节，大家在宽中礼堂朗了好几首诗。同年新山模式配合新山中华公会承办〈九舞〉，1990年搞〈庚午薪传〉，力量更见增长。新山模式已能衍生成长，渐而影响、加强新山社区的文化能量。

新山的三个知识板块

近日有缘再赴新山，引发笔者对新山社区的重新考量。作为文艺汇演大本营的宽柔独中，共有二百三十二名教师，约80%为留台

生，加上本地大专所组成的师资阵容，适足以构成一个颇为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对新山学生，也即是年轻一代的新山人，有深远的人格形塑作用。

离新山市二十多公里之远的士古来，仍属新山社区，建校十载的南方学院巍然矗立，学生逾一千二百人，它拥有三十多位讲师，师资当中以拥有硕士学位者居众。新山的工艺大学也有逾五千名优秀的华裔学生与研究生（只要有10%的华裔学生对人文活动与研究有兴趣，力量便甚为可观），宽中、南院、工大这三个知识板块，形成了新山社区的人文与学术基础。

新山中华公会成立于1922年，七十八年的历史源远流长，是新山血缘、地缘及业缘性各行团所构成的总体。它有很强的人脉、钱脉，也有足够的威望出来号召，从修葺古庙到为宽柔筹款，新山中华公会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现任会长张文强、总务赖益盛两位先生都有远见与魄力。作为一个体制，中华公会就像吉隆坡的雪州中华大会堂，老树盘根，基础深植，政经文教诸领域都能发挥一定的影响力。笔者在新山出席文化研讨会期间，曾向一位当地的父老探询中华公会的社会功能，他说：“中华公会管的是天、地、人三方面的事；‘天’是神庙、祭祀活动；‘地’是义山事务；‘人’是从学校兴建到调解纠纷。”以此观之，许多活动，只要中华公会出面，往往有一呼百诺之效。

在人力资源方面，十多年前的新山模式加上今日的安焕然、黄文斌、胡志强、张济作、杨文煌、张凌保……这是一股流动不居的力量。平时众人各司其职，有需要时又能汇聚在一起，发挥其脉络相连（networking）的作用。陈再藩与陈徽崇最能鼓起民间的积极性，以歌舞团〈南方之路〉征丁的情况来看，从宽中学生开始时的冷漠到后来的踊跃，他们颇能以行动与个人的热情激起新山年轻一代的参与饥渴感。

文化中国三个实体

新山的文化版图，使人想起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于1993年撰写的一部题为《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re》的书。杜维明是当代人文主义新儒家的重要人物，他在专著中首先提出了“文化中国”的概念，并指出“文化中国”可以包括三个实体。这三个实体，一为华人地区的中国、台湾、香港与新加坡；一为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第三个实体是研究/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学者、作家与记者所构成的体系。

这三个实体也是三个“象征的世界”（symbolic universes）。杜维明的概念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安德逊（Benedict Anderson）所提的“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安德逊指出自十八世纪以降，“印刷资本主义”崛起，书籍的流通使分布各地的人可以通过文字设想同一个群体，并认同自己为其成员。即使彼此生活在不同的政经社会环境里（比方说在美国的华人），他们仍保存民族的历史记忆，仍沿习着一部分古老的中华传统，包括价值观与礼俗，他们可以在想像中回到文化的原乡并在那儿找到精神的归宿。想像的社群因而能突破地域底围限，而在瓦纳（Michael Warner）的“文字共和国”里“生活”在一起。

本土的文化生成

杜维明的“文化中国”三个实体论，使我很自然地联想到新山社区的三个实体。一个是由宽中两百多名师资、南院的学术人员、工大的学生与研究生所组成的知识实体，一是中华公会这个草根性强而且包罗各行各业人士的体制，还有另一个实体则是由知识分子、艺术家、文化人、创意设计者所形成。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山有成为“文化新山”的潜能。而“文化新山”不是搞文学的人故意标新立异，把名词当形容词的文字游戏，而是一种实质的存在。它有某种示范作用，可供国内其他城市与社区参照。

新山市现有的人口有五十八万（每年的人口增长率是3.4%），大专生与研究生学术人口的密度可能居全马之冠。我感觉得出来南大生、留台生对这个城市的影响既深且巨。张文强、陈再藩、张拔川（宽中校长）都是南大生，或可为例。逗留新山数日，我听到的尽是字正腔圆（至少是悦耳）的华语，这和我在中马听到的粤腔华语很不一样。

这个南方鼓城的潜在危机是它有财大气粗的浮躁倾向。华团的力量过于膨胀，筹起钱来容易，但也容易使华团有一种居功倨傲的心态（这种心态可以是不自觉的），而对宽中与南院作出某些人事或行政上的干预。南院是个学术机构，不是华团领袖竞技的舞台。南院的学术氛围（aura）有可能潜移默化新山，但新山的功利主义同样可以腐化南院，这是一个五十对五十的局面。如果前面的情况最终出现，那么“文化新山”不仅在国内，也在东协的地图上，矗立起一座典范，让大家看到本土的文化生成底具体形状。

《南洋商报》，2000年10月12日

静中 听雷

温任平著

身为观察者与解读者，温任平最可贵之处，在于不断精进。正如张景云所言：“他是一个对自己有企求的知识人”。我们不一定要同意温任平的看法，但必须敬佩他坚持理念，不断为社会而读书。当他的视线从书本移到现实世界，将所思所感化为文字，我们知道这个社会还有人淡泊读书、敏锐观察和潜心解读。

——傅承得

